

2020·2(总第62期)



编委会

主任 贾建威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勇 王琦 王科社 文静
卢冬 史册 李岩 李存山
李永平 李金文 张建全 宋冰
陈庚龄 赵莉 贾建威 班睿
魏万斗

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 王科社
执行编辑 王科社 茹实
李慧奉
英文目录 王孟元
校对 茹实 李慧奉
王孟元
封面题字 初世宾
封面设计 孟倩

目 录

【考古发掘与调查】

甘肃长城调查研究略述 梁建宏 3

【简牍研究】

驿路豹斑:西汉末年汉与西域间的政令传递
——马圈湾汉简发掘出土四十周年记 张俊民 9
地湾汉简:再现两千年前河西边关汉塞多彩的屯戍生活
肖从礼 18

【碑刻研究】

合水县元孟公信武显扬先墓碑研究 王科社 周占全 22
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考述 张明鹏 34
武山县清陈韶德政碑探析
令陆胤 刘向东 刘斌强 40

【文物研究与鉴赏】

白银市两件人头钮盖陶罐研究 陈辅泰 金珠 45
庆城县博物馆馆藏彭原银锭再考 范仲杰 张志升 51
一口铜锣锅和一把铜马勺背后的故事 常斌强 55

【史地研究】

秦国礼乐文明浅说
——以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乐器为中心 魏泽民 58
北宋时期庄浪地区的佛教文化及其特点 陈晓斌 64
曹安德与曹友闻世系关系辨析 曹鹏雁 宋雯 72

【博物馆工作探讨】

县级博物馆如何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以古浪县博物馆为例 景泽时 77
试论我国高校博物馆社区化 田汉 82

【异域见闻】

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古城与博物馆馆藏文物 尤宝铭 86

【文博信息】

“八步沙精神——平凡的伟人”雕塑

捐赠仪式在甘肃省博物馆举行 张东 89

甘肃省博物馆举办“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直播活动

甘肃省博物馆网络中心 91

甘肃省博物馆 2020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辛欣 93

两场直播共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陈憻閒 95

甘肃省博物馆举办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

王孟元 96

封面:瓜州县南沙窝长城(甘肃省长城资源调查队摄)

封底:瓜州县南沙窝5号烽燧(甘肃省长城资源调查队摄)

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

西津西路3号

邮编:730050

印数:1500册

印刷:兰州鑫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请
与我们联系

LONGYOU RELICS AND MUSEOLOGY

Volume2, 2020(Total Vol.62)

Main Contents

- 1.Brief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Great Wall Investigation in Gansu Province Liang Jianhong
- 2.Research on Monument Ancestor with Meng Gong Xin Wu in Yuan Dynasty of Tombstone Study in Heshui Country Wang Keshe Zhou Zhanquan
- 3.Textual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n Epitaph Study of Fan Family Zhao's Mother in Ming Dynasty Zhang Mingpeng
- 4.Yi Lu Bao B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crees between Han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ManQuan Site Bamboo Writing Slip Unearthed in Han Dynasty Excavated for 40th Anniversary Zhang Junming
- 5.Diwan Site Bamboo Writing Slip Unearthed in Han Dynasty: Reappearance the Colourful Life in Han Frontier Fortress, Hexi Bord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Xiao Congli
- 6.Two Pottery Pot with Head Button Cover in Baiyin Country Chen Futai Jin Zhu
- 7.Re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Qingcheng Country Museum Collection of Peng Yuan Silver Ingots Fan Zhongjie Zhang Zhisheng
- 8.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n Gene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o Ande and Cao Youwen Cao Pengyan Song Wen

甘肃长城调查研究略述

□梁建宏(甘肃省文物局)

内容提要:甘肃境内长城为战国秦、秦始皇、汉和明诸代长城西段,自近代以来,一直被众多学者和国内外长城爱好者关注,围绕甘肃长城的调查研究自近代以来未曾中断,研究成果颇丰。为做好以后的长城调查研究工作,本文拟对近代以来围绕甘肃长城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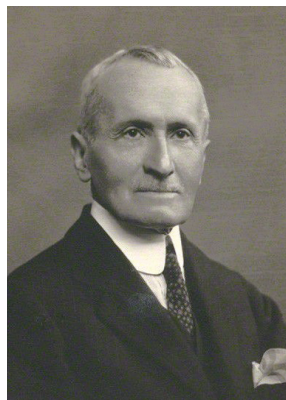
关键词:甘肃;历代长城;调查研究;回顾

甘肃长城作为我国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各类机构、国内外学者和长城爱好者开展了多层次和内容丰富的调查研究工作,包括主要在居延等地区的发掘清理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基于长城的特殊性,长城考古发掘甚少,多为调查或考察。考古调查的目的是在不破坏遗址、遗迹的前提下,通过实地踏勘、测绘、采集标本等方式,记录长城所处的地理环境、走向与分布;长城相关建筑及设施的位置与形制;保存现状及损毁情况等信息资料。具体的调查方法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更新。

一、近代长城调查研究

近代的甘肃长城调查研究既有国内学者,也有国外学者;既有实地考察,也有基于文献的考据研究,主要为后者;既有基于长城全线的调查研究,也有甘肃境内的专题调查研究。这里仅对主要在甘肃境内的调查研究概述如下: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照1)考察了敦煌东西数百里间的汉长城沿线地区,在敦煌西北疏勒河流域考察时首次发现敦煌汉塞遗址。1913~1915年,斯坦因重返敦煌,并沿疏勒河流域考察



照1 斯坦因

了瓜州、玉门和金塔等地汉代长城烽燧遗址。斯坦因的考察,使汉代长城边塞及汉简始被世人所知。斯坦因两次考察在甘肃境内共获汉简789枚以及一些粟特文、佉卢文及婆罗米文文书,汉简及文书共计1000余件^[1]。

1925年,中央研究院派遣陈万里赴西北地区进行史地考古调查,汉、明长城为重点调查对象,成果见于其所著的《西行日记》^[2]。



照2 西北史地考察团由兰州赴敦煌的途中

1927年10月,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及助手庄永成调查发现居延遗址,发现汉简4枚,为居延汉简发现之肇端(照2)^[9]。1930年,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等在居延地区沿黑河流域至高台金塔交界处的镇夷峡北口进行调查发掘,调查城障烽燧200余座,试掘29个地点,发掘采集汉简1.4万余枚以及汉代毛笔等其他文物^[4]。

1938年,顾颉刚(照3)考察临洮、渭源两县境内战国秦长城,指出“秦长城起自秦代之临洮,即今岷县,由是东折至渭源,又北东至临洮,又北至皋兰,皆有其遗迹,唯存者已仅耳”,也赴岷县做过考察,但未见遗迹^[5]。其后的诸多学者在述及甘肃战国秦长城时皆引用或直接使用顾氏观点。

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劳干、石璋如等考察了敦煌市阳关和玉门关以及居延汉塞^[6]。

1942~1943年,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向达赴敦煌考



照3 顾颉刚

察了部分汉塞及附近城址^[7]。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鼐和阎文儒对敦煌市小方盘城以东的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与试掘,出土汉简40余枚及晋泰始十一年(275年)乐生题记石碣等^[8]。

以上诸次考察研究均有论文或者专著报告成果,同时,也有寿鹏飞、张维华、王国良等先生基于文献对包括甘肃长城在内的历代长城进行研究论述^[9]。

二、1949~2000年期间的长城调查研究

这一时期,随着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有组织的长城调查考古工作逐渐开展,自发调查研究的人员和次数大幅增加,调查研究工作更为系统,成果更为丰硕。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基本掌握了甘肃境内长城的基本走向、分布、构成等主要问题。这一时期围绕甘肃长城所开展的调查研究内容仍未突破近代长城调查研究内容范畴,即时代及修建沿革、分布、走向、环境、构成、构筑方式、所反映的民族关系等问题。

1958~1960年、1972~1976年、1986~1989年,甘肃先后三次组织开展了文物普查,均涉及甘肃历代长城遗址。其中,第三次文物普查的规模和成果,均超过前两次,基本查清了甘肃长城的分布、走向和现状,成果收录在《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10]。

除文物普查外,这一时期,甘肃没有对境内长城进行过全线调查。分时代调查方面,除秦始皇长城尚未发现相关遗存外,围绕战国秦、汉、明时代长城,均陆续分别开展过全线或分段调查。1963年,罗哲文(照4)详细勘查了临洮长城坡秦长城、敦煌玉门关汉长城和嘉峪关关城及其附近明长城,并有专文介绍成果,这是1949年以后国内学者对甘肃长城首次基于科学考察后进行的专题介绍^[11]。

战国秦长城方面,比较重要的调查有四次:一是1981年7~10月,定西地区文化局抽调有关县文物干部对定西境内战国秦长城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遗迹考察记》^[12];二是1985年,庆阳地区博物馆对庆阳境内战国秦长城进行了调查,发表了《甘肃庆阳地区境内长城调查与探索》^[13];三是1981和1984年,陈守忠分别偕陈秉



照4 罗哲文

璋和李并成对甘肃战国秦长城进行了全线调查^[14]；四是1986~1988年，彭曦等历时两年全线考察了包括甘肃在内的战国秦长城，并于1990年发表专著《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15]。

汉长城方面，比较重要的调查与考古工作有三次：一是1972~198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对居延地区汉代遗址进行了踏查和发掘，全面揭示了居延地区军事建筑群形制和级别，出土简牍2.2万余枚和其他文物2300余件。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王勤台《居延汉代遗址考古调查回顾》和初世宾《居延考古之回顾与展望》等多文介绍了此次居延考古及其成果^[16]；二是1979~200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为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相关市县文博单位参与下陆续完成了河西汉塞调查。其间于1979年9月对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900平方米，清理出烽燧1座、房址5座和马厩遗址等，获汉简、帛书等1217件，另有器物340余件。成果见于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等^[17]；三是1992~1995年，原甘肃省文化厅组织厅文物处、甘



照5 疏勒河流域汉长城调查

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对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进行了全线考察(照5)，成果见于《疏勒河流域汉长城考察报告》^[18]。

明长城方面，多位学者和文物工作者以及长城爱好者等分段或者局地考察，但如上述战国秦或者汉长城全线或者较大区域集中调查记录较少。

除全线或较大区域调查外，还有大量国内外学者、地方文物工作者、长城爱好者和国际友人到甘肃境内历代长城分段或局部地区开展的调查，并形成了一批成果，与三次文物普查成果一起为这一时期甘肃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资料和理论支撑。

三、2000年以来的长城调查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甘肃境内长城的调查研究工作继续蓬勃发展，以维修加固为目的的长城保护研究方兴未艾，高科技手段引入甘肃境内长城调查与研究，是甘肃历史上最重要的长城调查活动第一次统一标准、全线开展的长城资源调查。

这一时期围绕甘肃长城开展的重要调查有二次：一是2003~2004年，在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协助下，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甘肃省文物保护维修研究所等单位对临洮县望儿台、渭源县马家山、通渭县四罗坪和姚家湾等4个地点进行调查和试掘。同期还对敦煌市、安西县(今瓜州县)、玉门市等3市县汉长城墙体和烽燧进行了专题调查，成果见于《甘肃境内战国秦长城、汉长城(烽燧)现状调查报告》(未发表)^[19]，这次调查试掘是为开展科学保护维修甘肃境内长城开展的准备工作；二是2006~2011年的长城资源调查，这次调查由国家部署、省组织实施，甘肃省文物局联合甘肃省测绘局抽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省内有关市县文物单位和西北大学等人员组成调查队，采用传统的考古学科学方法，结合现代测绘技术和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 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照 6 长城资源调查田野工作

System, GIS)、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等“3S”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全面、系统地调查了甘肃境内历代长城(照 6),获取了包括文字记录、照片、图纸、录像等一手资料,掌握了境内长城资源基本家底,形成了完整的长城资源调查资料数据成果和数据库,为编制长城保护规划、开展长城保护工程、加强保护管理和进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此外,2007~2011年12月全省文物普查期间及结束后,部分县区也自发对本县区长城进行了普查。

四、小结

近代以来,甘肃长城研究主要围绕时代及修建沿革、分布、走向、环境、构成、构筑方式、所反映的民族关系等问题。进入21世纪,甘肃长城研究还深入到长城病害及保护措施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以敦煌研究院及相关专家为主,以为保护维修提供理论基础为主要目的。此外,也出现了管理利用和调查研究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具体来说,围绕甘肃战国秦长城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修筑时间、西端起点、走向、静宁段线路、后代沿用、与秦始皇长城关系以及保护研究等问题。战国秦长城修筑时间有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及前后、昭襄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前279~前272年)及始于昭襄王三年(前304

年)之说^[21],其中第一种说法较受认可。西端起点依据实地调查成果,主流学者认为是临洮县洮河东岸新添镇望儿咀,部分学者仍坚持岷县说。临洮及至进陕西境近年来由于考古调查的深入,走向分歧认识不大。静宁境内线路仍存分歧,简单说有两种:一是自通渭入境,沿县境西部,至县城西北原安乡李堡入宁夏^[22];一是自通渭入境,走甘沟川,过鲍家咀头,沿葫芦河东岸北上,至县城北闫庙入宁夏^[23]。根据实地调查和分析,部分学者认为秦始皇及至西汉初修缮后继续沿用^[24]。

甘肃位于史料记载的秦始皇长城西段,尽管目前尚未发现相关遗存,但因为史料有记载,因此近代以来围绕秦始皇长城西段的走向及其与战国秦长城的关系研究一直未间断。秦始皇长城对战国秦长城缮而治之的观点得到了较多学者认可,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秦始皇长城西段从临洮沿洮河、黄河北至永靖、兰州、榆中、靖远等地^[25]。需要说明的是,专家们认为的永靖、兰州、榆中、靖远等一线发现的长城遗迹均为明长城,未发现修缮和利用痕迹。

甘肃汉长城,也称为河西汉塞,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修建过程及令居塞修筑背景及原因、修筑时间、走向与分布、构成、长城设施概念、保护管理、生态环境、玉门关位置及其变迁、汉简研究等。甘肃汉长城的修筑过程有四段论和五段论之说,前

者起于公元前 121 年,后者则起于公元前 111 年,均止于汉宣帝时期,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都是先修令居塞(永登至金塔),但修建时间不同,其他具体段落及修筑时间也均有差异,同时对河西长城分布区域的认识也有差异,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赘述,段清波和徐卫民先生的《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有详细论述^[26]。涉及甘肃汉长城的概念研究主要包括长城本体、障城、烽燧和天田等概念认识。汉代玉门关址的分歧相对简单,就是围绕玉门关址是否在小方盘城争论至今。甘肃汉简分别被称为“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李永良先生将甘肃汉简的研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简牍的整理、释读和注解文正误;二是结合文献研究汉简所反映的汉代边郡组成、防御系统、屯田制度、烽燧制度、戍卒生活、邮驿制度等;三是对简牍本身的形制、特征、字体、类别、编排顺序、书写格式、断句等^[27]。

甘肃明长城属于九边之固原镇一部和甘肃镇,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从固原镇析出临洮镇,位于甘肃南部偏西部分。围绕甘肃明长城的研究主要是固原镇和甘肃镇,临洮镇研究着力不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分布、长度、构成、修建时代、对前代长城沿用、建筑特征、民族关系、军事战略、历史地理及保护管理等。围绕甘肃镇和固原镇之兰州、白银、庆阳一带的明长城研究认识基本一致,分歧较大的是位于甘南地区的洮州边墙和临夏地区的河州二十四关是否属于明长城体系的问题,尚无定论。位于今天甘肃东、中、西部地区的明长城毫无疑问属于甘肃明长城的主体,洮州边墙和河州二十四关是否属于明长城体系还需要按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路,依靠详细的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去解决。

注释

[1]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考察后,发表的成

果有:《Ruins of Desert Cathay》(译作《沙漠契丹废墟记》或《沙埋契丹废墟记》),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12 年;《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译作《塞林底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详尽报告》),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1921 年;《敦煌沙碛汉长城遗址所出古代汉文简牍》,《新华评论》1922 年。前两本专著均有中译本。

[2] 陈万里:《西行日记》,朴社,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 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再版。

[3] 黄文弼:《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第 76-113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 年。

[5] 顾颉刚:《甘肃秦长城遗迹》,《史林杂识初编》,第 77-78 页,中华书局,1963 年。

[6] 劳干:《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十九)》,1948 年。

[7] 向达:《西征小记——瓜沙谈往之一》《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此文收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6 年出版,后分别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和重庆出版社(2009 年)再版。《西征小记》最早刊发于《国立北京大学季刊》(第七卷第一号,1950 年 7 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亦收录了《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

[8] a. 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十九)》,1948 年。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 年)亦有收录;b. 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文物参考资料》1953 年第 12 期。后以上、下篇分别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6 年第 4 期和 1987 年第 1 期。

[9] a.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 年)。1978 年,《长城研究资



料两种》，香港龙门书店有限公司影印辑录；b 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得天庐存稿之二，民国三十年（1941年）印。1978年，《长城研究资料两种》（香港龙门书店有限公司影印）辑录；c 张维华：《汉置边塞考略》，《齐鲁学报》1941年第1期；d.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第137~159页，中华书局，1979年。

[10]廖北远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测绘出版社，2011年。

[11]罗哲文：《临洮秦长城、敦煌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查简记》，《文物》1964年第6期。

[12]甘肃省定西地区文化局长城考察组：《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遗迹考察记》，《文物》1987年第7期。

[13]李红雄：《甘肃庆阳地区境内长城调查与探索》，《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14]a. 陈守忠：《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b. 陈守忠：《陇上战国秦长城调查之一——陇西段》，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第171~182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c. 陈守忠：《陇上战国秦长城调查之二——陇东段》，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第183~193页。

[15]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

[16]a.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b. 徐莘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文物》，1978年第1期；c. 甘肃省文物局、丝绸之路杂志社：《甘肃文物工作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d. 相关文章有：王勤台《居延汉代遗址考古调查回顾》、初世宾《居延考古之回顾与展望》和岳邦湖《居延地区汉代长城烽燧考古回顾》。

[17]a.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b.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

[18]甘肃省文物局编，钟圣祖、岳邦湖著：《疏勒河流域汉长城考察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19]敦煌研究院：《甘肃境内战国秦长城、汉长城（烽燧）现状调查报告》，内部资料，2004年。

[20]a. 甘肃省长城资源调查队：《甘肃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综述》，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文集》，第112~117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b.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文物志》（下册），第1792~1793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21]赵志强：《秦昭襄王长城的兴修与使用》（第11~14页，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和段清波、徐卫民合著的《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第63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对此问题有综合研究，其他涉及战国秦长城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对战国秦长城修筑时间有论证。

[22]a. 陈守忠：《陇上战国秦长城调查之一——陇西段》，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第178页；b. 杨铎弼：《静宁秦长城遗址调查》，《平凉文博》1984年第1期。

[23]a.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第52、5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b. 同杨阳：《再议甘肃静宁段战国秦长城走向及防御形式》，《秦汉研究》（第九辑），第217~22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4]徐卫民、胡岩涛：《也谈甘肃秦始皇时期长城——与〈甘肃无秦始皇长城考〉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2卷第4辑，第55页。

[25]唐晓军：《甘肃境内的长城与烽燧分布》，《丝绸之路》1996年第5期。

[26]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第188~245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27]李永良：《河西汉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简牍学研究》1997年00期。

驿路豹斑：西汉末年汉与西域间的政令传递

——马圈湾汉简发掘出土四十周年记

□张俊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马圈湾汉简发掘面世四十周年了,因为简牍数量少与简牍自身保存状况不理想,文字的释读比较困难,影响与制约了人们对马圈湾汉简的研究。得助于新的成像与出版技术支持,《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出版了比较清晰的图版,为重新整理与认识马圈湾汉简提供了可能。本文试以其中简 513 为例,见证释文再校释对研究的重要性。本简记录了发往西域都护府的诏书,在马圈湾附近由两个隧长出面,共同将它交给了一个“鄯善民”传送。这一过程再现了中原与西域机构间的“厩置骑置行”的又一种邮递状况。

关键词:简牍文书;马圈湾汉简;汉与西域交往;邮驿制度

马圈湾汉简,1979年在敦煌北部汉塞马圈湾遗址发掘出土,算来正好四十周年。四十周年之后,回头看看这批简牍的整理,其费人、费时之艰辛绝非一般人可以体验或想象的。

一、马圈湾汉简整理回顾

马圈湾汉简发掘首先是因为甘肃河西汉长城的调查,在一步一步的调查中,调查者发现了一个斯坦因忽略的烽燧(D21)。地理坐标北纬 40°20'33.18",东经 93°44'20.22"。随后,报经国家主管部门同意进行发掘。6月发现,9月16日发掘,10月5日结束。从后期的考古报告可知,出土的简牍是1217枚(一说1221枚)^[1]。这个数量在当时而言是比较尴尬的。就全国而言,在当时一次发现出土简

牍一千多枚确实不少,可以说是惊人的发现;而相对甘肃正在进行整理的居延新简而言,其数量又显得并不重要。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最早的马圈湾汉简出版时还将所能收录的敦煌汉简均收录了,而结果也不过是只有编号2485个,仍取名《敦煌汉简》,只是将马圈湾汉简放在最前面而已^[2]。

另一方面,马圈湾汉简的很多简牍保存状况不太理想,早年的《敦煌汉简》图版也不太好,以致简牍的释文存在很多令人费解的碍滞点。除了吴初骧先生先后介绍的几枚简外,大多注意的是所谓的“莫府档案”^[3]。而这个档案文书,也因为过于草率,书法价值很高,但个别字的释读困难却非常大。

在其全部发表之时,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

代,差不多同时比其数量更多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也公布了,还有数量更多的悬泉置汉简出现了。^[4]南方各地也相继出土大批简牍^[5],也吸引了很多简牍学者的眼球,马圈湾汉简以“灯下黑”的处境,很少被人们关注。此时,除了少量文章涉及到马圈湾汉简外,就是几篇与马圈湾汉简释文相关的论文^[6]。这些工作,可以说是在极其艰辛的环境下完成的。之所以说极其艰辛,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据的简牍实物与简牍图版很不清晰,释文基本上以肉眼目视为主,限制与影响了工作进度与质量。

从发掘报告的描述可知,出土的简牍应该会比较脏的,整理时一定是需要先清洗的,刚刚用水涂在简上,字迹会比较清晰,但字迹会越来越淡。另一方面,马圈湾简牍的木质又以红柳为主,占数量的一半多(54.1%)。红柳是一种质地比较硬的木材,木筒容易保存,但是因为墨迹不易渗入简牍内部,在受到残损之后的简牍,字迹保存状况十分不好。“由于烽隧遗址出土的简牍,均为当时的废弃物,或作燃料而未烧尽者,故大多残损散断,或虫蛀朽蚀,或粪沍渍污,字迹漫漶,章断句残。文字清晰,内容完整的简册极少”^[7]。

到 21 世纪的前十年晚段,一种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被引入到简牍整理工作中,人们可以通过红外扫描仪,获得远较前人清晰数倍的图像,高清的出版技术也一改前人图版灰暗的局面,马圈湾汉简也以一种全新清晰的面貌呈现出来,这就是张德芳著的《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8]。借助马圈湾汉简的出土、简牍文字的记录,我们可以对汉与西域交往乃至丝绸之路的具体状况进行剖析。

二、个例分析

据清晰的图版,获得的释文无疑远较早年有了很大进步。这一点无需一一举例,将两个版本的释文作简单的对比就会发现。近期笔者在做阳关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在搜罗两关资料的过程中,翻检此书,发现还有很多意犹未尽的简牍,值得我

们去重新认识释文、发掘其内在的信息。本文试图解读的这一简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也为我们认识汉与西域交往、丝路交通提供了的重要例证。

本筒简号是 513,按照原来的出土位置附表,本筒出土在探方 T6,本探方简牍编号有 133 个,该筒在本探方内的编号是 33,即 T6:33。原本释文作:

简 1'. 出
诏书一封丞
相府印车师
后城司马

诣西域
都护庭置课
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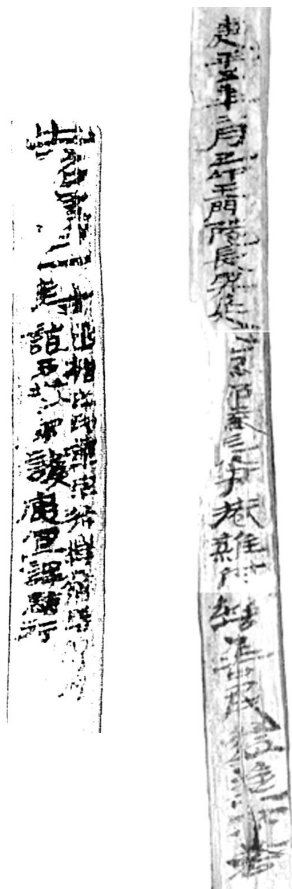
建平三
年二月己卯
玉门隧长具
兵 □□□
□隧长尹恭
杂付鄯善民
□□□□
□513

借助高新技术获得的高清图版,《集释》的释文改进后作(照 1、照 2):

简 1'. 出
诏书一封丞



照 1 马圈湾汉简 513 号



照2 马圈湾汉简 513 号局部

相之印章阜布緘□□□□

诣西域都护厩置译骑行=

建平五年二月己卯玉门隧长具兵下

□□隧长尹恭杂付缮善民益涂不若 513

比较两种释文,就会发现差异较大,但是因为简牍原本保存状况的原因,个别字仍然需要用“□”表示。按照简牍学的符号凡例,一个“□”代表一个不可释读的字。首先需要承认《集释》增补的释文多可以成立,如“之印章阜布”“五年”“厩置译骑行”和“益涂不若”等^[9]。不过,根据最新的图版,我们还可以将释文不准确的地方进行再改善。释文厘定为:

简 1. 出诏书一封丞相之印章阜布纬

敝署□□

诣西域都护厩置译骑行=

建平五年二月己卯玉门隧长卑兵大

煎都隧长尹恭杂付缮善民益涂不若 513

即“集释”之“緘”字,应释为“纬”字;“纬”下的第一个“□”,应释作“敝”字;“敝”下,可释作“署”字;“具”应作“卑”,“下□□”三字,应释作“大煎都”。

之所以作“阜布纬”,因为我们通过悬泉置汉简发现汉代的诏书或由中央机构发往西域的文书外表记录多是“阜布纬”,如简:

简 2. 出西书阜布纬二皆大司徒印章

一诣五

始建国 II T0113②:3

简 3. 入西阜布纬书一封大司徒印章

诣府纬完□□

从事宋掾书一封封破诣府 II T0114

②:89

此二简,均下残,不一定是诏书,发文单位的印章是大司徒。而“大司徒”,原来就称“丞相”,只是在哀帝元寿二年(前 1 年)由“丞相”更名而来。除上述二简的“阜布纬”外,还有简 1“緘”字的字形。“纬”“緘”左侧字形同,差异在右侧。我们释作“纬”的这个字有点“阜”的外形,恰为“韦”字异形,所以我们释作“纬”字。“阜布纬”指存放文书的囊或口袋。以囊的颜色表示文书类别的事例,在《汉书》中有记述。

丙吉任丞相时有一个驭吏,一日看见一个持赤白囊的驿骑,暗中追随,探得边塞有事,回报丙吉,使丙吉在皇帝询问应策时,独自一人事先有准备,得到“忧边思职”的赏识,众人刮目以待。原文为:

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犇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犇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府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琐科条其人。未已,诏召

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10]

相对于前者的中央发往地方的“皂布纬”,北边有兵事的“赤白囊”,悬泉置汉简所见的地方直接给中央或皇帝的上书多为“绿纬书”。如:

简 4.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实时使御羌行 II T0114②:165

简 5.入西绿纬书一封敦煌阳关都尉臣宝上绿纬縑蒲署皆完纬两端各长二尺元始二年三月庚辰县泉嗇夫长受遮要御牛枣(右齿) I T0112②:79

简 6.入东绿纬书二封西域都护上公车司马元始五年四月乙巳日中县泉嗇夫风受遮要御牛康实时遣望行(左齿) II T0114③:401

史书记录北边经驿骑发往长安的紧急公文是以“赤白囊”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汉简并无体现。通过悬泉置汉简体现出来的紧急公文,一个是下行的“皂布纬”,一个是上书长安的“绿纬书”。

“纬”下的字,图版比较清晰,应释作“敝”字。是传递时对所要传送诏书外表是否有损毁的记录。联系到简 5 的“署完”之“署”的字形,“敝”下字可释作“署”字。

因为“大”“下”二字的右侧差异不大,“大煎都”之“大”字被误作“下”字。释作“大煎都”还有其后的“隧”字上的右侧“卩”部。联系到马圈湾遗址与大煎都的关系,无疑应释作“大煎都”。

在我们完成释文的基础上,再结合经悬泉置汉简对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本简在马圈湾遗址出土,还有很多信息可以进行检讨。由之窥见西汉末年邮驿状况之一斑,进而揭示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

文书的性质:本简因为有上下对应的“出”

“付”二字,可以看作汉代的出入簿文书。因为是涉及邮书的传递状况,所以又可以进一步定性为“邮书出入簿”或“过书刺”。

作为“过书刺”,它应该有的要素是都具备了。针对本简如:“出”与“入”之“出”(还缺少类似悬泉置汉简的传递方向东、西,居延汉简的“南”“北”),邮书的种类、多少(诏书、一封),以印章文字体现出来的发文单位(丞相),收文单位(西域都护),传递方式(厩置译骑行),所传递文书的外观与保存状况(皂布纬敝、署□□),传递时间年、月、日(建平五年二月己卯,有的并不需要年月日同时出现),传递过程中的经手人(两个隧长与一个缮善民),经手人的传递方式“付”“受”。

针对本简如此,当然别的还会有完成的传递时间考核状况,是不是按时完成了传递任务,如居延汉简的里程多少(按照里程与传递方式应该多少时间完成传递任务)、具体传递时间,中程、不中程或疾程等等。

三、西汉末年的邮驿状况

本简的时间比较明确,“建平五年”是西汉晚期汉哀帝的年号,史书记载仅有四年,即公元前 6~前 3 年。“建平五年”也就是元寿元年,汉简中不仅有本简的二月,还有五年的十二月^[11]。

本简的“缮善”,史书作“鄯善”,原名楼兰,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前哨,武帝时赵破奴虏其王;宣帝时傅介子杀其王,更名鄯善。“地当汉道冲”,汉伊循都尉在此屯田、据守(悬泉置汉简中伊循都尉给皇帝的上书自称“敦煌伊循都尉”,是敦煌郡管辖至此的确凿证据)。距阳关千六百里,出玉门关西行直去即可,出阳关须西北至鄯善。丝路从鄯善分南北二道。由此可见,楼兰、鄯善在汉与西域的交往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十分重要的。西汉末年一直到新莽之时,汉与西域交往不绝,关系可谓融洽。

“厩置译骑行”,是汉代的文书传递方式,从悬泉置汉简可知,是当时最高级别的传递方式。类似

李陵伐匈奴的“因骑置以闻”^[12]。“译骑”，悬泉置汉简或作“驿骑”，是一种传递人员的身份。如：

简 7.入东书一封敦煌大守上阳朔二年七月壬午夜食时临泉驿骑薛福受平望驿骑石众 VI T1222②:3A

简 8.西域骑都尉上书一封四月丁亥蚤食时县泉驿骑□付鱼离驿骑□ V T1311④:47

简 9.□至葱岭而还县廩置驿骑行 II T0314②:395

简 10.出麦五石四斗以食驿骑三人丙午尽乙亥卅日积九十人人六升 II T0113③:81

以上四简只是众多悬泉置汉简中出现的一小部分。前二简，传递邮书的人身份是“驿骑”，传递的邮书都是“上书”，给皇帝还是给丞相不明，但一定是要传到长安的。其中的临泉、平望是“骑置”，汉代效谷县境内官方驿道有两个置、四个骑置。置是悬泉置与遮要置，骑置有甘井、平望、遮要和悬泉，悬泉的骑置有时是由临泉亭代行。按照已知的邮驿体系：置是最高级别的机构，比其低一级的叫骑置，再低一级的称亭。骑置也有亭的功能，置既有骑置的功能，也有亭的功能。简 7 的平望骑置，位在悬泉置与遮要置中间，里程简记其距离悬泉置五十汉里，所记为通过骑置传递的文书。简 8 邮书的传递人身份是驿骑，机构要比简 7 高一级，传递的机构都是置。鱼离置属于广至县，位在悬泉置东，两者之间有一个属于广至县的骑置，名万年骑置，万年骑置距离悬泉置四十汉里；万年骑置处在悬泉置与鱼离置中间。邮书直接给鱼离置驿骑，未经过万年骑置，因为又必须经过万年骑置而未过，可见此次传递直接过万年骑置，没有在万年骑置停留，速度应当更快。

简 9 可以看作是传文书的记录，让某人前往葱岭以东，到葱岭还，应该是汉代的一位重要使

者，具体人名不知。“县廩置驿骑行”，可能是有关其消息、文书的传递方式，若仅仅某人，沿途全部一路“驿骑行”，一定会累死不行。所以不可能是至葱岭还的人，以驿骑方式回来，而应该是文书或消息。

简 10 只是说明“驿骑”是一种身份的简，“驿骑”三人，基本上在当时一个骑置的驿骑数，即一般的骑置有驿骑三名，专门负责快马传递文书。作为骑手，汉简中有时又称“御”。如：

简 11.出东檄书一封书四封诣王路四门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癸亥日舖时县泉置御建若付鱼离置御□□ I T0114①:114

简 12.入西板檄一樊隆印诣府元始五年四月辛丑日失中时县泉置御张恭受广至魏大房即立遣大房持付遮要 II T0114③:425

以上二简，邮书传递方向正好相反，一个东，一个西。“王路四门”是王莽时对“公车司马”的改称。简 11 是悬泉置御直接给鱼离置御，未经过万年骑置，与前言简 8 是一致的。简 12 是发往太守府的檄书，日失中时由广至魏大房传过来，悬泉置没有派人传递，而是直接让魏大房向西传往遮要置，悬泉置御张恭只是见证了檄书经过悬泉置的状况而已。

“厩”本身是指养马的马厩，汉代著名的是六厩^[13]。当然在交通要道也单独设有厩，如金关早期的“通道厩”^[14]。悬泉置规模最完备时本身除了置之外，还有厨与厩，悬泉厩马匹在 40 匹左右^[15]。简文所言与“置”联系起来的“厩”，无疑主要是指后者，位在交通线上、需要给过往人员提供马匹服务的机构。现实生活中，中央签发的传文书，从长安出发的首站“扶风厩”就是这样的机构。简文如：

简 13.元康元年十月乙巳前将军臣增大仆臣延年承御史大夫吉下扶风厩承制诏侍御史曰将田车师军候强将士诣田所书以次为驾当居传舍如律



为驾二封轺传从者一人传第二百
卅令 II T0214③:45

简 14.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
延寿光禄勋臣显承

制诏侍御史曰穿治渠军猥候丞□万
年漆光王充诣校尉作所

为驾二封轺传从者各一人轺传二
乘传八百卅四

御史大夫定国下扶风厩承书

以次为驾当

舍传舍如律令 II T0214③:73A

简 15.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
臣超承

制诏侍御史曰顷都内令霸副候忠使
送大月氏诸国客与斥候张寿侯尊俱

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

御属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风厩
承

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V
T1411②:35

“置”无疑就是类似悬泉置的机构,酒泉郡六百九十四汉里的驿路上有十一个这样的机构,敦煌郡有九个仅知道五县(渊泉、冥安、广至、敦煌、龙勒)三置(鱼离、悬泉、遮要)之名^[16]。

重要紧急的公文文书是通过类似“厩”“置”的机构,由其中骑马的“驿骑”传递的,即“厩置驿骑行”。其速度可以通过一般文书的“亭次行”对比而知。“亭次行”就是经过邮驿系统最小的机构,一站一站地传递,其速度按照居延新简的记录就是一天百六十汉里^[17]。而厩置驿骑行则类似后来的“八百里加急”。

按照我们上述对“厩置驿骑行”的简述,再回头来检讨本文的简 1 就会发现其上明明写着传递方式是“厩置译骑行”,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是两个隧长将这样一个重要的诏书给了一位来自鄯善国

的“民”。即玉门隧长与大煎都隧长二人联合、互相监督确保此事的真实,给了缮善民益涂不若。可见,应时而变的节奏是多么的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点,是我们重点考察的焦点。

玉门,大的是玉门都尉,还有低一级候官之长玉门候,再有更低一级“玉门部”的长官候长、候史,至于玉门隧之长官隧长则仅此一见。

大煎都与玉门有点类似(缺都尉一级),最高一级有大煎都候官之长“候”,也有低一级的大煎都候长,更有最低级的大煎都隧长。一般是将大煎都候官所在地定在凌胡隧(D3、T6b)^[18],距离玉门候官所在的马圈湾直线距离约 50 公里。

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玉门隧、大煎都隧的具体位置,但可以想见分属不同候官、不同部的两个隧长能走到一起,一同作为见证人将传往西域都护的诏书给鄯善民,这一事件非同一般,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之所以由隧长“杂付”缮善民^[19],是因为按照目前的状况,从玉门关西行路线上的交通状况如何是不明白的,有没有类似东侧效谷县的驿道是个问题。就目前状况是不清楚的。但是从诏书传递的经手人来看,是看不到类似前面的驿骑交付情况,隧长给鄯善民,应该可以推测没有类似的驿站机构。隧长之所以给缮善民,让他传递给西域都护的诏书,可能与缮善民比较熟悉这条路线的走向、状况有关。

“鄯善民益涂不若”,其中的“益涂不若”无疑是人的名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益涂不若”的身份。首先界定其是“鄯善”人,作为鄯善人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在“鄯善”之后加上“民”字似乎有点费解。之所以费解是因为在西域小国之后加“民”字的用法比较少见。那么这里出现的“缮善民”如何理解呢?是指“益涂不若”为鄯善人,还是指“益涂不若”本来是鄯善人(类似现在的籍贯)而实际上已经是汉王朝的臣民。

若为前者,可能是“益涂不若”比较熟悉玉门关至鄯善的道路,才将诏书由其传递。但是这一行为牵涉到“益涂不若”是否可靠的问题,并不能仅仅是其熟悉道路就让他传递。因为,让一个西域人传递涉及西域的诏书是无法理解的。

那么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即“益涂不若”原本是鄯善人,因为经常往来敦煌等地,已经在敦煌某地落户成为了汉王朝的臣民。因为比较熟悉两者之间的线路,才让他传递给西域都护府的诏书。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出于以下简牍文书的记录。如:

简 16.使者一人吏八人假司马一人厩御一人骑士廿九人民四人·凡册四人官马册五匹传车二乘马七匹轺车五乘候临元康二年七月辛未嗇夫成佐通内 73EJT3:98

简 17.吏十六人民十六人奴婢二人马卅八匹轺车十六乘牛车一两 73EJT30:121

简 18.九月一輩凡卅三人其四人居廷吏一人昭吏三人酒泉吏六人郡中民一人会水民五人客子七人奴四人婢轺车七乘马八匹牛车三两牛三头 73EJT32:75

简 19.客胡人持曲来者辄亭次传诣廷勿令有遗脱到民间者 91F13C①:9

简 20.降民故敦煌阳关都尉马贺家 II T0214①:55

简 21.·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 EPF22:696

从以上数简可见,当时对人身身份的界定是比较严格的,外来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称“民”(“降民”“卢水民”)。前三简,是肩水金关人员出入关的记录,可见不同的身份记录方式是不一样,“民”只是其中之一;第四简为悬泉置汉简,“客胡人”无疑是专指外国人,相对于“民间”之民更易理解;第五简因为下残,出现的“降民”具体身份不

明;第六简具体所指争议更大,但这个“民”显然不是普通所言“吏民”之民,与“鄯善民”是接近的。

四、本简的重要性

本简的重要之处,就是它让我们看到,汉代重要传递方式“厩置驿骑行”的又一种方式,也就是按照当时的制度在有规范邮驿路线上的传递方式是应该如何的,而在没有具体邮驿机构之时又是怎样的实际状况。

马圈湾遗址,位于敦煌市西北 95 公里,东距小方盘 11 公里,西到后坑 2.7 公里,北面距疏勒河 8 公里。东为盐池湾湖滩,西为马圈湾湖滩,位在两湖滩之间的南北向戈壁台地上。塞墙由东向西穿越台地,遗址位在塞墙南侧。而今敦煌去魔鬼城的旅游线路从其西侧通过。原来的考古报告根据出土简牍文书的记录,判断此地在汉代属于玉门候官所在地^[20]。

玉门候官是玉门都尉府下辖二候官之一,一个是在马圈湾遗址西侧更远处的大煎都候官。按照候官管辖地域是 20~30 公里,则马圈湾遗址西边还应有数十公里的汉塞分布。从马圈湾遗址西去的汉塞具体数字是多少公里,可以不论,但是可以确定在已知的这一地域是没有汉代的“厩置”邮驿系统的^[21]。

“厩置”属于邮驿系统,明确的就是类似悬泉置的邮传体系;而玉门候官、玉门隧长属于军事系统,其中的亭具有一定的公文传递功能。但是在居延汉简中可能因为有居延县行政体系的存在,居延汉简所见的邮书传递记录中,既有军事的亭,也有邮驿系统的“置”与“驿”。

简 1 在马圈湾出土,可能与邮书传递的一方经手人玉门隧长有关。而按照一般文书所记的“出”“付”关系,诏书的传递交接可能是在马圈湾完成的。而在马圈湾完成,为何没有出现更高一级的玉门候呢?且也似乎不应该出现大煎都隧长。因为玉门隧长的存在,可能是玉门隧长的工作汇报



记录。若解决这一问题,察看实物也许可以。即若是工作汇报,可能仅仅是券刺的归档,简的背面是平整的;若是实际使用的券刺,即背面不平整,则是在马圈湾完成的。而若是后种情况,又将会产生很多问题。这里暂作归档的汇报文书对待。

作为归档的文书,在马圈湾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汉代邮驿制度在不同地域、特殊情况下的又一种传递方式。因为按照已知的邮传制度及邮传管理措施,本简所记的“诏书”是可以同普通文书一起传送的。这一点,有很多悬泉置汉简数据可以旁证^[2]。但是本简明确写有诏书的传递方式是“厩置驿骑行”,即属于紧急公文“诏书”,传递方式应该使用汉代最快的传递方式进行,速度有点类似后世的“八百里加急”。用悬泉置汉简的数据就是仅仅在“置”才经停的传递方式“置行”。东面的鱼离置传给悬泉置,悬泉置立即再传给西面的遮要置。并且有与之相应的传递时间要求。

但是,上述的传递要求都是在汉王朝邮驿系统完备的地域才适用的,而在汉邮驿机构不健全的地域,虽有明确的记录文字,不仅没有办法以“置”传行,且选择了熟悉道路状况的外国人负责传递。由两个隧长“杂付”交给原本是外国人的鄯善民,让鄯善民益涂不若向西传递,估计是由其携带穿越罗布泊可能性比较大。当然,是不是一直由“益涂不若”将诏书送到西域都护府,还未可知。只是本文设想假若一直由“益涂不若”传送,其所揭示的邮驿现状是多么有意义。

这种情况,无疑同制度体制下的邮书传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一点恰恰是本简重要性的体现,由之再现了西汉末年邮驿系统之外的又一种邮驿现状。广而言之,可以看作是西汉之时,在汉王朝管辖地域之外,或没有邮驿机构之时,汉与西域间政令、邮书传递的又一种形式。

这种现状的出现与产生,除了社会因素之外,还有不可或缺的自然原因。因为本简所记录的诏

书传递时间正好是从玉门关西行到鄯善的黄金时间段,可以满足中央或皇帝给西域都护府所发紧急诏书的时间要求。关于从马圈湾遗址西去穿越罗布泊的时间,斯坦因的探险记有比较多的记述^[3],这里从略。

本文属于国家文物局“阳关遗址考古与调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198)”子课题“敦煌汉简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部分成果之一。

注释

[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第64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D”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给敦煌市长城烽隧的编号。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3]a.吴初骧:《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一组律令册》,《简帛研究》第1辑,第215~220页,法律出版社,1993年;b.孙占宇:《敦煌汉简王莽征伐西域战争史料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5]南方如走马楼三国吴简、二年律令与里耶秦简相继出土。

[6]a.白军鹏:《“敦煌汉简”整理与研究》,2014年吉林大学博士论文;b.秦凤鹤:《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校订》,《中国文字研究》第二十辑,第98~10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c.白军鹏:《“敦煌汉简”释文校订(二十则)》,《中国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第161~167页,2015年;d.潘芳:《近20年来敦煌汉简研究综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e.张丽萍、王丹:《〈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未释疑难字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f.张丽萍、张显成:《〈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释

读订误》，《简帛》第十四辑，第175~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g.林献忠：《〈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辨误十二则》，《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h.秦凤鹤：《敦煌马圈湾汉简释文校读记》，《中国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第94~9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i.白军鹏：《敦煌汉简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后附《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第67页。中华书局，1991年。

[8]张德芳主编、张德芳著：《甘肃秦汉简牍集释——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行文简称“集释”，下同。

[9]白军鹏：《“敦煌汉简”整理与研究》，2014年吉林大学博士论文第362页有本简校订，唯释文无改进。后收入白氏著《敦煌汉简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10]《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第3146页，中华书局，1962年。

[11]居延旧简137·3、188·33、203·6，而悬泉汉简之ⅡT0114④：110、ⅠT0114①：93还有建平六年。

[12]《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第2451页。

[13]沈刚：《汉代中央的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4]李均明：《通道廐考——与敦煌悬泉廐的比较研究》，《出土文献》第二辑，第255~266页，中西书局，

2011年。

[15]张俊民：《悬泉汉简马匹问题研究》，《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第302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

[16]张俊民：《敦煌郡廐置名目考》，《秦汉研究》第9辑，第73~8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17]居延汉简普通邮书一时行十汉里，一日十六时，则日行百六十里，居延新简EPS4.T2:8A。类此者悬泉汉简ⅡT0213③：26记“百廿四里廿步，行十二时，中程”。居延旧简181·1A一时行百里，悬泉汉简ⅡT0214③：57记昼七时八分到昼八时行四十里，若一时十分则一时行二百里。

[18]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第51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19]“杂”有共同、联合之义。沈刚：《居延汉简词语汇释》，第93页，科学出版社，2008。

[2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所附发掘报告第75页。

[21]张俊民：《敦煌郡廐置名目考》，《秦汉研究》第9辑，第73~86页。

[22]张俊民：《悬泉汉简诏书资料分类研究》，2014年北京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上宣读。

[23]奥雷尔·斯坦因著，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地湾汉简：再现两千年前 河西边关汉塞多彩的屯戍生活

□肖从礼(甘肃简牍博物馆)

地湾位于今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东北约 150 公里的黑河东岸戈壁滩区域。在这片戈壁滩上有一处汉代土夯城郭遗址，距离黑河东岸 70 余米。地湾遗址由障城和坞院两部分组成，是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府下辖的肩水候官治所，当地人称此城为地湾城。在地湾这片区域内还有其它汉代建筑遗址：地湾遗址之北 500 米左右是肩水金关遗址；地湾遗址西南方 5 千米左右的黑河西岸和东岸各有一大型夯筑城障，西岸称西大湾城，东岸则称东大湾城。从这些遗址出土的汉简记载可知，东大湾城是汉代肩水都尉府驻所，西大湾城属性用途则还不太明确。这四个大型塞防建筑设施统称“三城一关”，肩水都尉府、肩水候官、肩水金关等机构设置于此。这些军事塞防建筑如此密集的筑于黑河两岸，互为犄角，周边筑有连绵塞垣和林立烽燧，保卫着古居延绿洲的南大门，充分说明了这一区域的重要性。这些塞防设施对控扼南北交通，保障东西丝路孔道畅通，拱卫酒泉和张掖诸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地湾汉简先后有两次重要发现，一是 1930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

地湾汉代故城发掘的 2383 枚汉简^①；二是 1986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地湾古城发掘的 778 枚汉简及其他器物^②。前一批地湾汉简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一批地湾汉简现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这两批汉简虽然出土时间不同，但出土地点一致、内容相类、性质相同，因此我们将这些汉简统称为“地湾汉简”。1930 年和 1986 年两次所出共计 3161 枚汉简多属于肩水候官的文书档案，其中以屯戍廩食、劳作等簿籍文书为主，此外还有一些邮书公文、诏令书记、律令科品、封检签牒、关符传致，以及少量历谱、典籍等。尽管地湾汉简多有残断，但片羽吉金，通过地湾汉简的点滴记载，仍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 2000 多年前丰富多彩的丝绸之路沿线的河西边塞画卷，再现了边塞吏卒们艰苦的屯戍劳作和日常生活。

首先，地湾汉简再现了 2000 多年前守驻肩水边塞的吏卒们艰苦繁杂的屯戍劳作。河西边塞屯戍吏卒日常工作异常繁杂，诸如公务处理、邮书传送、候望侦伺、省作、日迹、伐苇、伐茭、编织等等，这些工作对于维持边塞各级系统、各部门的正常运转，保障屯戍吏卒的日常生活是必需的。候望烽

火和日迹天田等是吏卒基本的勤务,此外,还有不少日常劳作需要吏卒们去完成,如作塹、涂埽、伐菱、省作等。

田卒们在肩水地区所从事的艰苦屯田劳作在地湾汉简中有丰富生动的记录。汉代居延的屯田区大致沿弱水流域的绿洲区分布,屯田区域主要是居延屯田区和驛马屯田区。居延屯田区在北部,驛马屯田区则位于居延屯田区的南面。从居延地区汉代的农田遗存,以及居延汉简中的相关记载可知,汉代居延地区的屯垦活动曾达到相当的规模。农业生产离不开水资源,开渠引水自然是居延地区屯垦区农业生产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劳作。在驛马屯田区开渠引水的戍卒多来自河东郡、南阳郡和魏郡等地方,这些治渠卒是政府专门从内郡征发至河西边塞屯田区从事治渠劳作的。在居延屯田区,曾实行赵过的代田法,这种耕作法除需要大型的农业工具和以牛为主的畜力外,劳动力也需要有充足的保障。西汉政府持续不断地从内郡征发戍卒至居延地区,保证了居延地区屯垦活动的正常进行。除了以通渠为职的治渠卒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员从事耕种劳作,这类戍卒称之为田卒或戍田卒。这些田卒主要来自于淮阳郡、大河郡、东郡、魏郡等县邑侯国,这应该与这些郡县的民众习于农田耕种有关。

在大湾城遗址中有一枚驛马田官答复肩水候官的应书(照1)。简文如下:

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士亡者,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赀操、初亡年月日、人数白[报与病已。·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驛马田官穿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阳郡(《合校》303.15,513.17)

大意是说如果发现吏卒、庶民和屯田士吏逃亡者,需将逃亡者的详细身份信息、逃亡时间及上报。驛马田官处回复为,始元二年(前85年)

中居延戍田卒1500人参与驛马田官的穿渠引水,这项工作是从正月己酉开始,这些戍田卒来自于淮阳郡等。此应书应该还有其他简文记录,惜未发现,不能了解其他信息。始元二年为汉昭帝时,从时代上来说,此简属于时代偏早的一枚简。其记录的正是武帝后至昭帝时,居延地区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屯戍活动,而通渠引水则是农业生产得以开展的基本水利工程。地湾周边地区正是当时最为集中和重要的屯田区之一,现在这片地区还可见有汉代农田、沟渠和水门等水利设施的遗存。

其次,地湾汉简对吏卒们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有丰富的记录,再现了汉代吏卒们艰苦的边塞日常生活。地湾出土有一枚衣物囊封检,封检题署如下(照2):

梁国睢阳
戍卒西尉里王
柱:练里裘一
领、皂布复袍一领、皂布禅衣一领、皂布
复袴一两、皂菲一两、常韦二两。(《合校》
179.2A)

此封检所封之衣物的主人是一名叫王柱的戍卒,他来自于梁国睢阳县西尉里。这应是王柱赴肩



照1

《合校》303.15,513.17



照2 《合校》179.2A

水边塞服役时由当地县府统一为其提供的衣装,包括体衣和足衣等。王柱所领取的既有暖和时穿的练里裘和皂布禅衣,也有天凉时穿的皂布复袍、皂布复袴,还配置有不同质地和样式的鞋子,“皂菲”即麻鞋,

“常韦”又称“鞞鞋”,为韦皮制成的皮鞋。戍卒赴边塞服役,县府提供的衣装诸物并不是直接交给戍卒,而是由官府密封后统一送到边塞,再由戍卒本人领用。从地湾汉简对戍卒衣装记载可知,肩水边塞戍卒们的衣装以黑色为主,体现了汉代衣装的等级之分。

从汉简的记载和汉烽燧遗址出土遗物来看,汉边塞士卒及居民的食物是以米面为主食,配以菜蔬,间或食肉。糒是居延边塞屯戍吏卒所常食的干粮。脱壳后的米麦一般以蒸煮为主,在居延边塞由于气候干燥,食物不易发霉变质,加之居延边塞屯戍吏卒外出执行公务的情况较多,军事行动较为频繁,故这些粮食会被提前炒熟,磨成粉状或捏成饼状,置于戍所,随时备用。这些磨成粉状的加工过的食物称之为“糒”或“警糒”(《地湾》86EDT65:9)。在居延边塞,糒在平日是作为军事上的储备物资。糒作为炒熟的食物,可久储,为行军必备之食物。遇有行军或战事,则按士卒人数配备

糒粮,标准是每人每天食用三斗。边塞除米、麦粮食外,民众另一重要粮食还有豆类,也有来自胡地的豆子,出土于大湾城(A35)的汉简中称之为“胡豆”(《合校》310.2),这说明在西汉时期居延肩水地区就已经开始规模引进种植西域的豆类作物了。蔬菜是古代民众的主要辅食之一。就汉简记载来看,边塞屯戍吏卒日常食用的菜蔬主要有葵、韭、葱、毋菁等。此外还有一些植物尚不能确定是否是边塞吏卒日常食用的蔬菜,如大芥、戎介等。边塞戍边士卒所食用的肉类食物主要有牛肉、马肉、鸡肉、狗肉、猪肉、羊肉、鱼肉等。如地湾汉简记载有“正月丁未买牛肉十口”(《合校》237.26)。边塞气候干燥,日照强,风大,晾晒的干牛肉不易变质发霉,所以在肩水地区,人们亦制作牛肉脯,如地湾汉简载“四月辛酉买牛肉百斤治脯。”(《合校》269.5)是说四月辛酉这天,某人买了一百斤牛肉用以制作肉脯。鱼肉是肩水边塞的人们所常食用的肉食,这是因为肩水边塞紧邻弱水,正好可以结网捕鱼。在肩水金关遗址中就曾出土有鱼网一张,以及数量众多的陶制鱼网缀。人们亦将捕获的鱼用盐渍上,这种渍盐之鱼称之为“鲍鱼”,如地湾汉简载“鲍鱼百头”(《合校》263.3),就指盐渍鱼,干鱼。在距地湾城不远的肩水金关所出汉简中记载有“负鲍鱼十斤,见五十头。橐败少三斤,给过客”(《金关》73EJT33:88)^[3],意思是说麻袋因为长期装鲍鱼,水浸盐渍而致麻袋朽败,以致鲍鱼因橐破而漏撒了三斤。“给过客”指用鲍鱼招待客人。

由于肩水边塞是防御北方匈奴的前沿阵地,为有效防避匈奴人的侵扰,屯戍吏卒的居舍一般集中修建在障坞壁之中,一则便于集中管理,二则能够起到互保的作用。此外,除屯戍吏卒外,在肩水塞地还有大量的著籍平民,他们的房舍集中于县城之内或郭外,距离其所耕作的农田较近,便于日常劳作。屯戍吏卒日常办公和起居的房舍紧挨着这些军事塞防建筑。一般而言,烽燧是由烽台、

望楼、套间小屋和附属设施如厕所、畜圈、坞院等组成。这些供吏卒办公和居住的房舍多以夯筑和板筑法建成。此外,还有不少房舍是用土壑砌筑而成。肩水边塞的鄯坞、堠楼和房舍墙壁都要涂抹草泥,草泥多用牛、马粪未消化掉的草末和泥而成。用牛、马粪和成的墙泥细腻,附着力强,泥皮光洁,不易开裂。这种涂墙之法在汉简中称之为“马矢涂”或“草涂”。墙壁涂上草泥后还需再抹一层白灰,以起防潮或挡风雨的作用,这种白灰叫“垩”。肩水地区常年干旱少雨,其屋顶一般采用架椽木,上面铺盖一层密布的芦苇,然后再铺一层泥,这样层叠压在一起,可保证风雨不入。

肩水边塞民众的日常起居生活什器在汉简中有着丰富的记录。汉代肩水地区吏卒和民众的汲水储水器种类丰富,材质多样,既有竹木制品、草制品,也有陶制品,还有一些铜铁器物。食物加工主要分前期的谷物舂磨和后期的烹饪。粮食加工的工具主要有臼和碓(石磨盘)。对米面诸食物进行蒸煮之用的则有釜、甑等炊煮器。生火方式主要是钻木取火,称之为“出火燧”(《金关》73EJD:47)。汉代进食米饭的工具主要有“柶”,在居延地区就曾出土有汉代木制柶。肩水边塞吏卒们日用的坐卧之具在汉简中有丰富的记录。榻亦称之为“床”,榻之上皆需铺席。“席”的种类较多,仅以居延汉简所记,就有筵、莞、韦席、苇席、蒲席、经席、藟席等。这些席多是由边塞选出的有纺织技能的戍卒编织而成。

从汉简记载来看,肩水边塞人们日常出行主要是陆路,出行方式有步行、骑行、乘车等等,而水路则主要是乘船为主。汉代居延地区的陆路交通工具以马或牛为畜力的车辆最为常见,但也有步行或人力推车出入肩水地区者。牛车是最为重要的载重工具之一。除牛车的大量使用外,另一种最为常用的代步工具就是马和马车了。河西汉简所记载的马,多为官马,受边塞各级部门管理使用。驿置机构备有驿马、传马供来往使者和官吏骑乘

驾车之用,同时也供驿卒用于官府文书邮件的传递。辚车是一种轻便的车辆类型。方相车主要用于拉载货物。居延边塞长城烽燧是沿着古弱水流域修建的,烽燧自南向北,从今酒泉市鼎新镇顺着弱水一直延伸至北边的尾间居延海。在弱水两边皆筑有烽燧,对于河宽水深之处,就需要备有专门的舟船。在地湾汉简中发现有“肩水候官永始四年七月破船簿”(《金关》73EJT23:94),其中就提到“毋余船”,指肩水候官目前没有多余的船供使用。可见,甲渠候官和肩水候官皆备有数量不等的船。由此推知,凡临河近的候官部燧可能皆备有渡河和载物之用的船。在地湾汉简中就专门记载有上级部门要求居延县需备船工十二人。

3161枚地湾汉简既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又是未经后人改动过的原始文献。地湾汉简是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塞政治制度、军事塞防、历史地理、邮驿交通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汉代丝绸之路的民族关系、中西交流、生产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所有这些都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认真整理和深入研究,以期能充分揭示地湾汉简的丰富内容和重要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地湾汉简整理与研究”(18BZS01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昭:《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册)》附:原简编码、出土地点、图版页码一览表,文物出版社,1987年。文中引用的居延汉简释文俱出是书,简称《合校》,不一一出注。

[2]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地湾汉简》,中西书局,2019年。文中引用的地湾汉简释文俱出是书,简称《地湾》,不一一出注。

[3]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五)》,中西书局,2015年。文中所引简文简称《金关》。

合水县元孟公信武显扬先墓碑研究

□王科社(甘肃省博物馆) 周占全(陇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内容提要:2015年夏,“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项目之甘宁子课题组在合水县调查发现元孟公信武显扬先墓碑。本文在整理碑文基础上研究认为,碑铭撰者是时任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刘垓,书者是时任绍庆珍州南平沿边宣慰使杨汉英,立碑时间为至大三年(1310年);考知孟懿先世因北宋熙宁年间“庆州兵变”将宗族分房散居,孟懿参与了至元四年(1267年)泸州之战、至元十九年(1282年)征缅之战、大德七年(1303年)平宋隆济叛乱,并于大德八年因招降叛猫功升信武将军、同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先后受到朝廷及镇守云南王、宗王相吾答儿、行省的褒奖或赏赐。碑中所述相关史实征信有据,是研究元代西南地区政治、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的珍贵资料。

关键词: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孟懿;宋隆济;庆州兵变;征缅之战

2015年夏,“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项目之甘宁子课题组在合水县陇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调查发现一块残碑,现场确认是“元同知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孟公信武显扬先墓碑”。该碑碑阳记文简要叙述了孟懿父母的生平,还记载了孟懿及其弟、其子的主要履历。孟懿为合水县定祥乡人,至元四年(1267年)智取泸州有功;十九年参与征讨入侵云贵之缅军;二十九年升李殿李上宫溪崖头崖尾铜鼓等处军民长官;大德元年(1297年)任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镇抚,七年参与平定宋隆济之乱,十一年任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帅。其弟孟进曾先后任骨龙里菁江木楼雍眼等处长官司长官、平

迟安德等处蛮夷长官司长官;其子孟惟忠先受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宣使。故此碑对研究元代云贵地区政治及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对碑文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略作研究。

一、碑刻现状与录文

碑原立于合水县定祥乡四家窑村定祥原孟氏家族墓地(俗称“孟元帅墓”)。“文化大革命”时期墓地被毁,碑首、碑座佚失,碑身被切割成两段,一段被村民做成石磨致使文字磨灭,现存一段呈“凸”字形,为石磨半成品,两面文字多泐蚀不清(照1、2)。2000年6月移存陇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保存。现存残碑为砂岩质地,残高116、宽91、厚23厘米。碑阳镌刻行楷体阴文,现存约1000余字,原



照1 元同知宣慰司副都元帅孟公显扬先墓碑碑阳及拓片

有文字共 39 行约 1500 字,满行 69 字。碑文记载了信武将军、同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孟懿等追荐、显扬已故父母之事。撰者、书者均因文残而不明。录文于下:

□□□□□□□□□□孟公信武显扬先墓碑」

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

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等处宣……」

□□□□□□□□□□家,必有余庆”,是知庆者善之报也。《书》曰“作善降之(百)祥”,又知祥者善之庆也。信矣夫,善之为报……」□□□□□□□□□□由是而克,盖昔人以种德积善为其堂宇,皆此意也。汉于公治狱多阴德,感报必高大其门闾……」□□□□□□□□□□响答声,曾无毫发之差。余观近世享余庆、百

祥之报者,同知副都元帅孟公家当是也。

孟氏系……」□□□□□□□□□□
□在城仓巷,自罹兵变,分派析房,或居景山,或居高楼南谷。今公号以还于合水县定祥原也……」□□□□□□□□□□
□长者。至元十二年,终于正寝,享年七十。公之母,府君夫人,梁氏女,为孟氏之邻,视府君必□……」□□□□□□□□□□
□至元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柩卜兆于西岩,葬乾山之原。公旦夕思其父母训育之恩,□□……」□□□□□□□□□□
□矣。累年所受……」□□□□□□□□□□
□然炫人耳目,傥不书刻于先莹,何以贵饰松楸、明昭令德?公之行,所谓尽忠尽孝者也。

公讳懿……」□□□□□□□□□□年,四川行省摘差,提军攻破泸州。赴阵摧敌,大建奇功,赐金襖子二领、宝钞数定

者以显父母恩毓,虽不敏,岂□能援笔为
孟公显扬之□□□……」

□□家世,居于庆阳。祖宗积德,城
仓为将。分城析房……」

□□□□,先莹定祥。□然□松,父
母□德。□□□□……」

□□□年岁次庚戌四月……」资□
□□……行省……」资德□□□□行省
……」……」……秀……」

碑阴中上部共 31 行 430 余字,刻《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节文,首行标题,第 2~7 行为真言启请,第
8~26 行为经咒,第 27 行表述刻经之缘,第 29~30
行标建造人,第 31 行标书写人。下部刻孟氏兄弟
姓名。刻文从略不录。

二、校记

第 1 行 本行“孟公”前残缺 10 字,应为“同知
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孟公指孟懿。碑文中记孟懿
于大德十一年(1307 年)任“信武将军、同知八番顺
元等处宣慰使司副都元帅之职”。

第 2 行 据虞集撰《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
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垓神道铭》^[1],
行末可能残缺“宣慰使都元帅刘垓撰文”等字。

第 3 行 据《元史·杨赛因不花传》^[2]、袁桷撰
《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3],此行“宣”字后
残缺“慰使播州军民安抚使管军万户杨汉英书丹”
等字。

第 4 行 本行“家”字前残缺。“必有余庆”典
出《易经·坤文言》,此字前应为“夫易坤文言曰积
善之”9 字。“祥”前脱“百”字。“作善降之百祥”出自
《尚书·商书·伊训篇》。“为报”后残缺字不明。

第 5 行 本行“由是”前残缺 9 字,“门闾”后
残缺字不明。

第 6 行 本行“响”前残缺 9 字,“孟氏系”后
残缺字不明。

第 7 行 本行“在城”前残缺 9 字,“定祥原

也”后残缺字不明。

第 8 行 本行“长者”前残缺 10 字,“必”后残
缺字不明。此处指孟公之父“享年七十”,《合水县
志》《陇右金石录》改“年”作“寿”^[4]。

第 9 行 本行“至元”前残缺 9 字,“之恩”后
残缺字不明。

第 10 行 “矣”前残缺 10 字不明。

第 11 行 本行“然”前残缺 9 字,“懿”后残缺
字不明。由“公之行,可谓尽忠尽孝者也。公讳懿”,
可知碑文及文题中的“孟公”即孟懿,墓主为孟懿
父母,碑文所述乃孟懿追荐显扬父母恩德之事。

第 12 行 本行“年”字前残缺 8 字,“明年”后
残缺字不明。据《合水县志》《陇右金石录》,孟懿参
与攻破泸州事在至元四年(1267 年)^[5],因此“年”前
必有“至元四”三字。据虞集《刘垓神道碑》,刘垓
“至元元年,从武敏战泸州紫云城,有功……四年,
筑眉、简,征守嘉定、泸、叙等州,攻破五获、石城、
白马、资江等塞,元帅又有功”^[6]。这条记载中的“武
敏”指刘整。刘垓随父刘整投元后,参加过至元元
年泸州紫云城之战和至元四年嘉定、泸州、叙州等
地战役,攻破五获、石城、白马、资江等塞。从这条
史料可知,至元四年确有泸州之战。《合水县志》
《陇右金石录》仅提及“勅赐金袄十二领、宝剑一
副”,“宝钞数锭”。按《元史》中统元年八月己酉“立
秦蜀行中书省,以京兆等路宣抚使廉希宪为中书
省右丞,行省事”^[7],至元三年十二月辛酉“诏改四
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也速带儿等
行中书省事”^[8]的情形分析,四川行中书省出现当
自至元三年始,故孟懿参与泸州之战应晚于至元
三年。碑中“明年”即至元五年,虞集《刘垓神道碑》
载“五年,过马湖江战泸川县又有功,六年,战龙坝
又有功”^[9],若孟懿为刘垓部下,则可能参与过泸川
县、龙坝两次战事。碑文显示,孟懿于至元五年前
后升敦武校尉、管军总把。

第 13 行 本行“武校尉”前凿残 5 字。“□武

校尉”，据残迹可能为“敦武校尉”。“大元哈鲁公墓碑”载虎哥赤“从大军渡江，收灭亡宋，大小百余战，被矢刃，创痕遍体，升敦武校尉、管军百户”^[10]，参考虎哥赤的情况，孟懿可能于至元五年之功升为“敦武校尉、管军总把”。据《合水县志》《陇右金石录》，孟懿于至元九年敬奉云南王令旨征战缅甸^[11]，但首任云南王忽哥赤于至元四年(1267年)八月丁丑受封，九月庚戌“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秃哥儿、金齿等处，诏抚谕吏民”^[12]，至元七年被毒杀，因此至元九年调孟懿者必非云南王忽哥赤。忽必烈在位时征缅有两次：第一次在至元十四年，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大理路总管段信苴曰、都元帅纳速刺丁等先后率部参战；第二次在至元二十年，宗王相吾答儿等将兵参战。第二代云南王为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系世祖忽必烈之孙，故称“皇孙云南王”。至元十七年十月“丙子，赐云南王忽哥赤印”^[13]，即将云南王印又赐皇孙也先帖木儿。若孟懿参加第二次征缅行动，故可能于至元十九年奉皇孙云南王之命而参与征缅行动。由此可知，碑文此行中“至元九年”应为“至元十九年”，脱“十”字。

第14行 本行“令旨”二字前凿缺5字，据残迹可能为“皇孙云南王”。

第15行 本行“儿大王”前凿缺5字。据《合水县志》《陇右金石录》录文内容有孟懿“又受於答儿大王令旨，昼夜暴露，攻破缅甸，大建奇功，勅赐金袄一袭、宝钞五十”事^[14]，因此，行首残缺5字可能是“诸王相於答”。“於答儿”又作“吾答儿”。但诸王相吾答儿征缅在至元二十至二十一年间。至元十九年二月“议征缅甸，以大卜为右丞，也罕的斤为参政，领兵以行”^[15]，至元二十年五月戊午，丞相伯颜、诸王相吾答儿等言“征缅甸军宜参用蒙古、新附军”^[16]，可见这次战事实从至元十九年已开始实施。

第16行 本行前凿缺6字。承前行“受”，下行另起行并接“□□□□□儿大王令旨”，则本行

缺6字可能为“云南王又蒙受”。

第17行 本行“大王”前凿缺6字，应为“诸王相於答儿”。

第18行 本行“百户”前凿缺6字，据文意应为“忠武校尉、管军”。碑文显示孟懿约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升为忠武校尉、管军百户。

第19行 “宣命”后凿缺4字，应为“武德将军”。“□殿李”即“李殿李”。“李殿李上宫溪崖头崖尾铜鼓等处军民长官”，即李殿李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元人陈元靓撰《事林广记·前集》卷四“郡邑类”之“都云定云等处安抚司”下记载为“李殿李上宫溪崖头崖尾铜鼓等处军民长官”^[17]，与此碑同。《元史·地理六》“湖广行中书省”下记作“李稍李殿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18]，有误。碑文显示，孟懿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四月升为武德将军、李殿李上宫溪崖头崖尾铜鼓等处军民长官。

第20行 “宣命”后凿缺四字，应为“授武德将”。元置八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初隶四川行省，至元二十八年改隶湖广行省。故大德元年时孟懿又归湖广行省。至元十六年(1279年)设八番宣慰司。八番，即程番、韦番、方番、洪番、龙番、金石番、罗番、卢番，共八番，其居地在今贵州省惠水。至元十七年设顺元路宣抚司，翌年改为宣慰司。至元二十年(1283年)置贵州等处长官司，为顺元路治，先隶四川行中书省，后隶湖广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九年，顺元、八番两宣慰司合并，设八番顺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于顺元城(今贵阳)。该碑显示，孟懿于大德元年(1297年)升任武节将军、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镇抚。

第21行 “宣命”后凿缺四字，应为“□□将军”。从孟懿资历看，可能在大德七年(1303年)因平定宋隆济之乱功而升“宣武将军”官阶。

第22行 本行“一袭”前凿缺六字，据《合水县志》《陇右金石录》所记碑文内容中有“勅赐金袄一袭、宝钞五十”事^[19]，可知“一”前两字为“金袄”。

第23行 本行六字凿缺,后二字应为“勅受”。

第24行 本行“讫”字前凿缺六字。碑文显示,孟懿在大德八年任招讨使,后因功升显武将军。

第25行 本行“武将军”前凿缺六字,据《合水县志》《陇右金石录》所记碑文内容中有“钦受宣命符〔授〕信武将军、宣慰使副都元帅”^[20],可知“武将军”前一字为“信”。

第26行 本行“百户”前凿缺六字,后二字应为“管军”。

第27行 本行首凿缺六字。梁王,指第二代梁王松山。第一代梁王名甘麻刺,系元世祖太子真金之长子,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封梁王,出镇云南;二十九年,改封晋王。其子松山至元三十年封梁王。

第28行 本行“龙”字前残缺九字,《元史·地理六》湖广行省之“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下蛮夷军民长官司中有“骨龙、龙里、清江、木楼、雍眼等处”^[21],可知第九字当为“骨”。“清江”,本碑作“菁江”。

第29行 本行“安德”前残缺九字,《元史·地理六》湖广行省之“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下蛮夷军民长官司内有“平迟、安德等处”^[22],可知“安德”之前二字为“平迟”。

第30行 “知事”前残缺9字。

第31行 “显扬”前残缺9字。

第32行 “显扬”前残缺9字。

第33行 本行及下一行为铭辞。本行“家世”前残缺二字,当为“孟公”。

第34行 本行首句四字,前二字残缺,后二字凿残而不可辨。

第35行 本行标树碑时间。“年”字前缺一字、凿残二字,应为“至大三”三字。“岁次庚戌”,据文中孟懿任信武将军、同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其弟孟进于至大元年任平迟安德等处蛮夷长官等情况分析,故当为至大三年(1310年)。

三、相关问题研究

该碑是元同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副都元帅孟懿为其父母所立。孟懿的父亲,虽因石残而不可知其名,但据碑文“至元十二年,终于正寝,享年七十”。孟懿母梁氏,实为孟氏乡邻,其生卒年不可知晓。关于孟懿父母墓,明嘉靖《庆阳府志》卷十四“合水县”下误记为“金牌孟元帅墓”,并注明“在县城西四十六里定祥原,仍葬元良将孟懿处,有碑文”,今据残存“同知宣慰司副都元帅孟公显扬先墓碑”,参考清《合水县志》中有关零星文字,应是从此碑抄录,可知是孟懿为此墓立碑,意在显扬、追荐双亲功德,故确认此墓为其父母墓,非孟懿墓。至于孟懿究竟葬于何处,目前尚不知晓。

清《合水县志》、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中以“孟元帅碑”为题著录,称已佚不存^[23]。整理碑文可知将此碑称“孟元帅碑”是不准确的,如清《合水县志》把孟懿与其父混淆,碑文明确其父歿于至元十二年,享年七十,而孟懿于大德十一年任“信武将军、同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副都元帅之职”。碑阳文字叙述了孟懿先世在陇东地区的发展状况,至大三年孟懿追荐父母恩德的行孝事迹,特别是记载了孟懿主要战功、封赏与宦历情况。现就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碑文撰者与书者

按照惯例,碑文第2、3行应是标明碑文撰写人与书丹人,但因碑被凿残,仅见他们的部分官职。通过仅见官职可以考知撰写人为刘垓,书丹人为杨汉英(赐名赛因不花,或作赛音不哈)。

第2行仅存“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数字,不知撰者姓名。据其身份,应为刘垓。虞集撰《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公神道铭》记载,刘垓于大德八年(1304年)“拜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金虎符。蛮酋南列等归化,拜弓矢衣甲之赐”,至大三年“移镇广

东”^[24]。从这条史料看,刘垓确于大德八年至至大三年间有“奉国上将军”的官阶,并且担任过湖广行省的“参知政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与此碑上现存文字较合。而孟懿在大德十一年任同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副都元帅,成为刘垓的副手。因此,碑文撰写人当是刘垓。

第3行仅存“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等处宣”数字,不知书者姓名。据《元史·杨赛因不花传》,杨汉英之父杨邦宪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奉版籍内附,授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而杨汉英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授宣抚使”,至大四年(1311年)“诏许世袭”^[25]。袁桷撰《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载世祖忽必烈说“杨氏子孤弱可愍。母子远来,宜悉以父爵锡袭之,赐名赛音不哈”,故杨汉英袭其父爵与职,“授金虎符,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安抚使。后加管军万户,复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进资德大夫,勋上护军”^[26]。但杨汉英死后,其长子杨嘉贞应袭世职,“为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上护军”^[27]。那么书丹人可能是杨汉英、杨嘉贞父子。

关于杨汉英卒亡时间,袁桷撰《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记载为“大德四年,南蛮卢奔掠劫,大姓依险鬻自固,黎鲁在新部者亦啸劫蚁聚……卒命公抚谕……六年,诏出师复征蛮,命公与田茂忠率二州民兵专讨之……七年,茂忠始来,议分民兵守险,而公以疾薨,年止四十”^[28],似乎说卒于大德七年(1303年)。然而《元史·杨赛因不花传》所载与此不同,说杨汉英于大德八年“复入见,进资德大夫”,又于至大四年“加勋上护军,诏许世袭”,延祐六年(1319年)“卢崩蛮内侵,汉英与思州宣慰使田茂忠讨之,以疾卒于军,年四十”^[29]。今整理分析,袁桷撰《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

中或于“六年”“七年”前脱漏年号“延祐”二字。《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说“至元二十二年,公(杨邦宪)薨。是生公讳汉英,字熙载,年甫五岁”^[30],显示是年杨汉英五岁,逆推当生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若以延祐七年作为杨汉英卒亡时间逆推,结果也是出生于至元十七年。然而其传却称至元二十五年“再入觐,时年十二”^[31],以此而推又生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则杨汉英享年44岁,或有虚增年龄之嫌。杨嘉贞袭职当在延祐七年。从杨汉英死亡至至治二年(1322年)杨嘉贞请元英宗赐恤典,相隔达三年之久,与杨嘉贞所言“先臣歿有年”^[32]的情况基本相符。因至大三年杨汉英仍活于世,故孟公信武显扬先墓碑的书丹人可能是杨汉英。

(二)碑文反映的孟懿先世状况

碑文第6行、第7行记载“孟氏系……在城仓巷,自罹兵变,分派析房,或居景山,或居高楼南谷。今公号以还于合水县定祥原也”,主要讲述孟懿之祖宗及族人居住、分居地点。后第33行有“□□(孟公)家世,居于庆阳。祖宗积德,城仓为将。分城析房”字。结合两处,可知孟氏一族,本系合水县定祥原人,后徙居庆阳府(今庆城县城)。

“在城仓巷”,“城”即庆阳城。按庆阳沿革,“宋初仍为庆州。乾德元年复为安化郡。治平以后,与环州定为环庆路。政和中,升庆阳军节度。宣和七年,改为庆阳府”,“金初改安国军,后改安定军节度使兼总管”,“皇统二年,置庆阳总管府”,“元初为庆阳散府”^[33],由此可知庆州城改名庆阳城大约在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仓巷”之地,至今庆城县城内仍存其名。

景山,明嘉靖《庆阳府志》卷二“山川”下记“在(庆阳府)城西一百一十里,多奇木怪石,及产獐鹿、猿猴之属”,卷三“里甲”下又记“在(弘化)县西一百里,统惠家庄、赵家村”^[34],若按里程计算当为今庆城县西55公里处的巴家山。

高楼,明嘉靖《庆阳府志》卷三“里甲”下记“在(弘化)县南一十里,统樊家村、王家村、花村”^[35],即今庆城县高楼乡所在地。

定祥,明嘉靖《庆阳府志》记“在(合水)县西六十里,统左村、郝家村”^[36],在今合水县定祥乡境内,地名仍存。孟懿某代祖曾在庆阳城内的仓巷为将。在北宋末年因遭“兵变”而分为数支,除在庆阳城内居住外,一支在庆阳景山,一支在高楼南谷。当孟懿成为副都元帅后,全部回迁至合水县定祥原聚族而居。

孟懿先世遭遇的兵变,很可能指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庚辰日在庆州发生的庆州兵士叛乱的事件,时任环庆路经略使王广渊称“庆州兵变”^[37]。这次兵变又称“庆州兵乱”,导火索是邠宁广锐都虞候吴逵的冤案。这个冤案的制造者是深受陕西宣抚使韩绛宠信的王文谅。此人本为西夏重臣讹庞之家奴,因得罪其主而归投于宋之延州。韩绛将他提升为指挥使,又因王安石的推荐升为閤门祇候。在熙宁四年正月的一次出界作战中,王文谅偏纵蕃兵欺压汉族军士,“凡官军斩级,多夺与蕃兵,至掘塚戮尸为级”。邠宁广锐都虞候吴逵在这次作战中,率众力战,用铁连枷杀贼首领,但王文谅指使部下抢夺西夏首领的首级,并借机诬称“以夜至野依,会与贼斗,呼逵不至,及扇摇军士”,于是宣抚司将吴逵关押“庆州狱四十余日”。当韩绛来到庆州,偏听偏信将要斩杀吴逵。为营救吴逵,“部卒喧呼,欲割刃于绛”。王广渊急忙将情况告知韩绛,才使吴逵免遭冤杀,但是吴逵被再次关进庆州监狱。后韩绛命庆州出兵牵制围攻啰兀城的西夏军,但吴逵部下“广锐两指挥军士谋拥逵为乱”,当夜焚烧庆州北城救出吴逵。吴逵即率两千军士“大噪纵掠,斩关而出”。“逵所以反,由文谅激之也”。后经王广渊、东路都巡检姚兕劝说大多数投降,部分被林广部追击斩杀^[38]。

孟懿的祖先本是庆州城粮仓的守将,亲历了

这次兵变,目睹了战友及其亲属被杀的惨状,出于保全宗族的目的不得不将宗族分房散居。于是出现孟氏族人“或居景山,或居高楼南谷”的情形。孟懿的父亲“至元十二年,终于正寝,享年七十”,由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逆推,可知他约生于金泰和五年(1205年)。此年上距熙宁四年庆州兵变134年,可知在庆阳城仓巷为将者可能是孟父的高祖或更早一代。

(三)碑文涉及的孟懿战功

通过整理碑文,获知孟懿于至元五年前后升敦武校尉、管军总把,至元二十四年升为忠武校尉、管军百户,至元二十九年四月升为武德将军、李殿李上宫溪崖头崖尾铜鼓等处军民长官。大德元年升任武节将军、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镇抚,大德八年任招讨使,大德十一年任信武将军、同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孟懿升职与其所获战功密切相关。

1. 至元四年参与泸州之战

碑阳第12~13行记述孟懿被“四川行省摘差,提军攻破泸州”,关于此事的真实性,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是至元四年是否存在四川行省的问题。《元史·世祖一》中统元年八月己酉“立秦蜀行中书省,以京兆等路宣抚使廉希宪为中书省右丞,行省事”;《世祖三》至元三年十二月辛酉,“诏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也速带儿等佥行中书省事”。按此条史料载四川行中书省出现当处此时始。故孟懿参与泸州之战应晚于至元三年。其次,至元四年是否存在泸州战事。据虞集《刘垓神道碑》,刘垓“至元元年,从武敏战泸州紫云城,有功……四年,筑眉、简,征守嘉定、泸、叙等州,攻破五获、石城、白马、资江等寨,元帅又有功”^[39]。这条记载中的“武敏”指刘整。刘整原为南宋泸州知州兼潼川安抚副使,于中统二年(1261年)六月率部降元。刘垓随父刘整投元后,曾参加过至元元年(1264年)泸州紫云城之战和至元四年(1267年)嘉定、泸



州、叙州等地战役,攻破五获、石城、白马、资江等寨。从这条史料可知,至元四年确有泸州之战。

作为“元同知宣慰司副都元帅孟公显扬先墓碑”记文撰写者的刘垓,正是参加至元四年泸州之战的军事将领,故记文讲述孟懿于至元四年受“四州行省摘差,提军攻破泸州”“大建奇功”,而受“赏金袄子二领、宝钞数定与宝剑”之事是可靠的。

2. 至元十九年参与征缅之战

云南行省始设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云南行省地域辽阔,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西昌和凉山州,以及缅甸北部和中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是联接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桥头堡。碑文第14~17行记载,“至元(十)九年,敕奉皇孙云南王令旨,专使辟君,乘传远□,征战缅甸。又受诸王相於答儿大王令旨,授行省前军镇抚支划军事。继随行省昼夜暴露,攻破缅甸,首建大捷。蒙受云南王、又蒙受诸王相於答儿大王令旨,赏战马□匹、金段□二表里”。碑文显示,原在四川行省刘垓部的孟懿受云南王也先帖木儿调遣到达云南,参与征战缅甸蒲甘王朝,应该是主要作战将领之一。

中缅交往早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经由“蜀身毒道”而开展。东汉开辟的永昌道,促进了两地间的交往。公元7~9世纪,处于兴盛时期的缅甸骠国使团经南诏、四川成都到达长安。11世纪中叶,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兴起了蒲甘王朝(1044~1287年)。蒲甘位于缅甸中部,地处伊洛瓦底江中游左岸。蒲甘王朝(1044~1369年)以缅族为主体,立都于蒲甘,其国王阿奴律陀经10余年的征战统一了伊洛瓦底江流域,成为缅甸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国^[40]。崇宁五年(1106年),蒲甘王朝遣使向北宋入贡^[41]。到了元代,中缅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更为频繁、更大规模、水平更高也更有持续性的时期^[42],交往规模之大超越前代。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军队攻灭大理政权后,到至元十三年

(1276年)设立云南行中书省(包括今云南省及缅甸北部、老挝北部在内)并直接以此为基地向西南推进对外交往。

实际上,自至元八年(1271年)起,忽必烈曾多次遣使招降蒲甘,但蒲甘国王没有理会。同时,蒲甘王朝的势力也在向北发展至金齿地区(今云南保山、德宏及境外地区)。至元十四年金齿总管阿禾归元,蒲甘王朝集结重兵进攻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与元产生冲突,于是元廷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征缅军事行动。这次征缅始于至元十九年二月,“议征缅甸,以大卜为右丞,也罕的斤为参政,领兵以行”,后“诏金亦奚不薛及播、思、叙三州军征缅甸”^[43],到八月“发罗罗斯等军助征缅甸”^[44];至元二十年五月,丞相伯颜、诸王相吾答儿等上奏“征缅甸军宜参用蒙古、新附军”^[45]。元廷先后动员湖广、四川数万大军,由诸王相吾答儿及云南行省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分三道征缅,太卜由罗必入甸,也罕的斤由阿者江转达阿禾江乘船而下,吾答儿由骠甸入缅与太卜军会合,三路齐会于江头城(今缅甸八莫),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攻破此城,击杀一万余人。至元二十一年正月,水陆并进,攻拔建都太公城(今缅甸达冈),缅甸及建都投降^[46],随之设立征缅省。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乘蒲甘王朝发生内乱之机,元军攻占蒲甘。蒲甘成为元之藩属,国王乔直与元朝建立了三年一贡的关系。孟懿在这次征缅战役中,奉诸王相於答儿大王之命,担任云南行省前军镇抚谋划行军方案,而后随征缅大军攻破江头城、太公城,因而受到云南王和於答儿大王的赏赐。

3. 大德七年参与平定宋隆济叛乱

碑文记载孟懿于大德七年“平葛蛮贼宋隆济,□□□□□……钦受宣命宣武将军,掌职事如故,□□勅赐金袄一袭,宝钞五十定,鞍辔、弓箭各一副”。宋隆济本为雍真葛蛮土官,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授云南宣抚司左同知。大德元年(1297

年),八百媳妇国兵围彻里,大将也先不花奉命讨伐四年不克,元成宗命右丞刘深率领湖广、云南兵二万,取道顺元进讨。大德五年五月,云南行省左丞忽乃发出要求雍真、乖西等部各出马百匹,以备征战的紧急文书,引发宋隆济联结木楼等族的反抗,在紫江苗人的协助下攻破杨黄寨(今贵州开阳县城),烧雍真葛蛮总管廨舍,杀总管府达鲁花赤也里千家奴阿麻等。龙骨长官阿都麻、肋底窝总管龙郎、古龙马阿都所部都揭竿响应,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广西诸路蛮酋都起兵反抗,自贵州至新添、界喉、瓮坡,北至播州界刀项路及卜邓加、鹤鸣等站均遭焚劫,致使刘深大军道阻贵州境内。宋隆济移兵攻贵州,先后杀死知州张怀德和将远征八百媳妇国的行军总管张弘刚。水西土官之妻奢节因受刘深的压迫、胁迫,不得已召集水西各族联络宋隆济等合围刘深,刘深所部士卒多数被杀。梁王阔阔遣云南行省平章床兀儿、参政不兰溪率兵救援,击杀宋隆济大将撒月,救出刘深。后梁王因母亲遇害,亲自指挥征讨。大德六年刘深等被拘拿进京问罪。大德七年二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国杰、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也速带儿、四川宣慰使参知政事汪惟勤将兵一万进驻思、播两州,四川行省八刺及阿塔赤将兵五千,与思州田氏、播州宣慰使杨汉英等共讨宋隆济、奢节。九月,平叛大军师出播州,奢节、宋隆济所率蛮兵大败。前后激战40多次,叛乱之势渐消。大德七年正月刘国杰在墨特川大败奢节,二月奢节等40余人出降,四月诏斩奢节等。宋隆济虽然逃逸,但终被其族人宋阿重生擒而斩杀。这场叛乱平定后,刘国杰奉诏率将士进京觐见,赏赐甚厚,将士迁官有差。孟懿于至元二十九年四月任李殿李上官溪崖头崖尾铜鼓等处军民长官,大德改元四月升任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镇抚,至大德七年已在贵州一带为官长达十三年之久,对当地民情十分熟悉。他率部于大德七年参与平定宋隆济叛乱,因

此也受到赏赐。

4. 大德八年招降叛猫狃狃酋长

碑文称“大德八年,为招讨使,叛猫酋长满朝、狃狃酋长必梅、必□□□……”,大概是记录孟懿任招讨使后,参与叛乱的猫人、狃狃等族也相继归顺,孟懿再次立功受到嘉奖或升赏。宋元时期西南地区的“猫”即今苗族先民的专称,元代八番顺元宣慰司、播州宣慰司境内诸蛮中就有“猫人”。狃狃即仡佬,又作狃猓^[47]、盖脑,本意为竹,其人自称为竹王之后^[48],故名。历史上,仡佬人曾活动于贵州、湘西、广西、四川、云南,现主要分布于云贵高原东部以贵州为中心的湘西、川南、滇东北、桂西北一带。如《元史·地理六》“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下“八番顺元蛮夷官”中就有“木瓜狃猓蛮夷军民长官”^[49]。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称晃州诸卫所“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狃猓,曰红狃猓,曰花狃猓,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总之槃瓠子孙”^[50]。

元代八番顺元宣慰司所辖的猫人及狃狃族时服时叛。据无名氏《招捕总录》“八番顺元诸蛮”下记载,大德二年四月八番桑柘蛮王二万、马虫等叛乱,马虫一度聚7000余人,“又与叛猫狃狃必际等蛮,结连瓮槐了江等处猫人作乱”;大德四年正月,“猫桑柘遣所部文何,持竹契、长刀及方物来降”,不久黄平府向朝廷报告说“桑柘附近之重奥、必际、都阵狃猓必梅等二十二寨,刻契来降”,是年七月果有三百余寨来降;大德五年正月,党兀指使“板桥郎来、重陂翟化猫烧劫百纳寨”^[51]。

宋隆济事变,也引发八番顺元宣慰司境内的猫人狃狃等族叛乱。《新元史·地理六》“木瓜狃猓蛮军民长官”下记“元初,番酋石朝玺归附,设长官司。木瓜狃猓,亦作水东狃猓,此金石番之分族”^[52]。正因为这支狃猓与水东宋隆济部相邻而居,所以也参与了大德七年抗元事变。当大德七年宋隆济



等被擒斩后,虽大势已定,但余党仍有漏网或顽抗者。大德八年,尚有猫人(苗族)、犵狁等没有平定,故朝廷临时任命孟懿为招讨使继续平灭。孟懿采取招降的措施,使叛猫酋长满朝、犵狁酋长必梅等陆续投顺,因此,他因功受赏。

四.结语

经整理研究可知,陇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保存的这通元代残碑原本竖立在合水县定祥原孟懿父母墓前的,碑题当为“同知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孟公信武显扬先墓碑”,碑铭撰者可能是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刘垓,书者可能是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沿边宣慰使杨汉英(即赛因不花);树碑时间“岁次庚戌”即至大三年(1310年)。孟懿等树碑的目的是显扬、追荐其父母的功德。

孟懿的高祖或更早一代在北宋曾任庆州城粮仓的守将,可能亲历了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发生的“庆州兵变”,目睹战友及其亲属被杀的惨状,出于保全宗族的目的不得不将宗族分房散居,于是出现孟氏族人“或居景山,或居高楼南谷”的情形。

孟懿作为武将,参与了至元四年泸州之战、至元十九年征缅之战、大德七年平宋隆济之乱,并于大德八年成功招降叛猫犵狁酋长,先后因功升敦武校尉、管军总把,历升忠武校尉、管军百户,武德将军、李殿李上宫溪崖头崖尾铜鼓等处军民长官,武节将军、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镇抚,信武将军、同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多次受到朝廷或云南王也先帖木儿、诸王相吾答儿及行省褒奖或赏赐。其弟孟进曾先后任骨龙龙里菁江木楼雍眼等处长官司长官、平迟安德等处蛮夷长官司长官;其子孟惟忠先受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宣使。碑中所述相关史实均征信有据,对元代西南地区政治、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42)子课题“甘宁片区”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王茂华、刘冬青:《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按:虞集撰《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公神道碑铭》,1951年苏州过云楼顾氏捐赠,现藏上海博物馆。|

[2]《元史》,第3884~3885页,中华书局,1976年。

[3](元)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第11~15页,(清)仓圣脉等修:《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五·别集类》影印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4]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民国十二年。

[5]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

[6]王茂华、刘冬青:《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

[7]《元史》,第67页。

[8]《元史》,第112~113页。

[9]王茂华、刘冬青:《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

[10](清)白明义修:《汝州全志》,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11]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

[12]《元史》,第115页。

[13]《元史》,第226页。

[14]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

[15]《元史》,第240页。

[16]《元史》,第253~254页。

[17](元)陈元靓:《事林广记·前集》卷四“郡邑类”之“都云定云等处安抚司”下,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

[18]《元史》,第1544页。

[19]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

- [20]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
- [21]《元史》,第1545页。
- [22]《元史》,第1546页。
- [23]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五。
- [24]王茂华、刘冬青:《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
- [25]《元史》,第3884-3885页。
- [26](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第12页。
- [27](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第14页。
- [28](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第13页。
- [29]《元史》,第3884-3885页。
- [30](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第12页。
- [31]《元史》,第3885页。
- [32](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第14页。
- [33](明)赵廷瑞修:《陕西通志》卷之九,第397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 [34](明)傅学礼、(清)杨藻凤:《庆阳府志》,第30页、4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 [35](明)傅学礼、(清)杨藻凤:《庆阳府志》,第41页。
- [36](明)傅学礼、(清)杨藻凤:《庆阳府志》,第43页。
-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第5403页,熙宁四年四月丙寅条,环庆路经略使王广渊言:“昨庆州兵变,臣以权宜榜谕,应缘坐家属皆特免罪。今准朝旨,具人数、军分、姓名,窃虑别有处置,欲望少假臣阃外之权。”中华书局,1985年。
-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庚辰条,第5361~5362页。
- [39]王茂华、刘冬青《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
- [40]贺圣达:《元明清时期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 [41]《宋史》,第14087页,中华书局,1977年。
- [42]贺圣达:《元明清时期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 [43]《元史》,第240页。
- [44]《元史》,第245页。
- [45]《元史》,第253~254页。
- [46](元)无名氏:《皇元征缅录》,第6~7页,(清)阮元辑:《宛委别藏》第4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 [47](明)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犵狫,一曰犵獠,其种有五……各有族属,不通婚姻。殄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以木主若圭,罗树其侧,号曰家亲殿”。
- [48]张泽洪:《中国西南的仡佬族及其宗教》,《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12期。
- [49]《元史》,第1540页。
- [50](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卷五,第三九八页~第三九就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51](元)无名氏:《招捕总录》,阮元辑《宛委别藏》第51册,第40~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 [52](民国)柯劭忞撰:《新元史》卷四十四《地理六》,台北艺文印书馆,1956年。

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考述

□张明鹏(陇东学院陇东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出土于庆城县马岭镇东北侧二里徐家庄附近,志铭、志盖现分别保存在庆阳市南佐遗址博物馆、庆城县如意宾馆民俗博物馆。志文由明嘉靖饶阳堡岢岚州岢岚县知县袁彪于嘉靖三年(1524年)撰书,其中包涵较丰富的明代历史相关信息。本文在整理基础上,就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关键词:庆城县;赵母范氏;赵兴;赵英;赵岢;延绥总兵

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出土于庆城县马岭镇东北侧二里徐家庄附近,修建银西高铁时被挖出,志铭和志盖分散,墓址已被完全毁坏。志铭、志盖现分别保存在庆阳市南佐遗址博物馆和庆城县如意宾馆民俗博物馆。该墓志制作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志文撰者、书者及篆盖者是代府饶阳王府教谕袁彪。志主赵母范氏的长子是延绥总兵、征虏将军赵英,赵英之孙赵岢曾为大同总兵官,赵岢之长子赵梦麟曾任延绥总兵官,其家族可谓声名显赫。该墓志包涵较丰富的明代历史信息,为研究宁夏总兵征虏将军赵英及其家族状况、庆阳卫及马岭与延绥镇关系、明代总兵等职官名称及职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墓志现状、录文及校释

(一)墓志现状与录文

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系砂岩材质。志盖方形,边缘略有残损,边长70、厚15厘米,盖面磨

光,阴刻篆体“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铭”3行12字(封二-1)。志铭大略呈方形,边长65~70、厚12厘米,两侧边缘残损严重,致第1、2、30、31行部分文字残缺;刻阴文楷体共31行计850余字,正文满行30字,第2、18、24行均拾格;首行题“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铭)”12字,次行标撰者、书者及篆盖人“明宗室代府饶阳王□□□□□□□□□□岢岚县事郡人袁彪”,末行署时间为“嘉靖三年岁次甲申八月癸酉……”。志文记录了明代东路延绥(副)总兵征虏将军赵英之母太夫人范氏的生平及子女情况(封二-2、照1)。墓志铭录文如下:

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铭

大明宗室代府饶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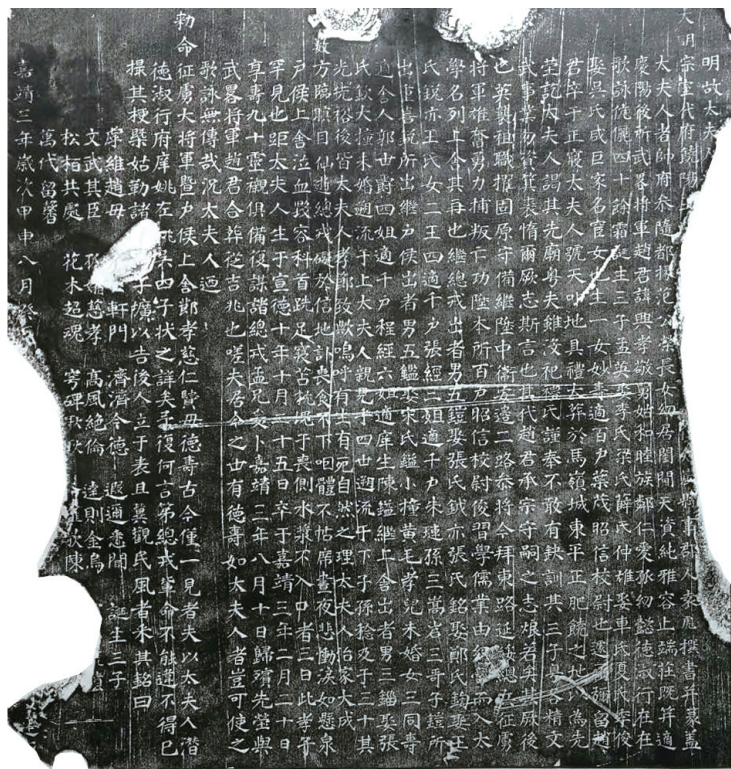
□□□□□□岢岚县事郡人袁彪撰书并篆盖

太夫人者,帅府参随都掾范公荣长女,幼居闺闾,天资聪雅,容止端庄。既

筭,适]庆阳后所武略将军赵君讳兴。孝敬舅姑,和睦族邻,仁爱孤幼,懿德淑行,在在]歌咏。伉俪四十余霜,诞生三子:孟英娶李氏、梁氏、薛氏,仲雄娶车氏、夏氏,季俊]娶吴氏,咸巨家名宦女也。生一女妙寿,适百户叶茂,昭信校尉也。遽尔弥留,赵]君卒于正寝,太夫人号天叩地,具礼大葬于马岭城东平正肥饶之地,以为先]莹。讫,太夫人谒其先庙:“粤夫虽没,祀礼氏谨奉不敢有缺。”训其三子:“粤各精文]武事业,勿资箕裘,惰尔厥志!”斯言也,其代赵君承宗、守嗣之志,娘若矣!其厥后]也,英袭祖职,擢固原守备,继升中卫、安边二路参将,今拜东路延绥总兵、征虏]将军。雄奋勇力捕叛亡,功升本所百户、昭信校尉。俊习学儒业,由乡学而入太]学,名列上舍。其再也,继

总戎出者男五:铠娶张氏,钺亦张氏,铭娶郑氏,筠娶王]氏,锐亦王氏。女二:王四适千户张经;二姐适千户朱璉。孙三:嵩岩、三哥子,铠所]出;重喜,锐所出。继户侯出者男五:鉴娶宋氏,镒、小撞、黄毛、孝儿未婚。女三:同寿]适舍人郭世爵;四姐适千户程经;六姐适庠生陈镒。继上舍出者男三:镗娶张]氏,钦、大撞未婚。溯流于上,太夫人亲见乎四世;溯流于下,子孙稔及于三十。其]光先裕后,皆太夫人孝节致欤?呜呼!有生有死自然之理,太夫人治家大成。]□数方临,瞋目仙逝,总戎碍于信地,讣丧食不下咽,体不帖席,昼夜悲恸,泪如悬泉。]户侯、上舍泣血毁容,科首跣足,寝苫枕块于丧侧,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此孝子]罕见也!距太夫人生于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卒

于嘉靖三年二月二十日,]享寿九十,灵襚具备。复谋诸总戎孟兄,爰卜嘉靖三年八月十日归殡先莹,与]武略将军赵君合葬,从吉兆也。嗟夫!居今之世,有德寿如太夫人者,岂可使之]歌咏无传哉?况太夫人适]勅命征虏大将军暨户侯、上舍节孝慈仁贤母,德寿古今仅一见者!夫以太夫人潜]德淑行,府庠姚、左、姚、吴四子状之详矣,予复何言?第总戎辈,命不能违,不得已]撮其梗概,故勒诸□,□于圻以告后人,立于表且冀观民风者采。其铭曰:]庠维赵母,□□轩门,济济令德,遐迩悉闻。诞生三子,]文武其臣。孤孀慈孝,高风绝伦。达则金乌,



照1 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铭拓片

□□□坟，松柏共处，花木超魂。穹碑啾啾，
□匪歌陈？□□□□，万代留馨！」

嘉靖三年岁次甲申八月癸酉……建

□。

(二)墓志校释

“明故太夫人范氏”为明嘉靖三年(1524年)时任东路延绥总兵征虏将军赵英之母。范氏为延绥镇帅府(总兵府)参随都掾范荣的长女,15岁嫁庆阳卫后千户所武略将军赵兴。夫妻相守40余年,生子女四人:长子赵英(又作赵瑛,延绥总兵、征虏将军)、次子赵雄(百户、昭信校尉)、女赵妙寿(夫百户叶茂、昭信校尉)、季子赵俊(太学生)。范氏生于宣德十年(1435年)十月二十五日,卒于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初十日,享年九十岁。于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葬于庆阳府安化县(今庆城县)马岭古城之东的赵兴之墓。

第1行 “明故太夫人”后面残字,据志盖当为“赵母范氏墓志铭”。

第2行 “代府”即代王府,这里指代懿王朱俊杖(1499~1527年在位),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封世子,十二年袭封,嘉靖六年薨,在位二十九年,寿四十八^[1]。“饶阳”即明真定府晋州饶阳堡。“饶阳王”是明宗室亲王代藩的支系郡王之一,碑文所涉及的是饶阳庄王即朱聪(1487~1536年在位)。袁彪,明《嘉靖庆阳府志》卷十二载为“教谕”^[2],据碑应为饶阳王府之教谕。

第3行 “帅府”指延绥镇总兵府,位于延绥中城鼓楼西,天顺中置^[3]。

第4行 “庆阳后所”即陕西都指挥司庆阳卫后千户所。庆阳卫,洪武四年(1371年)置,下属左千户所、右千户所、中千户所、后千户所、中左千户所、环县守御前千户所、安边守御千户所^[4]。

第7行 “马岭城”即今庆城县马岭镇东北侧二里徐家庄附近的古城,明成化间巡抚马文升复修为镇,原隶环县,雍正时归安化^[5]。

第12行 “总戎”指延绥总兵赵英。

第14行 “户侯”即庆阳卫后所百户、昭信校尉赵雄。

第15行 “上舍”指国子监上舍生赵俊。

第17行 “灵櫬”疑为刊刻之误,应为“灵榇(椁)”即灵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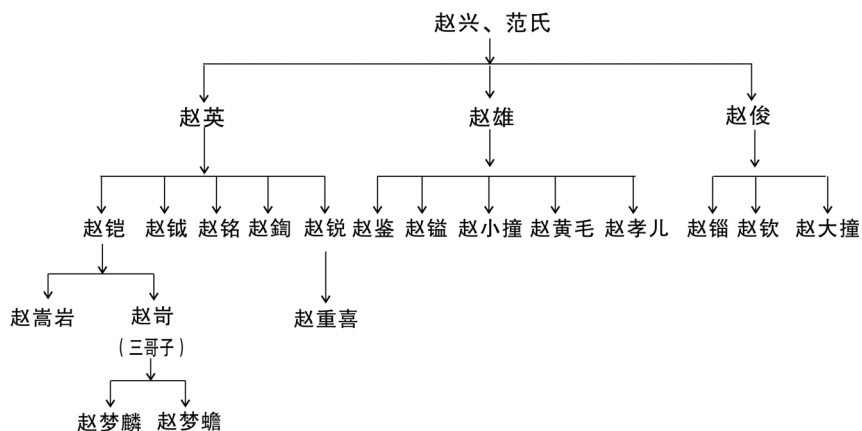
第24行 “勅命征虏大将军”指赵英。

二、赵兴夫妇合葬墓地及其家族世系情况

根据墓志记载,赵兴夫妇合葬墓地位于马岭古城东北。现根据出土位置判断,位于庆城县马岭镇东北侧二里徐家庄附近。马岭城,在县城西北部40公里处的环江东岸,是古代通往宁夏的交通要道。因东沟河与环江间有一山岭,状似马颊,故名马岭,汉代为北地郡郡治。隋、唐皆设县。宋范文正公筑城,城周375步,宋、金、元等朝代废县为镇。明成化间,巡抚马文升再次修筑。清雍正八年(1730年),划归安化县(今庆城县)^[6]。

赵兴是榆林人,先为庆阳卫后千户所千户、武略将军,后被诬陷调任榆林卫,因病而亡。因何埋葬于马岭城东呢?原因应该有二:其一,庆阳卫隶属三边防御体系^[7]。马岭位于庆阳卫至宁夏卫的要道上,《庆阳通史》曰“自成化十年(1474年)至弘治十三年(1501年)三边20余年无战事”^[8],赵兴有可能当初在此屯卫戍守,儿女家眷们也当然跟随居守于此。其二,嘉靖三年距赵兴去世有35年左右,即其于弘治二年(1489年)以后去世。虽然无大的战事,但是当时西北鞑靼诸部落不时扰边,而明朝之兵政废弛,战斗力虚弱。当时退守防御就在附近也极有可能。

据墓志铭及《延绥镇志》记载,赵兴初任庆阳卫后千户所千户、武略将军。后被诬陷,调改榆林卫,因病而亡。据墓志推算,享年应该在55岁以上。《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铭》中刊记:赵兴与范夫人生育三子即赵英、赵雄、赵俊及一女赵妙寿。赵英又生五子赵铠、赵钺、赵铭、赵錡、赵锐及



图一 赵兴家族世系图

二女王四、二姐；赵英有三孙，长子赵铠生二男即赵嵩岩、赵岢（三哥子），第五子赵锐生一男赵重喜。赵雄生五男即赵鉴、赵镒、赵小撞、赵黄毛、赵孝儿及三女同寿、四姐、六姐。赵俊生三子赵镗、赵钦、赵大撞。由此可以知其家世系之大略（图一）。

三、赵英及家族成员任职考释

（一）赵英事迹

赵英，或写作赵瑛。明嘉靖《陕西通志》卷十九“固原部指挥”下记载：“赵瑛，榆林卫人。以都指挥僉事守备。”^[9]卷十九“宁夏总兵”下又载：“赵英，延绥人。嘉靖八年以都督僉事镇守。”^[10]《延绥镇志》卷四“陵墓”下记“赵总兵墓。镇靖堡东南。总兵赵瑛为人清白憨直，过墓者每以清名之”^[11]；又卷五“乡贤”之《赵瑛传》载：

赵瑛，庆阳卫副千户，以父兴被诬，调改榆林卫。随父去乡，时已屹然壮夫矣。瑛生而朴厚，志在公清。自入官即以谋勇见知当道。弘治间，委授防御，随营截杀，于波罗堡、火槽沟、火山儿等处咸获首功。历升指挥僉事，以清望保举，注掌卫印。时值逆瑾窃柄，有讽瑛科下贿瑾者。瑛曰：“某职在调军平贼，辑众情，若以贿斂伤人心，所不敢闻也。”即慷慨解绶去。后以材勇，选领奇兵调征山东、河南巨寇，所在有功，升授指挥同知。及守

备固原，单骑赴任，行李唯衣甲弓箭，实两□裸负马上。终身宦游，无所增益，其清白有闻于时。升宁夏参将。未几，升副总兵，协守延绥。嘉靖丁亥，大虏深入，总督王公宪檄瑛与游击卜云往击之。抵六盘山，大挫虏先锋，

追斩虏首三百，夺达马五百，其溃遁死者不可胜计。历官至都督同知，挂镇朔、征西两将军印，镇守宣府、宁夏总兵官。为人憨直忠清，与时多忤，其战功有足称焉。^[12]

《延绥镇志》对赵英的生平记载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这里不再赘述。其仕途历程：袭祖职初任庆阳卫副千户；成化年间，历任指挥僉事游击将军、都督同知凉州右副总兵、都督僉事宣府大同副总兵；弘治年间，委授榆林卫防御，历升指挥僉事；后以材勇调征山东、河南功升授指挥同知；正德年间，历任都指挥同知固原守备、指挥同知宁夏西路参将、指挥僉事宁夏副总兵协守延绥；嘉靖年间，历任指挥同知东路延绥总兵征虏将军、宣府总兵、宁夏总兵榆林副总兵、宁夏总兵。历官至从一品的都督同知，挂镇朔、征西两将军印。为人“憨直忠清，与时多忤”，但却战功卓著。

嘉靖六年（1527年）六月，时任协守延绥副总兵的赵瑛领军在六盘山大败入侵的河套蒙古部落。当时“套虏锁合儿、伯通率七千骑犯花马池，侵至小盐池，韦州下马房、葫芦峡口。提督尚书王宪遣榆林副总兵赵瑛、游击卜云等邀击之。瑛按兵原，州兵备桑公欲省费牧马。瑛曰：‘不可。’桑怒白之总督王宪，王是瑛言。马撤回。居二日，虏果犯。瑛与云合军抵六盘山，大挫虏先锋，追斩虏首三百三级，夺获达马五百五十四。有潜匿沟渠中者，卒饿死”^[13]。



这是史料所见其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获胜记录。

嘉靖十年(1531年),时任宁夏总兵署都督佥事的赵瑛与巡抚都御史翟鹏有分歧,“会虏至,瑛、鹏议遣游击李勋御之,语侵瑛,不肯行。鹏遂别遣他将,而劾瑛威令不能制下。瑛憾甚,乃托疾辞任。鹏遂为瑛疏请,且举副总兵江桓代瑛。诏不许,瑛寻出视事。于是套虏大入,江桓逗留不战,所亡失无算。瑛遂奏鹏专权自用,以致失事,鹏亦奏瑛骄玩懦弱,有诏各解任去……刑部议覆,得旨,降瑛实职三级、桓二级,俱革职任回卫。鹏革职闲住,游击把钺以下降级逮问有差”^[14]。这次战败虽然在于总兵赵瑛与巡抚翟鹏之争所致,但明廷不分是非,以两人都解职的办法了结此事,其实质是分权制衡的思想作怪。以文制武,是明代军事建制的主导思想,督抚制度是这一思想的直接体现。

(二)家族成员任职考释

赵英次子赵钺,据《乾隆·宁夏府志》记载为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贡生,灵石县博^[15]。

赵英孙赵崧,明《延绥镇志》载:“赵崧都督佥事,榆林卫人。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内任”^[16]。“赵崧,瑛孙,谋勇过人,有古名将风,任宣府、大同、延绥”^[17]。又《康熙延绥镇志》误赵崧为赵英子,称“赵崧,榆林人,父英,为总兵官。崧少以父荫,历宁夏副将,剿丘富有功,升延绥总兵。崧为北兵所畏,往往徙帐而幕,南无王庭矣。郿、延民之来田塞下者日众。黄台吉入掠,崧击走之。复犯高家堡,万骑屯明水湖,谍者以告。崧合二将,将五千人疾走威武塞,见敌乘高结营,窥觐虚实。崧潜师示弱以骄之,遂突出精兵奋击,败遁。后东胜之围,崧提师往援,敌遥见旌旗便散走。崧尤多勇略,善鼓士气,故每向有功。子梦麟,亦至总兵官”^[18]。隆庆元年“秋八月,虏犯威武堡,巡抚王公遴会议,总兵官赵崧击破之”^[19];隆庆三年正月,“壬子,大同总兵官赵崧败俺答于弘赐堡”^[20]。又记“赵都督墓。崧(崧),瑛(英)之孙,葬归德堡南七里,钦赐葬祭”^[21]。

赵崧之长子赵梦麟,万历中,延绥总兵官^[22]。赵崧次子赵梦蟾,明贡生^[23]。

四、相关文献补正

(一)关于“征虏将军”称谓考辨

《明史》载:“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趾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24]由此来看,似乎《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中“延绥总兵、征虏将军”与《明史》关于总兵挂印名称不一致。实际上,延绥镇的设立之初,总兵官曾佩“征虏副将军印”,如天顺二年(1458年)明王朝封镇守延绥都督同知杨信为彰武伯,“命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镇守延绥等处地方”。这是延绥总兵官设置之始,时间为天顺二年^[25]。《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铭》中的“征虏将军”实际应为“征虏副将军”,就是说赵英任延绥总兵时挂的是“征虏副将军印”,或为撰者简略或有意为之,至于《明史》所记“镇西将军”应是后来之事。

(二)关于《延绥镇志》校释

依据《明故太夫人赵母范氏墓志铭》来判断,明代郑如璧等编纂的《延绥镇志》有三处欠准确:一是从志文“赵崧,榆林卫,赵英孙”得知赵英有三位孙子,其中赵铠所生为“嵩岩、三哥子”,“三哥子”应为赵崧之小名,历官延绥总兵。赵崧子赵梦麟,也历官延绥总兵;二是《延绥镇志》卷五之“乡贤”载,赵英“历官至都督同知,挂镇朔、征西两将军印”,与志文中“东路延绥总兵征虏将军”称谓不一致,《延绥镇志》中记载可能有误;三是《延绥镇志》卷三“纪事”载:“嘉靖丁亥,大虏深入,总督王公宪檄瑛与游击卜云往击之。抵六盘山,大挫虏先锋,追斩虏首三百,夺达马五百,其溃遁死者不可胜计。”但据明代严从简所著《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一(鞑靼)载:“嘉靖六年,虏酋锁合儿伯通复以一千七百余骑折边墙九十九处,入犯花马池,将犯固

原。总制尚书王宪豫调延绥、宁夏、固原官军共二万七百人,分路按伏……贼奔溃至哲思沟,榆林副总兵赵英等伏发,斩首二十二;贼过平虏所青杨岭,榆林游击卜云伏发,斩首九十五;贼回,遇宁夏总兵杭雄等邀击之,斩首复九十五。前后诸将斩首三百余,获马五十三匹。锁合儿伯通死于阵,余贼由故道遁出境外。”对比可以看出,《延绥镇志》中的记载显然是夸大了。

致谢:墓志照片及拓片由庆阳市南佐遗址文保员徐磊先生与庆阳市民协林海先生提供。

注释

[1]《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诸王二》,第3582页,中华书局,1974年。

[2](明)傅学礼等纂修:《嘉靖庆阳府志》卷十二,第27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3](明)郑如璧等编纂:《延绥镇志》卷二《公署》,第1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清)杨藻凤等纂修:《顺治庆阳府志》卷五《兵防》,第57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5]《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县志》卷二《舆地志》,第139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6](民国)张精义等纂修:《庆阳县志》第二章《建置》,第5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7]民国《庆阳县志》卷十二《军政志》之“边防”下载:“明自河套有事,花马池尝为重地,寇人灵韦,掠环庆,犯平固,皆以花马池为捷径,故恒以重兵成守。又西为小盐池,则庆阳至宁夏之要道也,由安化、环县而北,无居民,亦无树木,水草皆绝少,至灵川始有之,中间地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资以为固此,筹边之务,比他郡为倍急,安化实为根据地也。”(第637页)庆阳卫因之被纳入三边防御体系,成为重要的防卫单元之一。

[8]马啸主编:《庆阳通史》(中卷),第823页,

商务印书馆,2011年。

[9](明)赵廷瑞等修、董健桥等校点:《陕西通志》上册,第949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10](明)赵廷瑞等修、董健桥等校点:《陕西通志》上册,第953页。

[11][21](明)郑如璧等编纂:《延绥镇志》卷四《陵墓》,第282页。

[12](明)郑如璧等编纂:《延绥镇志》卷五,第407、408页。

[13]a.(明)郑如璧等编纂:《延绥镇志》卷三《纪事》,第226页;b.(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一“鞑靼”之“嘉靖六年”。

[14]《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嘉靖十年闰六月癸卯条”,第3034~3035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15]胡玉冰、韩超校注:《乾隆宁夏府志》卷十四《科贡》,第3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16](明)郑如璧等编纂:《延绥镇志》卷二,第88页。

[17](明)郑如璧等编纂:《延绥镇志》卷之四《将材总兵官》,第364页。

[18](清)谭吉璠:《康熙·延绥镇志》卷三之四《官师志》,第197、198页。

[19](明)郑如璧等编纂:《延绥镇志》卷三《纪事》,第231页。

[20]《明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穆宗》,第255页。

[22]姬乃军、韩志侃校注,高希圣审校:《延安府志》卷二十二,第166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

[23]姬乃军、韩志侃校注,高希圣审校:《延安府志》卷二十二,第198页。

[24]《明史》卷七十六《志第五十二·职官五》,第1866页。

[25]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武山县清陈韶德政碑探析

□令陆胤 刘向东 刘斌强（武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内容提要:清陈韶德政碑是宁远县百姓为乾隆丙子科(1756年)举人陈韶所立的颂德碑刻,记述了湖北汉阳府黄陂县人陈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奉调宁远县,详察屯粮积弊问题,立下五条律令,革除私加乱征赋税的流弊,为民减负的事迹。该碑的发现为研究乾隆年间的武山历史、屯粮征收及当时的吏治风气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宁远县;陈韶;德政碑;反腐倡廉

2019年8月23日,武山县城19号道路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陈根长发现两通石碑:一为陈韶德政碑,一为重建学宫碑。二碑均为武山当地的鸳鸯玉材质,两碑背靠背用石灰和土粘连在一起,正面有丝杆带方形钢板铆着。石碑移到附近料场后,陈根长与看料场的令维仁对德政碑碑文进行辨认抄录,并上报县文物保护部门。文物部门立即安排人员前往察看,同时邀请原大地湾文管所所长臧志军到现场察看石碑、抄录碑文、判断其文物保护价值。随后,县文物部门将二碑移到国保单位官寺院内。

一、碑文录文

陈韶德政碑为古宁远百姓给清乾隆二十一年

丙子科(1756年)举人陈韶所立,颂扬他在征收屯田粮税中革除以往私加乱征赋税的流弊,为粮民减负的德政功绩。石碑为圆首长方形碑体,通高160、宽52厘米,碑身除左边残损外,其余部分保存较好。碑趺完整,缺碑座。碑首及碑身边缘阴线刻卷草纹。碑首额中阴刻楷书“流芳百代”两行四字,两边减地雕朵云纹。碑身正面正中竖刻“青天陈大老爷仁爱严明德政碑”,字楷体。此行右侧刻记文5行,左侧刻陈韶所定条例5条5行及落款一行,共11行189字(照1)。录文如下:

【右侧】

公讳「韶,系湖北汉阳府黄陂县丙子科孝廉,乾隆丙申季夏奉调」兹邑,详察



照1 清乾隆陈韶德政碑

屯粮房科积弊累民,遂为裁减、禁止,定立□□五所。」士民欢欣感戴,敬将裁定各条,勒诸贞珉,以志「公德于不朽云。」【左侧】

一、以屯粮事减裁汰经承二名,只留二名办理。」

一、拨运粮石嗣后,书役不得以少称多,欺民折收钱文。」

一、每运兵粮一石,耗粮以四升为

则,书役不得仍行多加,致累粮户。」

一、运领一张,只许经书收粮户钱五文,不得仍行多索。」

一、到抄钱文永行裁免,书役不得勒取。」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月谷旦宁远县□民敬立。

碑文格式与常见的有所不同,一般碑文标题在右边,此碑文标题居中,碑身正中题“青天陈大老爷仁爱严明德政碑”。正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位于标题右侧,记述陈韶籍贯、取试名称、奉调宁远县,在详察屯粮积弊中为民谋利,深受百姓感戴故立碑铭记之事。第二部分在标题左侧,记述了陈韶在查办屯粮之事中所立的五条律令。

二、碑文识读与考证

(一)清乾隆时期甘肃的社会经济状况

清初,甘肃社会经济极度萧条,据《甘肃通史》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整个甘肃“灾浸死徒之余,田亩之荒废者十有一二,军民之存活者十无一二”^[1]。而圈地和顺治初年的“荒粮”政策又使甘肃经济雪上加霜,加之地区民变,兵燹频发,以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乾隆即位后,清代社会经济达到鼎盛时期,但是侵吞公款聚敛行贿之风也悄然兴起。朝廷上下内有聚敛之臣,外有贪黷之吏,其中捐纳导致的腐败是最典型的事例。

清代甘肃以干旱贫瘠闻名,所产粮食不足以支付军队粮饷和赈济灾荒,“甘肃收捐监谷原为边疆积贮,遇有歉收可以赈贷贫民,无须朝廷拨帑”^[2];“乾隆时曾明文规定,捐监者必以本色捐粮,不得折色定数,填补仓储”^[3]。但是甘肃所收捐监粮食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前就渐渐以收折色者较多。乾隆三十一年,清廷下令停止甘肃折色捐粮。因甘肃粮价太低,在陕甘总督勒尔谨的奏请下,清廷同意继续折色捐粮。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亶望瞅准这一时机,以低于全国的捐监价吸引各省捐



监生,并伙同各级官吏侵吞捐监银。王亶望还将通省各属灾赈,捏造支出,分摊下派,令各府、州、县分报开销,各级官吏都乘机从中贪赃渔利。

甘肃本来灾害严重,官吏还谎报旱情,以监粮改捐银、虚销赈粟,瞒上欺下,使甘肃经济雪上加霜。据赵士英《西北灾荒史》统计,从乾隆五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786~1862年)的70余年中,甘肃发生大的霜、旱、雹、水等自然灾害多达50余次,其中虽有地方官谎报灾情,中饱私囊的现象存在,但是灾害较多也是实情^[4]。乾隆对甘肃的灾情极度关注,多次告诫大臣“朕切实惶悚”。为济民救灾,清廷多次减免税负,雍正十三年(1735年),豁免甘肃各属本色粮草。乾隆一朝60余年间,“甘肃一省,正赋全行豁免者十有余年。”“仅乾隆元年十五年,清廷豁免、蠲缓甘肃全省或局部地丁银粮及赈贷饥民高达30余次”,年均达2次。但是这些措施给贪官污吏多了一条贪腐之道,而老百姓却受益有限。王亶望贪腐案中,皋兰等34州县亏短库银88万余两,仓粮74万石,连同草束共计折银达160余万两,俱被官吏侵吞,其中仅贪污2万两以上的就有20余人^[5]。

中国历代统治者常因筹饷、赈灾、备边或兴办工程等事,用捐纳作为取得经费的来源。清初,因军队粮饷和兴办工程需要,准许富民报效,举办过临时性的“捐纳”。乾隆时,捐纳已成为经常性举措。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支出猛增,加之战争、灾荒等不时发生,于是把“捐款”纳入正式的财政收入。而且,清廷开设的捐纳名目越来越出奇,捐输款额越贬越低。为了便利捐输,清廷还制定了章程,规定可买官职的范围和价格,如知县为白银1200两。清廷坚持蠲赈,又加捐监盛行,使“侵吞刻削、聚敛行贿之风兴起”。甘肃捏灾冒赈歪风严重,尤其发生在乾隆年间的“捐监冒赈”案聚敛贪黷之巨、官吏涉及之多成为清代以来最骇人听闻的贪污大案,全省大小官员无有脱干系者。

宁远县虽为小邑,在甘肃吏治腐败的政治生态中,官吏们也鲜有自清的,以致恶风流弊不止。当地借灾冒赈也在所难免,尤其是甘肃藩司王廷赞及其前任王亶望等地方官吏利用收捐监生、捏灾冒赈进行大肆贪污,更助长了这种风气。在这种背景下,陈韶奉调宁远县“详察屯粮房科积弊”,正风肃纪,为民办实事,赢得了百姓感戴,并立碑铭记他的功德。

(二)清乾隆时期武山的社会经济状况

清代武山称宁远县,隶属于巩昌府。巩昌府,明代设置,清代沿袭。明代属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清代属甘肃布政使司。

武山在清代时人口稀少,自然灾害严重、频繁,据《武山县志》载,顺治七年(1650年)全县有耕地37392亩,康熙五十年(1711年)宁远县在册丁8889人,当年增生人丁1150人^[6]。“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全县大地震,村堡皆平,压死人畜无数,一年不止”^[7];康熙四十年(1701年)七月宁远地震,八月又震;“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七月十八日辰时,宁远大地震,倒屋37500间,压死老少12000多人,家畜240头。十月复震,房屋又有倒塌”^[8]。百年之间,数次大地震,损失惨重。

地震灾害严重,水患大旱也让百姓苦不堪言,据《武山县志》载,“清顺治五年(1648年)秋,大水,伤禾稼”^[9]。“清康熙二年(1663年),夏旱秋涝,民无食吃,六年又旱,七年民饥,减田租十分之三”^[10]。“清雍正十年(1732年),红峪沟山洪暴发,洪水冲毁东南关屋舍,知县郭仕全倡导筑堤防范。”^[11]“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夏连续大旱,民饥;二十九年(1764年),巩昌府属诸县旱、雹成灾,禾无收,民饥;三十三年(1768年)甘肃省通旱,巩昌府属县大饥,疫死者颇众;三十五年(1770年),宁远县大旱,兼有瘟疫流行,民饥病交加,死者甚众”^[12]。38年间八年雹、旱成灾,百姓贫病交加,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清康熙宁远县志》载:“康熙六

年夏旱秋涝,禾黍无籽种,七年民饥,奉旨减田租是十分之三。十三年五月,有声如迅雷,六畜惊跃,坠一星为红石。十五年,毛寇十大营至四十里铺割民禾,掘粟窑,肆行杀掠。十九年,西南有气似白布绵亘横列,直至北方。四十三年七月地动,八月又动。”^[13]又是一个灾祸相连的38年,宁远县内天灾人祸不绝,百姓疾苦深重。

清代武山地震、雹、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灾情严重,而且兵燹匪患不止,社会动荡,经济不振,百姓生活十分艰难。据《武山县志》载,“顺治五年(1648年),河西米喇印回民反清,围攻巩昌。陕甘总督孟乔芳统兵至秦州,派副将马宁、赵光瑞率兵驰援,反清军在广武坡受挫,巩昌围解”^[14];“康熙十四年(1675年),甘肃扶标游击岳镇邦以护粮军五百,击败反清吴三桂将李虎牙于落门。吴三桂将王屏藩屯兵于蓼川南山,清靖邑侯张勇遣总兵王进宝、孙思芳等大破之,屏藩仅以身免”^[15]。次年,清靖邑侯张勇、蒙古都统赫业与吴三桂战于落门。同治以来,飞蝗、黑虫、山崩、水患相连,回民反清军在县域战事不止,使得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课赋混乱,官吏乘机舞弊。

为抗灾救民,清康熙二年(1663年),减纳赋银十分之三。清康熙九年(1668年),废除了居住户代付逃亡户徭役的弊政,解除了百姓不合理的苦役。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偿兵民各一月口粮。

(三)陈韶在宁远县的任职时间和主要政绩

据《武山县志》“明、清历任县衙知县”一节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宁远县任职知县共13人,陈韶为第六任知县。志中所载不详,仅姓名栏“陈韶”二字,取试名称、籍贯、任职时间皆为空白。《武山县民国县志稿》“知县”条中载:“陈韶,乾隆四十年任,勤政爱民,有志恩碑。”^[16]《武山县志》“明、清历任县衙知县”一节又载,乾隆时期宁远县第七任知县木金泰“乾隆30年任”。第一任知县王希曾“在任17年”,第五任知县胡奠域“在任10

年”。显然,其说法不能自圆,第七任木金泰乾隆三十年(1765年)上任知县,意味着前边六任知县任期最长为三十年,也就是陈韶任知县不超过1765年。而第一任王希曾和第五任胡奠域任期就达27年,其余四任任期最长为三年,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和当时的任职情况。《武山县民国县志稿》中记载陈韶乾隆四十年(1775年)上任宁远县知县,而碑中明确记载陈韶于乾隆丙申年(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奉调兹邑”,碑是乾隆四十二年所立,碑中所载当是准确可信的。据此,可判断其说法也有不妥。若按此说法,1776年为陈韶任知县的第二年,这样就不可能“奉调兹邑”。若按县志所记(木金泰,乾隆三十年任知县),当时知县应为木金泰或后任,陈韶“奉调兹邑”当是在宁远知县谢任后,奉旨详察屯粮征收中下层官员的贪腐现象。可是,碑文却没有提及陈韶为知县之事,也没有提到陈韶当时在何处、任何职,这就说明老百姓先前对陈韶并不知晓,也可判断出他以前并非宁远知县。

鉴于以上判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乾隆四十一年陈韶奉调宁远县,就是任知县的,这才是“奉调兹邑”的核心所在。因为是一方知县,所以上任后履职查办,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定律令,明标准,禁贪腐,为民谋福利,得到万民敬仰,立碑铭记德政。

三、结语

官德与政绩是评判一个官员好坏的标准,不论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都是一脉相承的。清乾隆年间地方官吏肆意盘剥百姓,让老百姓在“苛政猛于虎”的生存环境中煎熬,他们期望为民解忧的仁爱之官。对甘肃官吏王宣望、王廷赞贪腐案的彻查,显露出“甘肃官吏竟无一人洁己奉公”“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的状况。在这起腐败吏治案结束的十年后,贪腐流弊仍然未绝,陈韶奉命到宁远县处理屯粮积弊,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百姓感戴。陈韶的仁爱德



政不仅在当时,在现今和将来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碑文明确显示陈韶是湖北汉阳府黄陂县人,为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1756年)孝廉(举人),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年)季夏奉旨调宁远县。陈韶生平资料不详,尤其在宁远县任职期间及其前后的事迹,无证可查。该碑的发现填补了陈韶在当地志书史料上的空白,为研究乾隆年间的武山历史、屯粮征收及当时的吏治风气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陈韶德政碑以简洁干练的五条政令,鲜明的为民导向,彰显了陈韶在“详察屯粮房科积弊”中的功绩,碑名既体现了碑文核心主题“德政”,彰显了百姓心中的官德“仁爱”,也表达立碑愿望“流芳百代”。立碑是因为“士民欢忻感戴”,目的是为“志公(陈韶)于不朽”。碑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当官为民情怀和除弊革新精神、忠诚担当作为和立德守规意识,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后,都有极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注释

[1]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明清卷),第23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二版。

[2]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明清卷),第414页。

[3]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明清卷),第414页。

[4]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明清卷),第408页。

[5]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明清卷),第414页。

[6]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3~1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7]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3页。

[8]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4页。

[9]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04页。

[10]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3页。

[11]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4页。

[12]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04页。

[13]《清康熙宁远县志》(上册),第10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3页。

[15]武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山县志》第13页。

[16]李克明主编:《民国武山县志稿》(中册),第59页,未正式刊印。

勘误说明

《陇右文博》2020年第1期第4页右栏第一行“几颗小树”之“颗”,应为“棵”。

特此订正!

编者

白银市两件人头钮盖陶罐研究

□陈辅泰 金 珠(白银市博物馆)

内容提要:会宁县博物馆和白银市博物馆分别收藏了两件人头钮盖陶罐,这两件陶罐,在装饰和形制上有较多相似处。人头形钮与同时期出土的其他人头形钮亦较为相似,对于研究当地史前时期陶器制作工艺、文化面貌和习俗信仰等具有一定作用。

关键词:人头钮陶罐;人像;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

白银市发现的两件人头钮盖陶罐,一件于1990年出土于会宁县荔峡村老人沟遗址,现藏于会宁县博物馆;另一件于2011年征集于平川区,现藏于白银市博物馆。两件陶器造型较为独特,盖钮均为人头形,不仅为研究史前人头钮盖类陶器增添了新资料,而且能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白银地区史前人类生活和信仰等方面的情况。

一、两件人头钮盖陶罐及相关研究

会宁县博物馆藏人头钮盖红陶罐,出土于会宁县丁家沟乡荔峡村老人沟遗址,为国家一级文物。陶罐为泥质红陶,口径9、底径11.2、腹径24厘米。人头钮盖,斜溜肩,鼓腹,腹下部斜收,平底。盖钮为人头形,头顶略有脱落,中部捏塑成隆起的鼻梁,戳两鼻孔。鼻梁下方戳制嘴巴。面部两侧捏塑为扁平穿孔状,似双眼。器盖边沿有一处形如“W”状,相对应的罐口部位呈“M”状,使器盖与器身能

够紧密扣合。罐口至肩部有一道划痕,腹中部正、背面各有突起小釜(照1)。

老人沟遗址位于会宁县丁家沟乡荔峡村老人沟社东西两山坡,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共存^①。遗址内有一条万家河,以河沟为界,大致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河西以齐家文化为主,河东以马家窑文化为主。地表暴露有灰坑、烧窑址等遗迹。曾出土有齐家文化夹砂陶罐,磨制石斧、玉璧及马家窑类型水波纹彩陶罐等器物。1982年,该遗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白银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银市博物馆藏人头钮盖陶罐,泥质红陶,通高18、盖高5.5厘米。盖钮捏塑为人头形,近头顶额头部,横刻出“V”形凹槽状的一双眼睛,面部正中捏塑隆起长鼻,鼻梁上部略有张口状残缺。双大耳呈内凹扁平状,捏塑于鼻子两侧,与鼻子连为一



照1 人头钮盖红陶罐(会宁县博物馆藏)

体,挤占了整个脸部空间,耳部正中分别穿有一个圆形小孔。嘴横刻呈张口状,上唇与鼻子下方连为一体,并与耳下部平齐。整个头部比例失衡,表情夸张且痛苦。盖与器身原为一体制作,制好后裁切出盖体,盖钮单独制作,插入盖顶端预留的小孔内,并将外部抹平。器身圆溜肩,鼓腹,下腹斜收至底部,腹部塑桥形扁平状双耳。腹部正反面近腹耳处塑对称双髻,双髻间均塑有顶部内凹的突髻(照2)。这件陶器具体出土地不详,其范围大致为平川区及周边。

史前时期塑造人体、人头及人面形象的陶器,分布范围广泛,国内外均有发现,出土较多,时代跨度也较大,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人像陶塑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这两件人头钮盖陶罐的研究却偏少。郭颖珊在《甘青地区史前陶器上的人像研究》中,将甘青地区陶器上的人像分为五类,其中第二类即“人面位于器盖处”,亦即本文所谓“人头形盖钮”,文中共收集了15例此类物品,分为A、B两型,并对其进行了分期,探讨了发展演变与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影响过程,可谓较为详细,但将白银市博物馆藏人头钮盖罐误写为齐家文化博物馆藏^[2]。陈炳应和卢冬著《古代民族》一书中,提到会宁老人沟出土的这件人头钮盖红陶罐^[3]。段剑蓉在《甘青地区史前时代人像陶塑概论》中将

会宁县博物馆藏人头钮盖红陶罐作为资料引用,并论述了人像陶塑的功能与内涵^[4]。

二、见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甘青地区人头形陶盖钮辨析

甘青地区陶人像,出土较多,其中位于器盖处

的人像共有15件,除上述白银市两件外,其余13件如下:

1.陶塑人头像(照3-1),齐家文化,1987年甘谷县礼辛乡礼辛村礼辛镇遗址出土。长3.4、宽3.2、高6.2厘米。泥质红陶,呈人首状,五官俱备。头顶呈马鞍形,面部略长,双目深邃,鼻长直与眉骨呈反工字型,双唇自然张开,面庞两侧饰波状附加堆纹,遮盖双耳,颈部粗长,显有裂痕^[5]。

2.人头形陶盖钮(照3-2),1987年镇原县三岔高庄遗址出土。高15、颈径9.8厘米。人脸近圆形,额与眼眉间的分界线不明显。眼以两个扁圆孔表示,鼻呈三角形隆起,有两个小鼻孔。嘴为扁圆形洞,两耳捏塑而成,下端各穿一个小圆孔。头稍上仰,凹面翘颌^[6]。

3.彩陶人头像(照3-3),1986年临夏市文物管



照2 人头钮盖陶罐(白银市博物馆藏)



照3 甘青地区出土位于器盖处的人像

1.陶塑人头像 2.人头形陶盖钮 3.彩陶人头像 4.陶塑人面 5、6.陶塑人头 7、8.人头钮盖陶罐 9、10、11.黥面纹人面器盖 12、13.人首像 14.陶塑人头 15.人面形彩陶器耳

理所征集。残高 7.5、宽 6.5 厘米。泥质橙黄陶。人头脸部平面呈菱形，鼻系堆塑而成，刻出两个鼻孔，眼与嘴浅刻而成，脸两侧有捏塑成的扁平状耳，耳上有穿孔。用深褐色彩绘出眉、眼眶、嘴唇，眼眶下的面颊上画有两道竖线纹，鼻下画两道短竖线标示鼻准。额顶以上绘线纹表示头发，头发由中间向两边披分，呈八字形分垂于脑后。颈部微收，肩部绘一圈宽带纹，已残^{7]}。

4. 陶塑人面（照 3-4），1967 年天水柴家坪出土。残高 25.5、宽 16 厘米。是陶器顶部残存的一部分。为含有少量细砂的泥质红陶，陶塑人面的外表有一层浅而薄的红色陶衣，但大部分已脱落，仅略有痕迹。额头较平，额上的发部向前微凸隆。眉细

长，两眼为雕空的横长圆形孔，两眼的距离较近，眼稍微向上。鼻梁窄直。嘴亦为雕空的孔洞，呈张开状。双耳耳垂处也各有垂系饰物的穿孔^{8]}。

5、6. 陶塑人头，2 件，1959 年永靖大何庄遗址出土。T49:5，高 5 厘米，鼻子稍残，两眼圆睁，颈部较长（照 3-5）；T3:19，高 5.7 厘米，两眼仰视，形象生动^{9]}（照 3-6）。

9、10、11. 黥面纹人面器盖。面部为黥面纹饰，彩绘几乎布满整个面部。古浪定宁出土人面器盖，颈部上方制成人头形，圆脸，圆眼，嘴巴张开，面部用黑彩描绘很多条放射状斜线，大耳朵中部有穿孔，长颈^{10]}（照 3-9）。甘肃东乡发现的人面器盖，高约 15 厘米，器盖上方为一人脸具，头顶两侧有对

称两个突起物,头后方有一条蛇,器盖呈不规则锯齿状(照 3-10)。甘肃东乡出土的另外一件人像,面部纹饰较少,一耳缺失,器盖锯齿纹饰突出^[11](照 3-11)。

12、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2 件人首像。一件为双面人首像,正反两个人面雕塑手法相同,以细泥条圈堆成眼眶,鼻子捏塑隆起,耳部穿孔。盖沿呈锯齿状^[12](照 3-12)。另一件为陶塑人像,出土于山那树扎遗址^[13](照 3-13)。

14.陶塑人头(照 3-14),1964 年礼县高寺头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为陶器残存的口部,残高 12.5、宽 8.5 厘米。系夹有少量细砂泥质橙黄色陶,器表略加打磨。人头的顶部有一黄豆大的小孔。额前至脑后塑有半圈突起的细泥带。额与眼眉的分界不明显。眼为刻通的两小圆孔,鼻呈三角形隆起,有两小鼻孔。嘴较小而微张,也是雕空成洞孔。下颚短小而微凸,颈较粗。两耳耳垂处各有穿孔,当是垂系饰物的。面部圆而丰满,给人以淳厚的感觉^[14]。

15.人面形彩陶器耳(T23④:56)(照 3-15),出土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15]。浅刻双眼和口部,鼻捏塑隆起,双眉墨绘,头颈交界处墨绘一周,面部自下眼眶至头颈交界各墨绘两条竖线。

以上这 15 件陶人像,笔者认为,属于盖钮的共有 10 件,即甘谷礼辛镇遗址、永靖大何庄遗址、会宁老人沟遗址出土的陶人像(照 3-1、5、6、7),临夏市博物馆、白银市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陶人像(照 3-3、8、12),古浪定宁、东乡发现的陶人像(照 3-9、10、11)。

上述 10 件人头形陶器,通过器形可直接认定为人头形钮盖的共 6 件,即老人沟遗址出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甘肃古浪定宁和东乡发现的人头形陶器(照 3-7、8、9、10、11、12)。永靖大何庄遗址出土的 2 件齐家文化时期陶人像(图三、5、6),原报告认为其是人头陶塑,底部残断,从断茬处可看出,缺损部位斜向呈弧面外延,与陶盖器形

相吻合,在该遗址中,还出土两件羊或狗头形钮的陶器盖,造型与出土人像较为相似。同时,人像的塑造手法与白银地区两件人头盖钮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均为实心,面部均为高鼻、窄面、孔洞眼,且都处于齐家文化时期,因此可判断这两件也应为盖钮。甘谷礼辛镇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陶人像(照 3-1),与文中齐家文化时期的其他几件人头形盖钮有较多类似之处,故列入盖钮范围。临夏市博物馆藏马厂类型陶人像,与定宁、东乡发现的半山类型陶人像在面部有相似之处,均为彩绘、黔面;脖颈断茬处与大何庄遗址出土齐家文化陶人像相似;在眼部和嘴的刻画上,与白银市博物馆藏人头该钮相同。综合考虑,该陶人像亦为盖钮。

文中所列 15 件陶人像,不属于盖钮的有 5 件,为镇原县三岔高庄遗址出土人头像、天水柴家坪遗址出土人面像、山那树扎遗址出土人头像、礼县高寺头遗址出土人头像、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人头像(照 3-2、4、13、14、15)。

镇原出土的人像(照 3-2),原文作者认为是齐家文化^[16],然而其面部平整,双眼和嘴巴镂空,头像整体中空的制作方法,在甘青地区常见于仰韶文化。镇原县地处泾河流域,属于仰韶文化和常山下层文化覆盖区域,该头像与甘青地区仰韶时期的人像有较多类同之处,受到仰韶文化影响较大,应为仰韶文化晚期作品,这一时期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人头形盖钮出土,因此,笔者认为不属于盖钮。柴家坪遗址出土仰韶时期陶人像(照 3-4),张朋川认为是陶器顶部残存的一部分,根据其尺寸,似更应该为陶面具而非盖钮。高寺头遗址出土的仰韶时期人像(照 3-14),与秦安邵店大地湾出土的仰韶文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17]和郭嘉乡寺嘴村出土的人头形器口红陶瓶^[18],以及甘南卓尼木耳乡冰崖村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19]等,在面部塑造、镂空技艺等方面均有较高的相似度,张朋川的文章中认为是陶器所残存的口部,故不作为盖钮。

山那树扎出土的马家窑类型陶人像(照 3-13)不论在制作方法、人面形象、彩绘等方面,均不同于如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的人面瓶^[20]、秦安焦家沟遗址出土的人面瓶^[21]等同时期的人面像。同时,根据《甘肃岷县山那树扎遗址》可知该遗址存在仰韶中、晚期和马家窑类型因素,加之其出土信息不详,以及段剑蓉认为其不是某器物附件的论述,故亦也不列入盖钮范围。东乡林家遗址出土马家窑类型陶人像(照 3-15),原文描述为人面形彩陶器耳,但在线描图中写为人面形器把。根据人像残断处呈斜面且较为整齐的情况可知,原应为将人像底部粘附在陶器弧面部位,不应为盖钮。

半山类型(照 3-9、10、11、12)和马厂类型(照 3-3)的人头形盖钮,均彩绘,头部较大,颈部较粗,钮内部中空,眼、口等部位镂空。齐家文化时期的几件作品(照 3-1、5、6、7、8),均无彩绘,头部变小,颈部变细,钮呈实心,面部以戳、刻等手法制作,简单粗糙,并且有将耳部戳孔作为眼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半山类型的人头形盖钮向齐家文化演变的趋势为黔面逐渐消失,头部逐渐缩小,并且由内部中空向实心发展,颈部由粗壮变为细长,面部由廓面向立体化、窄小化发展。此外,甘肃定宁、东乡发现的半山类型人头钮陶盖边沿均为锯齿状;永靖大河庄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陶器盖中,有 21 件器盖的边沿压成锯齿状花纹^[22],二者比较,似乎有从早期向晚期发展演变的迹象。

人像的穿耳现象,也是甘青地区多数人头像共有的特征。汉代刘熙《释名·释首饰》曰:“穿耳施珠曰瑯。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瑯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23]甘青地区人头像的穿耳为该地区生活的部落和族群为少数民族提供了一定的物证资料。同时,陶人像黔面的表现方式,在马家窑文化时期较为常见,似也说明了这一点。

白银地区的这两件人头形钮盖罐(照 3-7、8),

是齐家文化时期确切的将盖钮塑造为人像的陶器,同甘青地区发现的其他人像,共同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特色,为这一地区人头形盖钮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它们与齐家文化时期其他人像在塑造、形象以及面部表情等方面,存在较多相似之处,是同一族类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共同文化面貌的反映。

三、小结

盖钮一般多塑造为圆圈形、圈足形、锯齿形、喇叭形、桥形、三足形等,主要为实用功能。塑造为动物形、鸟形、人头形之类的盖钮,兼具了实用性和艺术性以及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宗教信仰、巫术活动等方面的意义。白银地区的这两件人头形盖钮陶罐,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体现了史前艺术水平,兼具其他方面的含义。

1. 生殖崇拜现象。这两件人头形钮盖陶罐,腹部隆起并有凸棱,这与甘青地区人头形陶容器一样,将鼓起的腹部比拟为孕妇的肚腹,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生殖崇拜现象。

2. 图腾崇拜现象。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及姚官庄和尚庄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出土的鸟头形盖钮,有的作张嘴状,有的作闭嘴状,神态各异^[24]。后洼遗址出土了 7 件鸟形雕塑,反映了一种鸟图腾崇拜信仰^[25],这两件人头形钮盖陶罐,同齐家文化其他人头形盖钮一样,或许与图腾崇拜也有一定关系。

3. 祖先崇拜现象。段剑蓉认为这些人首形陶瓶上的人像以及残存的人首形象,可能为祖先崇拜的写照。白银市博物馆征集的人头形钮,从不同的视角,可分离出两种不同的人像,一种以头像最上部的两道凹槽为眼,下部为高耸的鼻梁,鼻梁下为嘴巴,脸部较为狭长,两侧捏塑出较大的穿孔双耳;另一种视角以穿孔为眼,头像最上部的两道凹槽为眉。后一种视觉上的人像,恰恰与会宁县老人沟遗址出土的人头形钮以及永靖大河庄遗址 T49:



5 出土的人像较为相似。这或许与天人合一、人鬼合一的祖先崇拜具有一定的关系。

白银地区的这两件人头钮盖陶罐所属时期,乃新石器时代末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齐家文化,处于历史时期的前夜,社会经济由农业逐渐转变为畜牧业,反映在陶器上的特征便是陶器总体上偏小,便于携带,制作较为粗糙,仅有部分打磨精细。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这两件陶器上。人头形的盖钮,蕴含了较多的意义,为研究齐家文化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实物资料。

注释

[1]马可房:《会宁历史文化丛书·会宁文物》,第135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2]郭颖珊:《甘青地区史前陶器上的人像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3]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第23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4]段剑蓉:《甘青地区史前时代人像陶塑概论》,《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5]摘自自《甘谷县历代遗珍》图片展。

[6]王博文:《甘肃镇原出土人头形陶盖钮》,《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7] 张晓波:《临夏发现彩陶人头像》,《文物》1993年第5期。

[8]张朋川:《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979年第11期。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0]汤池:《黄河流域的原始彩陶艺术》,《美术研究》1982年第3期。

[11]郭颖珊:《甘青地区史前陶器上的人像研究》,第12页,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12]王辉:《公元前1000年之前早期丝绸之路

上的中国西北和欧亚草原及西方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第72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3]赵雪野、蒋超年、王山:《甘肃岷县山那树扎遗址》,国家文物局:《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36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4]张朋川:《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979年第11期。

[15]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第1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6]王博文:《甘肃镇原出土人头形陶盖钮》,《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1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53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18]甘肃省秦安县博物馆:《娲乡遗珍》,广东省东莞市长丰印刷厂印刷,2002年。

[19]李振翼:《甘南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文物》1995年第3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16》,第4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1]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图版122,文物出版社,1990年。

[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

[23]刘熙:《释名》,商务印书局,1939年。

[24]吴家哲、李秀治、何德亮、吴诗池:《大汶口——龙山文化原始艺术初探》,《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

[25]宋兆麟:《后洼遗址雕塑品中的巫术意义》,《文物》1989年第12期。

庆城县博物馆馆藏彭原银錠再考

□范仲杰 张志升(庆城县博物馆)

内容提要:关于庆城县博物馆藏彭原银錠,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元代货币铸造和管理机构发行的称量货币;另一种认为是金代负责管理金、银店铺和负责征收金、银税的总机构铸造的上交国家或投入市场流通的称量货币。通过反复考证研究,本文认为彭原银錠系金代税务管理机构——“使司”所收的征权税中除盐税以外的“院务税”的税银。

关键词:庆城县;银錠;金代;税使司;院务税

银錠,又称“银錠”,是我国古代称量货币之一。1981年10月18日,甘肃省庆阳县(今庆城县)彭原公社(今属西峰区)一村民在修庄取土时发现银錠三笏,随后上交庆城县博物馆。关于这三笏银錠,《甘肃庆阳出土元代银錠》^[1]一文认为,这是元代货币铸造和管理机构“使司”所发行的称量货币,《彭原银錠考略》^[2]则将其年代定为金代,认为是金代负责管理金、银店铺和负责征收金、银税的总机构铸造的上交国家或投入市场流通的称量货币。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内蒙古、河北、山东、黑龙江、江苏等省(自治区),陆续出土了形制比较相似的银錠,随后相关学者对银錠的年代、性质等做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本文将在前文

关于彭原银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新对银錠上的文字进行释读,确定其年代及性质。不当之处,敬俟匡正。

一、彭原银錠的基本情况

彭原银錠共有三笏,纯银浇铸,含银纯度95%左右。亚腰,四周厚度均一,中部稍凹。正面平滑,背部有铸造沙眼,腰或四角均鑿或压印有不规则文字。为便于介绍,笔者将三笏银錠分别编号为银錠1、银錠2、银錠3。

银錠1 通长14、两端宽9.5、腰宽5.5、厚2.5厘米,重1957克。在光滑一面,从右至左有三行文字,共28字,为“宁州范三家煎簿记刘肇王都入中]使司元]伍拾两贰钱行人秤值李元”(照1)。



照 1



照 2



照 3

银锭 2 通长 12.2、两端宽 7、腰宽 5、厚 1.7 厘米，重 1000 克。在光滑一面，从上而下砸印有“税使司店口”戳记(照 2)。

银锭 3 体积较小，通长 4、一端宽 8.6、另一端宽 6.5、厚 2.5 厘米，重 650 克。腰部有切割痕迹，在切口处有“秤”字样(照 3)。

二、关于彭原银锭的几个问题

(一)年代

《甘肃庆阳县出土元代银锭》一文将彭原银锭断代为元代，其依据有二：一是认为银锭 1 和银锭 2 与《文物》1981 年第 4 期第 92 页登载的河北省发

现的两件元代银锭形状完全一样，只是表面所篆刻文字和重量不同，以此判断为元代银锭。笔者认为，只是把彭原银锭与河北省发现的两件元代银锭进行外观比较，忽略银锭上的铭文，据此推断为元代，这是极不严谨的。二是认为这两件银锭与河北发现的银锭在形制大小方面都比较接近，可统称为“元宝”。加之银锭上都刻有“行人”二字，又引用《元史·刑法志》：“诸检潜钞行人”“诸烧钞库合干检钞行人”，认为“行人”的职责就是专司检验银子的成色，与“诸检潜钞行人”“检钞行人”相同。这段引证材料，在李逸友先生《巴林左旗出土金代银锭浅释——兼论金代银锭形制》^[1]一文中直接进行了否定。他认为作者存在断章取义的嫌疑，“诸检潜钞行人”“诸烧钞库合干检钞行人”的“行人”也具有检验货币的职能，但不同的是它专指检验元代的宝钞，与银锭毫无关系，故不足为据。

《彭原银锭考略》一文认为“现据陕西临潼出土银锭和河北平泉、怀来出土银锭相比较，无论形制、大小、格局、内容以及刻款、重量等都是接近的。它和元以后银锭的形制稍异，所以这几件银锭拟为金代所铸。”笔者认为，彭原银锭断为金代是比较可信的，但上文中的依据还是不够充分。判断银锭的时代，应从银锭的形制及上面篆刻或压印的铭文来判断。

首先来看彭原银锭的形制。银锭 1 和银锭 2 两端相同，呈圆弧状，中间束腰，整体呈“亚”字形，表面光滑微凹，背部有蜂窝。这种形制最早起源于唐代的船型锭。到了宋代，银锭的形制逐渐统一，两端平整，中间略向内收的束腰形成为主流，在光滑一面，铭文的制作也出现统一的趋势，文字内容一般由银锭制作或使用时的年份、地点、用途、重

量、主管官员及职位、银匠姓名等,宋后期,银锭上篆刻的铭文除了用途、地点及官职等内容之外,还标注了银锭的成色和制作的铺户。金代则承袭了宋代银锭的铸造工艺。元代银锭在继承宋金银锭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大致有两种:一是形态跟南宋银锭相同,但在银锭背面铸有阴文“元宝”或有铸地所在行政区划名称等;二是元代银锭两侧弧度曲度更大、中段束腰明显变窄等。明代则以“元宝”指代银锭,其形制出现变化,面大于底,两端立体起翘^④。我们从历年来各地出土银锭的形制,就可以看出其形制演变的轨迹。如从西安大明宫出土的唐天宝年间进奉银,为长条锭形。安徽合肥发现的宋代金锭为一端圆弧的长条形。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北宋大观年间进奉银,两端宽厚、中间束腰,表面较背面宽大、微凹,篆刻铭文。南宋银锭形制与金代基本相同,四川双流、湖北黄石、荆州、襄樊等地出土有纪年凿款的银锭,都是两端圆弧、当中束腰的锭型,但锭上无“使司”戳记。

其次,银锭 1 和银锭 2 上压印有“使司亢”“税使司”等字样。现今发现的压印有“使司”戳记的银锭,不仅在彭原地区出土,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出土。如 1964 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金代银锭 5 笏,其中 1 号锭篆刻有“肆拾捌两玖钱”“县游祥”“□官银四十八两九钱验王实等秤子郝完□”“行人□□□秤”等字,并压印有“使司”戳记及“半”“修”等画押。4 号锭篆刻有“郭义肆拾玖两捌钱”“行人丁顺”“□□秤”等字,压印有“使司”戳记。笔者认为,这两笏银锭的铭文与彭原银锭上的铭文,在书写格式、铭文含义都有相通之处。在书写格式上,先是银锭的重量,其次是“行人”某某,最后都压印有“使司”戳记。在铭文含义上,都交代了银锭的重量、检验银锭的机构或人员以及银锭的性质,另外彭原银锭上还篆刻有金银铺的名称等信息。除此之外,在 1966 年在河北平泉、怀来发现两件银锭^⑤,在形制、重量等方面,与彭原银锭都比较相

似,所以把彭原银锭定为金代是比较准确的。

(二)性质

关于彭原银锭的性质,《甘肃庆阳县出土元代银锭》未做说明,而在《彭原银锭考略》一文中,认为“‘使司亢’三字戳记,‘使’派遣、命令;‘司’掌管;‘亢’过甚、极度。‘使司亢’即指管理金、银店铺和负责征收金、银税的总机构。另一块银锭上的‘税使司’可能为‘使司亢’下属的‘分治使司’,是专门从事纳输盐税或其它税务管理的。”笔者认为,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彭原银锭的性质,但通过对“使司亢”“税使司”的解读,可以看出彭原银锭曾作为税银,但究竟是盐税还是其它税务,这里并没有直接告诉读者。另外上文认为“税使司”为“使司亢”下属的“分治使司”,是专门从事纳输盐税或其它税务管理的。目前,笔者还未找到有相关资料证明二者的关系,所以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将在彭原银锭是税银的基础上,通过再次对“使司”的含义以及性质的探讨,并结合金代赋税制度,从而进一步确认彭原银锭曾作为税银的具体用途。目前学术界关于“使司”的认识有以下两种:

一是认为“使司”是检验戳记,“使司”银锭的性质是称量货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李逸友先生。1986 年,李逸友先生对 20 世纪 60 年代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部隆昌镇出土的 5 笏金代银锭进行了考释,其中有两枚带有“使司”戳记,他认为凡此类银锭上的“使司”均应属流通过程中压印的检验戳记。在肯定“使司”为某个检验机构的前提下,根据《金史·百官志》所载转运司“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的职责范围,认为使司就是转运使司的简称。他对银锭上的“使司”戳记做了如下推测:各金银店铺铸造的银锭须经转运司检验确定其成色和重量后加印“使司”戳记,然后进入市场流通,因此“使司”银锭不是税银,而是一种



称量货币。

二是认为彭原银锭是税银，而非称量货币的准确性。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刘浦江先生。他在《金代“使司”银锭考释》^[6]中通过对“使司”的进一步考证，认为“使司”银锭应该是某种税银。主要理由有：(1)通过对金代史料的考证，认为“使司”并不是转运司之简称。转运司虽然以转运使为长，但金代的转运司却从不称作转运使司，因此也从来不将转运司简称为“使司”。李逸友先生关于“使司”是转运司留下的检验戳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2)金代的转运司只是一个财政管理机构，职掌本路财赋和漕运事务，而它本身没有任何课额，所以如果在税银上打上转运司的戳记的话，并不能说明税银的来源和性质。随后他又通过对金代税赋制度的考证，证明“使司”银锭是百姓用来向国家所交的征榷税。《金史·食货志》云：“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金朝对这以上 10 个商业经营项目实行垄断经营，通过使司来进行征收。因为盐税是所有税收项目中的大头，所以盐使司就比较特殊，人们一般称其为“盐司”，而其它诸使司，如酒使司、曲使司、醋使司等等，都统称为“使司”。通过对各类税收的多寡分析，盐税税银则篆刻有“盐司银”款识，特征非常明显，显系专供上缴朝廷之用。而征收来的其他茶税、酒税等税银，由于类别繁杂且数量多，其税额相对盐税来说较少且分散，因此“院务税”一般不再熔铸专门的银锭。收税的官员或机构将收到的铜钱、碎银等，搜集在一起，到金银铺去兑换成等额的银锭，在上面压印上“使司”戳记之后，就成为“院务税”税银，再交给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这就方便了税银的运送，节省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等成本。所以这些“使司”银锭不再将每一个具体的使司如酒使司、曲使司等显示出来，而统称为“使司”。

三、小结

由此可见，庆城县博物馆所藏的彭原银锭，应为金代地方政府在向百姓征税的过程中，将缴纳的散碎银两或其他货币收集在一起，向宁州区域内专司金、银行当的大铺面“范三家”进行兑换，然后压印上“使司”或“使司亢”戳记，再向金中央政府进行缴纳的除盐税以外的“院务税”的税银。

注释

[1]田秀茂、任彦辉：《甘肃庆阳出土元代银锭》，《考古》1985年第2期。

[2]王春：《彭原银锭考略》，《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二辑），2003年。

[3]李逸友：《巴林左旗出土金代银锭浅释——兼论金代银锭形制》，《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一辑），2002年。

[4]周卫荣、杨君：《中国古代银锭形制演变刍议》，《中国钱币》2014年第4期。

[5]郑绍宗：《平泉怀来出土银锭考》，《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二辑），2003年。

[6]刘浦江：《金代“使司”银锭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

一口铜锣锅和一把铜马勺背后的故事

□常斌强(南梁红色大景区管理委员会文物保护研究所)

在南梁革命纪念馆的馆藏文物里,有一套铜质炊具锣锅和马勺,为国家一级文物(照1、2)。锣锅口径31、高18cm、通长63厘米,圆形,有盖,两测有对称水滴形环耳;马勺口径22.5、深20、通长33厘米,圆形,一侧有把手。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炊具,在特殊的革命年代,往往承载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探究文物背后的故事。

1933年10月下旬,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决定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张策以红军后方特派员身份前往南梁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为创建根据地做准备工作。

初到南梁,老百姓分不清红军和土匪,一见部队就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村子里基本是空的。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教育游击队说:“群众痛恨军阀和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是为穷人闹革命的,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不能祸害老百姓。”后来,队伍每到一处,战士们把老百姓家院打扫整齐,吃完饭也把厨具洗的干干净净,水缸也挑得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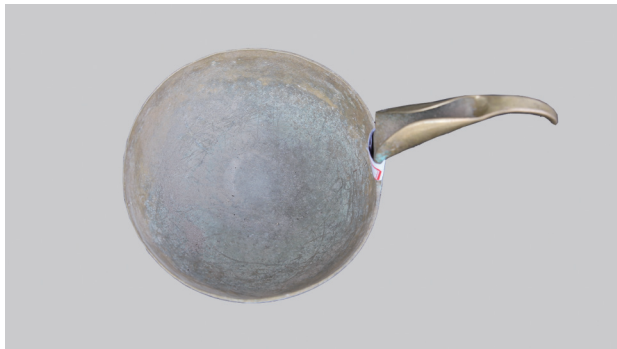
满的。吃了老百姓的粮食,开个清单把钱放在碗里,藏在“灶君爷”怀里,向老百姓表示祝福。红军一离开村庄,老百姓回到家里一看说:“这不像土匪吧!吃了饭还给留钱!”以后群众见了游击队,就不再跑了。

当时习仲勋和张策率领游击队,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起初,有些群众对他们不了解,把他们当作一般“跑腿的”看待,所谓“跑腿的”,就是流浪汉。有的甚至把他们当成“土匪里的人”。这对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组织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真理,习仲勋、张策等人,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挨家挨户地做群众工作。南梁地区地广人稀,路途中经常遇不见人家,常常风餐露宿。有时候,有些地方的老百姓



照1 铜锣锅



照2 铜马勺



不了解共产党以及惧怕国民党民团和土匪的迫害,也不敢留宿他们。所以,他们常常饿了吃炒面,渴了喝冷水,累了抽旱烟……爬冰卧雪、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困难非常大。

据习仲勋后来回忆:到南梁后,刘志丹殷切地嘱咐我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外出做群众工作的时候,同志们常常吃不上一口热饭,时间久了大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胃肠和消化疾病。刘志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找到了李炮匠,让他给同志们打几套炊具。

李炮匠原名叫李青山,1900年出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4岁出外学艺,靠一手精湛的打铁手艺度日。1920年,河南孟津发生灾荒,李青山逃荒到华池南梁落户。平日里挑起工具箱,走村串户给当地农民打制农具,为猎户修枪做“炮”,老百姓称其为“李炮匠”。

1931年10月,刘志丹率领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庙(今华池县林镇乡)、荔园堡一带活动时,得知九眼泉有个会修枪械的“李炮匠”后,便来找他。李青山早闻刘志丹和红军游击队的威名,在刘志丹的引导下,李青山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游击队在南梁的秘密联络员。1933年冬,李青山便公开为红军修理枪炮。

李炮匠听了刘志丹的要求后,当即表示要给同志们打几口行军锅,但是在材质和器型上犯了难。材质上有石锅、铸铁锅、铜锅等。石锅易碎,铁锅时间长了容易生锈,而且太重,不易携带;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游击队、红军修枪和打制大刀需要大量的铁。在器型上,用平底还是尖底,尖底锅每次使用,都要用土垒灶台,不方便,加之野外没有灶台的话,火不聚拢,尖底受热面积小。综合考虑,李青山决定做几套铜质平底锅。

李青山回想起,在学艺时听师傅提起过,在茶

马古道上有一种马帮必不可少的炊具叫铜锣锅。这种炊具锅、锣两用,白天烧饭,晚间报更。用纯铜打造出的铜锅,可以用于煮、炖、焖饭,用铜锣锅煮出的饭更加香甜可口。想到这里李青山眼前一亮,就给他们打制铜锣锅吧,这锣锅吊起来就能用,铜锣可以当锅盖,在村里开会时,敲响铜锣还可以召集人,真是一举两得。

为了搜集制作铜锣锅的材料,刘志丹号召战士们将每次战场上的子弹壳捡回来交给李青山。

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当选为革委会主席,标志着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革委会工作人员经常入户调研。

一次,习仲勋来到了贫农王子春家。初春天气,50多岁的王子春还身穿破单衣。习仲勋走进窑洞,见炕上没有毡也没有席,只有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习仲勋了解到他一个儿子拉长工,一个儿子给地主放羊。临走时说:“跟我到革委会走一趟。”王子春跟着习仲勋到了革委会。习仲勋对财政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给王子春大叔支点钱,他家太困难了。”王子春这才恍然大悟,忙说:“使不得,习主席,这个钱我不能要,政府也很困难呀!”习仲勋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你把钱拿回去买棉花,吃饱穿暖了才能搞生产搞革命呀!”

王子春接过银元,满含热泪,大声说:“共产党,红军,大恩人呀!从现在开始,我这条老命就交给共产党了!”过了几天,王子春和儿子抬着一个大口袋来找习仲勋。他进门就说:“我是送儿子来当红军的,另外这一袋子弹壳是我在打了仗的地方捡的,不知道你们用不用得上?”“有用有用!咱们的修械所正用得着。”习仲勋一看,王子春身上已穿上了棉衣。问到:“王大叔,现在不冷了吧!”王子春激动地说:“不冷了,不冷了,我们能穿上棉

衣,全靠共产党的恩情,今后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决不退缩。”

李青山利用这些子弹壳原材料打制了几口铜锣锅,锅有了,还缺舀水的,他又打制了几个铜马勺。现在纪念馆中展陈的铜锣锅和铜马勺就是这其中的一套。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由于根据地管辖范围扩大,加之南梁地区交通、通讯落后,政府的许多政策和法令推广实施难度大。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府法令,习仲勋同志对政府工作人员说:“陕甘边根据地还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发展,我们开展的是土地革命,只有正确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我们做群众工作时,一个村子、一户人家都不能落下。苏维埃政府的每一个同志,都必须听懂政策、掌握政策,才能正确执行政策。”

为了更好的联系和服务群众,以习仲勋为核心的政府,不拘泥于固定办公,采用流动办公形式。习仲勋牵着马驮着政府印章和办公设备,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每到一处,他敲响铜锣,召集群众开会。他以一种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帮助农民生产,与群众盘腿拉家常,在过程中宣传政府法令和政策。没过多久,习仲勋就对南梁周边几十个村镇的情况了如指掌,群众都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马背上的政府”。

陕甘高原沟壑纵横,地广人稀,许多时候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习仲勋就吊起铜锣锅,用铜马勺就近舀水,生火做饭,这马勺既能舀水还能盛饭。这就是边区苏维埃干部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愿意并且真正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以真诚赢得群众的信赖,在边区有很高的威信。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文化委员长的蔡子伟后来回忆说:“每逢集市,仲勋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

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刘志丹曾说:“仲勋虽年轻,但办事很周到”。

家住何沟门的王续兰大娘是从正宁县王录村逃荒到此的。王录村离关中较近,善良的王大娘就把习仲勋当作娘家人一样对待。1934年春的一天,从事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顺路探望王续兰,看见习仲勋来了,她高兴地和仲勋拉话。

王大娘蒸了一锅馍馍,刚揭开锅,突然三名斜跨着枪的白狗子出现在院畔,习仲勋这时跑已经来不及了,藏在哪儿呢?炕洞?昨晚才烧过柴火,还热着哩!案板下面?敌人用枪一扒拉就能发现,这可咋办哩?眼看敌人就要到窑门口了,王续兰急中生智,飞快挪开家中的水缸盖,用手一指示意习仲勋钻进水缸,习仲勋稍作迟疑便抬腿钻入水缸,王大娘迅速盖好水缸盖。

这时,敌人已经踏进门来了,大大咧咧的喊着“老婆子做的啥饭?有没有陌生人来家里?”王续兰不慌不忙地说:“这年月没啥好吃的,蒸了一锅苞谷面馍馍。这家里就我老婆子一个,老汉和娃都出去揽工去了。”一边从蒸锅里端出馍馍放到水缸盖上。王大娘故作客气地说:“老总,真是稀客,快到炕上坐,我给你们切馍馍吃。”

三个敌人扫视了一圈,发现窑里除了王续兰,只有一口水缸,一个案板,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眼就看透了。临走时他们对王续兰说:“发现可疑的人,要马上报告!”王续兰连忙应声到:“好,好,老总,你们放心。”在王续兰机智勇敢的掩护下,习仲勋成功脱险。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四省五万兵力向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围剿”。政府在转移时,习仲勋始终记挂着王续兰大娘的救命之恩和平日的关怀,就把自己平时用的铜锣锅和铜马勺送给了王续兰留念。

2014年南梁革命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王续兰的后人把他们珍藏了80多年的铜锣锅和铜马勺捐献给了南梁革命纪念馆。

秦国礼乐文明浅说

——以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乐器为中心

□魏泽民(西和县第一中学)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西汉水上游开展的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中,课题组在礼县西山发掘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秦墓。2006年在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发掘了两座秦公大墓及祭祀遗址和乐器坑,出土了编钟、编磬等精美乐器,用丰富而精美的音乐遗存证实了秦国在春秋早期就有较为完整的音乐体系。本文试图从古籍对秦国音乐的有关记载和出土文物出发,探讨秦国礼乐文明的真实状况。

关键词:秦国;礼乐文明;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

《史记·廉蔺列传》中有渑池会上秦王令赵王鼓瑟,赵王则请秦王击缶的描述;《诗经·秦风·车邻》中有“既见君子,并坐鼓瑟”的诗句,说明“缶”和“瑟”都是秦国的传统乐器。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夫击甕扣缶弹筝击鼗,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1]这些描写都带有文学色彩,不能客观反映秦国音乐的真实状况。那么,真实的秦声又当如何呢?

一、史籍中有关秦国礼乐的记载

《说文解字》云:“‘缶’亦作‘甗’,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2]“缶”原本是古人用来盛酒水的一种类似瓦罐的陶器,有圆形圆腹的,也有方形方腹的。有盖,肩上有环耳,盛行于春秋战国。人们宴饮时喝到兴致处,便一边敲打着盛酒的缶,一边大声吟唱。这样,“缶”就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陶制的土乐器。

箏也是秦人的重要乐器,有“秦箏”之称。有传

说箏是蒙恬发明的,这一说法最早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六《声音》:“箏,谨按礼乐记:‘箏,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3]事实上箏在蒙恬之前已经在秦地流行,故蒙恬造箏之说不可信。关于箏的名称之由来,也众说纷纭。《乐道类集》第二卷中有“分瑟为箏”的记述,“秦有琬无义者,以瑟传二女;二女争引破,终为二器,故号箏”^[4]。《续一切经音义》中也有如下记载:“本大瑟,二十七弦。秦人不义,二子争父瑟,各得十三弦,故曰箏。”^[5]但以“争”命名“箏”的说法,其客观性尚有待考证。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东汉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的说法:“箏,施弦高,箏箏之然也。”王先谦疏证:“箏箏然犹铮铮然。”“箏箏”是其音响效果,箏是因其音响效果而命名的^[6]。

钟磬不仅是秦人的重要乐器,而且是重要的礼器,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记·秦始

皇本纪》和《三辅黄图》等记载,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钟架高三丈,“钟小者皆千石也”。

史籍中还有关于秦国歌舞的记载。汉初刘向在《列仙传》卷上《萧史》中记载了秦国有关“凤女祠”的故事:“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为妻焉。日教弄玉作风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作凤凰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晋人有赞曰:“萧史妙吹,凤雀庭舞。嬴氏好合,乃飞凤声。遂攀凤翼,参翥高冥。女祠奇想,遗音载清。”^[7]

如果说《列仙传》所述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那么《史记》则是真实可靠的信史。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示之以宫室、钱粮,但由余皆嗤之以鼻。接着秦穆公又炫耀其诗书礼乐法度,又自取其辱,于是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察。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穆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8]。秦穆公用离间计把贤士由余留在自己身边,又用曼妙的歌舞和女乐迷惑戎王,使戎王沉溺于女色歌舞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终灭了戎王,实现了开地千里,灭国十二的战略目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人擅长音乐歌舞的事实。

不仅如此,秦人还有自成系统的音乐理论著

述,这些都散见于《吕氏春秋》的《吕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古籍之中,内容涉及到音乐的情性特质、社会功能、音乐欣赏和音乐的地域特色等,这也可以看作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9]。

秦的音律律名是继承了周王朝的律名,与文献所载周的音律律名也是相同的,这种定型化的律名为后世沿用并传留下来^[10]。如果把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乙 76~79 记载的秦音生律法与《吕氏春秋·音律篇》的记载两相对比,那么就会发现,从林钟到应钟的声律次序,二者完全相同: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这表明放马滩秦简所记秦的生律法与《吕氏春秋》所记出自一个系统^[11]。

二、考古出土秦国音乐文物

(一)大堡子山出土的秦国礼乐文物

2006年,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发现一处祭祀遗迹,包括4座人祭坑、6个灰坑和1座乐器坑。乐器坑长8.8、宽2.1、深约1.6米,东西向。坑内乐器分为两排,南侧为铜钟镛与钟架,北侧为10件石磬与磬架。在南侧木质钟架朽痕旁,由西向东、由大到小依次排列3件铜镛,8枚甬钟,三件铜虎(附于镛),镛和钟各附带一件青铜挂钩,外观完整,纹饰华贵。编钟和编磬之间发现小型螺丝状骨质器物15件,并与朱砂粘连,推测可能是一种弹拨乐器的构件。年代为春秋早期^[12]。

三件铜镛中,最大的一件秦子镛通高66厘米,重48.4千克,鼓部素面,镛体饰有4条透雕扁蟠龙纹扉棱,舞面与镛身均饰以曲体龙纹;镛身上下一周各有一条祥带,上缀八棱等距的菱形枚,并间以变形三角蝉纹。钟钮为镂空龙纹桥形钮,与器身的两条扉棱相衔接。铉部铸有28字铭文(含2字重文):“秦子作宝铉钟,以其三镛,厥音缺缺澌澌(雍

雍),秦子峻衿(命)在位,眉寿万年无疆”。作器者为“秦子”,故有学者称此为“秦子乐器坑”。

秦子搏的形制纹饰与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其他西周晚期编搏相比,如清代出土于陕西扶风任家村的克搏、1985年陕西眉县杨家村与速钟同出的3件编搏等,都是器形既大且重,体呈椭圆形,只是秦子搏的两栞更加外鼓,扩大了共鸣腔的腹部。克搏和杨家村搏同样有四个棱脊,克搏的棱脊为连体龙形,杨家村搏的棱脊为爬虎形,所以克搏棱脊更近于秦子搏。周秦编搏形制、纹饰和组合的相同或相近,表明秦国编搏上承周制。

在大堡子山乐器坑中与秦子搏同时出土的八件合瓦形结构的青铜甬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甬钟大小有别,最大一件通高达54厘米,舞部纹饰分为4个单元,皆饰阴线卷云纹;钲部左右的篆部各分5区,1、3、5区各有3个枚,2、4区饰阳线三角夔纹;正鼓部(篆部下方)为左右对称的阴线顾首夔龙纹或鸟纹。二是形制相似,其形制、纹饰和组合与西周晚期编钟风格吻合,如舞部饰卷云纹,篆间饰斜角双头兽纹,鼓部饰顾夔纹。从第三件起,右侧鼓部增饰小鸟纹作为第二基音标志,钟内壁有数目不等的隧等,都为西周晚期编钟所常见。由此可见,秦子所作编钟与编搏一样,基本上都是固守西周晚期的传统,并且至少到秦武公时还是如此^[13]。

3件铜虎出土时1虎(K5:2)位于搏(K5:3)旁,1虎(K5:4)位于搏(K5:5)的舞部,1虎(K5:2)位于两件甬钟(K5:6和K5:8)之间。规格和形制大体相仿,虎体中空,作伏踞状,巨首回顾,粗尾上卷,耸耳尖爪。腿躯交接处饰螺纹以象股肌,虎身饰三角对称式简化窃曲纹。这三件铜虎原本与三件编搏相配,但是在“埋葬过程中或坑坍塌后脱落滚动”,才造成了出土时的错位^[14]。关于3件铜虎的性质和用途,梁云认为是中国古乐器“敌”^[15];祝中熹先生则认为铜虎的用途与同时出土的金虎一

样,具有神秘的宗教意义,是秦人崇拜虎的情结的产物^[16]。

北排磬架朽痕下有2组共10件石磬,每面都有阴刻祥云图案,按照由东向西、由大到小的方式排列,均保存完好。编磬底边呈拱弧形,股、鼓上也微有凹弧,形成股、鼓上角向上翘起的态势。与陕西凤翔南指挥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编磬形制接近。这种股、鼓、底三边皆弧的编磬,目前仅见于秦墓,彰显了秦国编磬的创新性及其显著的地域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17]。

青铜搏钟和石磬出土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朱东生先生曾做过测音工作和实验性演奏,演奏过《东方红》等乐曲,音乐性能很好。朱东生教授说:“秦公大墓出土的这11件铜钟搏乐器,石磬音域宽到3个多8度,铜钟搏的音色和音质、音准都非常好,可以演奏很多器乐。古人对器乐的排列,是按宫商角徵羽编造的。用现在的简谱表示,就是哆来咪嗦啦这五个音组成的。用这五个音,就可以演奏很多乐曲。”从这些出土乐器,可以一窥秦人宫廷乐队的宏大规模。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作曲家赵小钧说:“在通行的中国音乐、美学的史料里,都是把先秦音乐和汉族的音乐放在一起谈,提到秦音乐的时候都是一带而过,说没有留下印记,也没有大的贡献。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秦早期乐器,尤其是这些编钟和编磬,证明秦早期的音乐是非常辉煌的。所以我们的教材、论著对这一段音乐的历史应予以纠正。”^[18]

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的这套乐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最早、最完整的一套秦国乐器,不仅昭示了大堡子山墓葬的性质和级别,加深了我们对秦国音乐艺术和青铜铸造技术的认识,也为我国古代音乐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外,1998年底上海博物馆入藏秦公钟1件;日本美秀博物馆收藏秦式龙纹搏1件,“秦公钟”“秦子钟”甬钟两套各4件;美国及台北收藏家各藏秦式搏1

件;美籍华裔收藏家藏3件甬钟等。这些流失海外的秦子、秦公钟铸从时代、形制和铭文内容看,当出自礼县大堡子山被盗大墓^[19]。钟铸和石磬等金石乐器互为阴阳,演奏时钟磬齐鸣,清脆响亮,悠扬动听,气魄宏伟,是社会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证明早在2700年以前的春秋早期,地处西垂的秦国不仅已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理论和礼乐传统,而且铸造技术水平也相当高。

(二)其他地区出土秦国音乐文物

除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外,传世及陕西关中地区和甘肃东部也出土了一些秦国及秦代音乐文化的物质遗存。

传世的有北宋内府旧藏秦公铸1件,通高74.57、钮高19.5、铣间距35厘米,铭文143字^[20]。

1977年,陕西宝鸡杨家沟太公庙村出土春秋早期的秦武公编钟5件、编铸3件^[21]。5件钟形制、花纹相同,唯大小有所差别。最大的通高48、甬高17、铣间距27厘米,重24千克;最小的通高27.6、甬高10.2、铣间距15.2厘米,重6千克。甬上端饰四条小龙;幹带上有四组变形雷纹;旋饰重环纹;舞部纹饰可分为四区,每区内有三条变形夔纹相绕;钲部纹饰分为五个区段,一、三、五区段内各有枚三个,二、四区段内各饰两条双身夔龙;鼓部正中饰相对的风鸟纹。甲、乙两钟铭文相合为一篇,丙、丁、戊三钟铭文连续为一篇;两篇铭文内容相同,全篇共135字,重文4,合文1。5件铸形制基本一致,花纹相同。最大的通高75.1、舞宽30.4×26厘米,重62.5千克。铸身中部鼓起呈弧形,鼓部平齐,有四个扉棱,扉棱由飞龙和凤鸟蟠曲而成。铸身上下各有一条由变形蝉纹、窃曲纹和菱形枚组成的条带纹,条带纹中间纹饰分为四个区段,每一区段有六条飞龙勾连;舞部纹饰也分为四个区段,每一区段内有两龙相绕,旁有一小凤鸟。每一件铸的铭文,与甲、乙两钟铭文内容完全相同。

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春秋后期秦国20余

件编磬,石磬上的铭文“百乐咸奏”“载人”“有漾”表明春秋末期秦的音乐文化已高达发达,乐器种类繁多,演奏程序已相当完善;同时刻铭石磬与其他众多礼器一同下葬,也反映了春秋时期秦国对礼乐制度的重视^[22]。

1976年,秦始皇陵园内出土一枚秦“乐府”钟。通高13.3、铣间距7.2厘米,重538克。钲部和鼓部饰错金银蟠螭纹,篆间饰错金流云纹。钟钮侧面刻“乐府”二字铭文。“乐府”钟的出土,不仅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珍贵材料,更表明了秦代确实设有“乐府”官署^[23]。

1978、1986年,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两次共出土战鼓7面,鼓旁边还发现了木质鼓槌。一号坑T10第五过洞和T9第九过洞的指挥车上与鼓伴出了各一件小甬钟,是“鸣金收兵”的金,即“钲”。通高26.7厘米,重2.3千克,饰蟠螭纹^[24]。

(三)民俗文化映证秦国的礼乐文明

随着秦西垂陵园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历史之谜得以破解,比如《诗经·秦风·蒹葭》的创作地域和文化背景等,也都有了明确的答案。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发现之前,人们认为《诗经·秦风》产生的地域全部在陕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发现以后,《诗经·秦风》中早期作品的创作地域和创作背景也就逐渐明晰起来。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秦公墓地的发现,秦人早期活动地域逐渐清晰起来,《诗经·秦风》中一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在,至少可以这样说,《诗经·秦风》中赞美秦人祖先的诗歌基本上是在甘肃产生的。《诗经·秦风》中《车邻》《驷》《小戎》《蒹葭》这四篇是在甘肃南部(应为东南部——作者注)西汉水上游一带诞生的,它们是秦人崛起西垂的见证。”大堡子山乐器坑中出土的编钟编磬等精美乐器,结合《诗经·秦风》中的《蒹葭》《驷》《小戎》和《车邻》等西垂诗歌的创作,二者互相印证,为证明秦国早期即拥有发达的诗教



传统和礼乐文明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详尽的实物资料。

秦人因为祭祀先祖的需要，很早就制作了宗庙音乐。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被视为中国古代乞巧文化“活化石”的西和、礼县等西汉水上游地区的民间乞巧活动，据研究就是古代秦人祭祀其先祖女修的原始宗教或者祭祀仪式在现代社会的孑遗，是秦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既古朴又神秘的秦文化的一些元素。在七天八夜的乞巧节期间，女孩们要举行迎巧、坐巧、拜巧、祭巧、花瓣卜巧、跳麻姐姐、送巧等一系列的仪式，祈求巧娘娘赐给她们巧慧。乞巧姑娘们所崇拜和祭祀的巧娘娘，赵逵夫先生认为就是秦人先祖女修^[25]。在整个乞巧过程中，乞巧姑娘们态度之虔诚、歌舞之繁盛、曲词之丰富，音乐之优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种种乞巧程式，不仅从某些侧面含蓄地反映古代秦人的文化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国音乐歌舞和祭祀制度、丧葬制度和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发达程度。

另外，从丧葬习俗来看，西和至今仍保留着诗祭的传统。比如西和县城附近的老年人去世后，在出殡前一天的晚上要举行家祭仪式，祭祀仪式中有一项“唱诗班唱诗”的内容，就是邀请“礼生”带领唱诗班唱《诗经·小雅·蓼莪》等诗，这一传统与古代秦国的祭祀制度应当有割舍不开的关系。

三、秦人重视礼乐的原因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国统治者之所以重视礼乐，一是把礼乐当作庙堂祭祀的必备内容，通过祭祀为祖先歌功颂德，“以宴皇公”，并祈求“以受大福，屯鲁多厘，大寿万年”。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秦始皇曾令“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以求长命不死，演奏礼乐，在娱神的同时又娱人。二是把音乐作为一种统治国家的手段，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国之大事，都要演奏编钟编磬等大型组合乐器，甚至还可

直接用于军事行动。所谓“金钲建鼓”，就为把钲与鼓两种敲击乐器作为指挥作战的高级军吏发号施令的信号器具。考古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的军乐器钲、鼓，都置于战车（指挥车）之上。不仅如此，秦穆公还曾直接利用音乐歌舞加美人计来实现其军事目的。如秦惠王为了使囚于楚国的张仪免遭杀害，曾“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史记·秦本记》和《吕氏春秋·贵直·雍塞》还记载，秦穆公曾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大喜，受而悦之，终年不还之事。戎王从此陶醉于女乐歌舞之中，以至“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扞）弓而射之。秦寇果到，戎王醉而卧于樽下，卒生缚而擒之。”三是把音乐作为一种国礼，在朝聘时被用来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编钟和编磬，音色独特，尤其适合伴奏，多用于宫廷歌伎演奏和朝聘、宴享等重大国事活动。四是把“金石之乐”作为亡人特殊身份地位的象征，用于重大葬礼，一般贵族是没有资格享用乐器陪葬的，所以迄今发掘的数量众多的中小型秦墓中，从未见有乐器随葬^[26]。

四、秦国礼乐文明对汉代文化的影响

秦国不但有发达的礼乐文明，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以降的许多礼乐文明成果，大都是在秦国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27]

《汉书·礼乐志》还记载了叔孙通主持秦国遗民为汉高祖制作宗庙音乐的一些史料：“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太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大抵皆因秦旧事焉。”^[28]《汉书》明言高祖所定宗庙音乐是“因秦乐人制”，说明秦国早就有专门负责音乐事务的官员——乐人，也说明秦国有相对完善的礼乐制度

和发达的宗庙祭祀音乐。叔孙通又因秦之制,改制雅乐,如《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等。

西汉礼乐文明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通西域和开发西南夷,吸收异域音乐文化元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建立在秦国礼乐制度和礼乐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秦帝国为继起的西汉帝国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秦朝和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明,就不可能出现汉代那么发达的礼乐文明。

无论是古籍的记载,还是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不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历经千年而不衰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乞巧民俗文化,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印证了秦国不仅有深厚丰富的礼乐文化传统,还有很高的音乐水平。

注释

[1]《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2543~2544页,中华书局,1959年。

[2](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五《缶部》,第895页,(宋)徐铉校定汲古阁本,中国书店,1989年。

[3](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六《声音》,第9页,影印本《四库全书》子部十。

[4]彭程:《文学史料中记载的“箏”》,《艺术科技》2017年第8期。

[5](辽)释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四《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第六》,[日]狮谷白莲社藏版,延享三年(1746年)。

[6]张善庆:《昊天兮孔明,陈我兮谁听——明代康海〈闻箏〉诗赏析》,《潍坊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2年第2期。

[7]王叔岷著:《列仙传笺注》,第96页,中华书局,2007年。

[8]《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第192~194页。

[9]张一中:《〈吕氏春秋〉的音乐思想》,《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10]方建军:《从乐器、音阶、音律和音乐功能看秦音乐文化之构成》,《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2期。

[11]刘世芮:《〈吕氏春秋〉的“音乐”论探析》,《社科纵横》2001年第4期。

[12]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11期。

[13]张伟:《秦西垂陵区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文物鉴赏》,《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第9期。

[14][15]梁云:《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

[16]祝中熹:《大堡子山秦陵乐器坑所出铜虎性质刍议》,《丝绸之路》2010年第2期。

[17]方建军:《秦子搏的器主和时代》,《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8]千古遗恨秦公大墓(下集),刘润和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rhjc> (2016-03-09)

[19][20]赵化成、王辉、韦正:《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8年第11期。

[21]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搏》,《文物》1978年第11期。

[22]姜采凡:《秦公大墓的磬》,《秦文化论丛(第七辑)》,第547~55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23]陈四海:《秦始皇陵园出土的乐器、百戏俑考》,《音乐研究(季刊)》2005年第3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年)》,第22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25]赵逵夫:《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26]方建军:《从乐器、音阶、音律和音乐功能看秦音乐文化之构成》,《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2期。

[27][28]《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第1043页,中华书局,1962年。

北宋时期庄浪地区的佛教文化及其特点

□陈晓斌(庄浪县博物馆)

内容提要:北宋时期,庄浪地区佛教文化比较繁荣,既有寺院,又有开凿的石窟。20世纪70年代以来,庄浪陆续出土了一批北宋时期的佛教遗物。在查阅相关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对庄浪境内北宋时期佛教文化作简要分析,并对其特点略作探讨。

关键词:庄浪;北宋;佛教文化;信众广泛

庄浪是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比较有地域性特征的地段之一。早在北魏时期,庄浪地区佛教文化传播与发展比较显著,出现了陈家洞石窟浮雕的三佛石刻、良邑镇李家咀宝泉寺的卜氏造像塔等。而在唐代,“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唐朝的衰落,吐蕃乘势东进,占领了包括庄浪在内的河陇地区,并长期对其实行统治。在这种情形下,大量的庄浪汉民纷纷外迁,使这里日渐荒芜,人口越来越稀少^①”。这些因素是庄浪佛教文化进入衰落期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物很少。到北宋时期,庄浪地区佛教文化进入了相对繁荣阶段,寺院的修建、石窟的开凿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具体表现在寺院规模大、佛教遗物数量多、艺术价值高、信众广

泛等诸多方面,既有北宋时期全国佛教文化的共性,又有地域差异和独特性,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庄浪出土的一些佛教遗物及其铭文,对这一时期佛教文化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史料,对庄浪北宋时期佛教文化的发展概况、地域性特征作一探讨。

一、北宋时期庄浪佛教的概况

庄浪地区的佛教文化经历了北魏传播与发展期,唐代衰落期,到北宋进入繁荣期,修建寺院、开凿石窟,出土了大量佛教遗物。

(一)寺院遗址及文物

北宋时期,庄浪地区的寺院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自北魏建寺以来,历经发展及衰落,

在北宋时期继续流传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另一种是在北宋时期初建的寺院。

宝泉寺 宝泉寺遗址位于庄浪县良邑镇李咀村,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北魏佛教文化遗址。遗址地在李咀村东南寺棱山下,其东面有一眼泉水,因水质甘甜,四季长流,当地群众称该泉为宝泉,寺院因泉而名,为宝泉寺。李咀村是天水去往平凉古道的一处驿站,从天水方向而来的古代商贾,出庄浪县城,下马休整,在水泉边饮马,在宝泉寺上香祈福,随后,又赶马去向小六盘。随着古道商贸物流的日渐繁荣,宝泉寺的佛事也日渐兴盛。早在北魏时期,宝泉寺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重地之一,卜氏石造像塔即是北魏时期的佛教遗物。唐代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以及吐蕃的长期统治,庄浪佛教文化进入了衰落期,宝泉寺也是如此。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佛教逐渐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具体表现在该寺出土的佛教遗物上:

八面体石经幢 1986年4月庄浪县良种场院内出土。石灰岩质。长152、直径39厘米。共刻字32行,每行35字,共计1100余字,但文字已漫漶不清,难以辨认。文中可见的纪年为“建中靖国元年”(照1)。

九面体石经幢 1986年4月庄浪县良种场院内出土。石灰岩质。长142、直径39、面宽16厘米。每面刻楷书字4行,共32行,每行40余字,共计1250字。上刻纪年为“巨宋绍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文题为“德顶宗胜陀罗尼经”;文首刻署“男、洛苑使泾原

路第二将军渭州驻扎雷胜”;末云“生父母累劫,亲姻读诵金詮、见闻随喜、抱识舍情、同登彼岸”“水(邈)洛医人彭城刘晖书,义渠荔菲蕢刊”(照2)。

八面体与九面体石经幢现藏于庄浪县博物馆。通过纪年铭文可以确定,八面体(建中靖国元年)与九面体石经幢(巨宋绍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时间上相隔七年,且二者皆为北宋时期的佛教遗物。同时,可知八面体与九面体石经幢的施主都是驻扎在平凉的将军雷胜。“1986年4月,庄浪县良种场院内出土了两件石经幢。传云,经幢最初系由良邑镇宝泉寺搬运至此地的^[2]”。“据原建良种场负责人王志元同志回忆,经幢早年从良邑宝泉寺搬运而来^[3]”。由此可以推知,在北宋时期,宝泉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场所。

释迦院 位于庄浪县水洛镇王庄村,地处二郎山南面,水洛南河北面的寺平塬上。据说此地是因有寺院而得名。释迦院塔地宫位于庄浪县寺平塬二级台地上,其与紫荆山皆属于二郎山脉,距离仅百米之遥。寺平塬地势开阔,地形与紫荆山高低相同,又属山南水北之阳地,是佛家选



照1 八面体石经幢



照2 九面体石经幢拓片



照3 释迦院塔地宫附近发现琉璃瓦残片
址建寺的绝佳之地。

庄浪县博物馆在历年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现状调查中，在释迦院塔地宫附近多次发现宋代琉璃瓦残片(照3)。这一现象表明在北宋时期，此处当有寺院存在。而今，只有释迦院塔地宫尚在，寺院和释迦院塔已荡然无存。《宋会要辑稿》记载：“诸路转运司，应部内诸州有神庙、不系赐额佛堂，无僧主持，据山险孤迥之地，为盗贼藏伏者，并令毁拆。^[4]”释迦院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毁的。

2005年9月26日，庄浪县释迦院塔地宫被盜掘，瘞埋佛骨舍利的石棺被移出地宫，石棺铭文记载：“大宋元祐元年，岁次丙寅拾月壹日乙酉朔，施主：李利涉、刘泽等貳人，舍水洛城释迦院塔下葬佛骨石棺壹座。岁改年移，愿不毁。于寔故志。”由此可以确定，此石棺为北宋时期的佛教遗物。明确记载了寺平塬有塔且有院这一重要信息，并在塔下地宫中下葬佛骨石棺一座，显然石棺铭文中的院就是寺院，也可以明确塔在寺院里面，该寺院应为释迦院。

磁州窑蓝绿釉黑花方炉 1975年水洛镇寺平塬遗址出土2件宋代绿釉黑花方炉。高18.4、口边长24.0厘米。体呈方斗形，下接四足方座。敞口，方唇，斜直深腹，四面梯形，平底。座出二阶方沿，下为四个象首足。通体施孔雀蓝釉。炉体四面彩绘，一件开光内饰芦雁纹，外绘折枝花卉纹，现藏于平凉市博物馆(照4-左)。另一件开光内外均绘折枝花卉纹，现藏于庄浪县博物馆(照4-右)。这两件蓝绿釉黑花方炉，尺寸、形制完全相同，只纹饰不同，



照4 磁州窑蓝绿釉黑花方炉

它们应该是寺院内的香炉，代表了磁州窑制瓷工艺的水平，弥足珍贵。

铁佛坐像 水洛镇寺平塬遗址出土。高10、宽4.3、厚3厘米。头顶有珠严，面部圆丰，慈眉善目，袒胸，内着裙，外着双领下垂式大衣，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神态安详(照5)。

石棺 2005年水洛镇寺平塬释迦院塔地宫出土。长99.0、宽65.0、高90.0厘米。灰沙岩质。由棺盖、棺身、棺座三部分组成。棺身略呈长方形，下部出沿，在出沿的平台上钻有许多细小圆孔，平台下方四周雕凿凹形如意头纹，前后各两组，左右各四组，排列有序。下部为三级须弥座，底部内凹，底座



照5 铁佛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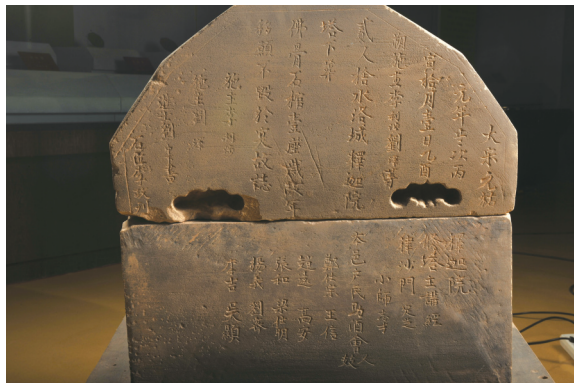
照6 释迦院塔地宫出土石棺

顶部四角雕凿凹形方槽，可与棺身底部四角凸起扣合。石棺通体施黑彩，保存完整(照6)。石棺尾部阴刻铭文计122字(照7)：

大宋元佑元年，岁次丙寅拾月壹日乙酉朔，施主：李利涉、刘泽等貳人，舍水洛城释迦院塔下葬佛骨石棺壹座。岁改年移，愿不毁，于寔故志。施主李利涉，施主刘泽，进士刘中下书，石匠李政刊。

释迦院修塔，主讲经律沙门定芝；小师志才；本邑户民助酒会数人：郑仕宗、王信、赵远、高安、张和、梁仕明、杨义、刘齐、李吉、吴显。

马家寺遗址 位于庄浪县韩店镇马家寺村西北山坡上，坐标北纬35°14′01.4″，东经106°13′47.0″，海拔高1935米。东西长30米，南北宽80米，面积约2400平方米。该寺毁于何时无考，原址地形地貌因受自然滑坡坍塌改变，现呈沟坡小块梯田埂状，种植农作物，原暴露文化层堆积无存。属宋代寺庙遗址^⑤。



照7 石棺铭文

大庙山寺庙遗址 位于庄浪县朱店镇郭湾村东南1000米大庙山顶。坐标北纬35°06′39.1″，东经106°02′24.2″，海拔高1948米。北面与烽台梁相向，南望窠家沟，东临申家后湾里，西北距郭家湾约1000

米。遗址地表暴露4件石柱础，自北向南呈一字排列，大小形制略同，灰砂岩质，上雕覆莲纹。柱础高40、顶面直径70、底面直径90厘米，中心有六边形柱孔，孔径10~12、深36厘米。柱杆间距220~340厘米不等。地表有砖瓦堆积痕迹，发现白釉、黑釉瓷片，从柱杆分布看应为殿宇建筑大型构件，属宋代寺庙遗址^⑥(照8)。

(二)石窟

宋代时期，庄浪地区开凿的石窟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在地域分布上相对集中，皆开凿于云崖寺内。统计资料显示仅有4个洞窟属于宋代开凿，分别是白云洞、特1窟、竹林寺2号窟、木匠崖石窟。虽然宋代石窟规模小、数量少，但也呈现了宋代佛教文化的时代风格和特征，是庄浪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庄浪宋代佛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白云洞 明人胡纘宗在《主山白云洞记》中提到宋僧法印在这一带曾开凿过洞窟：“(云崖)寺崖



照8 大庙山寺遗址



照9 竹林寺石窟



照10 竹林寺石窟2号窟

左壁有洞焉,山僧法印所辟者,其洞朝夕多云。”^[7]民国《增修华亭县志》卷1《地理志》也记载:“寺(即云崖寺石窟)分中、东、南、西、北五台……中台左崖有白云洞,为宋僧法印凿。”^[8]遗憾的是,此窟究竟是云崖寺中哪个洞窟,至今尚不明确,但通过史料记载可以确定,宋僧法印在云崖寺开凿过名为白云洞的石窟。

特1窟 方形平顶小窟,目前不能到达,通过望远镜观察可以看见窟内的部分内容。窟内正壁一佛坐于方台上,右壁一菩萨,左壁难以观察造像组合,应该是一佛二菩萨,保存基本完好。“右壁的菩萨,袒上身,斜披络腋,下着裙,身材较粗短,另外还可看见正壁佛的袈裟衣角,从这些特点看,与武山木梯寺石窟第5、7窟内的造像相同,应该是宋代的作品^[9]”。

竹林寺2号窟 为长方形敞口平顶窟,面阔5.92、高2.20米,顶部残留少许壁画,烟熏严重,内容难以辨认。正壁设长方形坛基,有一个圆形图案似为头光。“其造像风格与麦积山石窟第127窟后期塑造的一佛二菩萨相似。第127窟的这一组造像时代约在宋、元之间,所以可将竹林寺石窟第2窟确定在宋元之际”^[10](照9、10)。

木匠崖(木匠爷)石窟 或称舍身崖。为一高约8~10米,宽15米,深5米的天然岩洞。相传一

位笃信佛教的木工,修建好云崖寺石窟群之后,不慎从此险绝处坠下悬崖,粉身碎骨。时人认为是脱化成佛了,为了纪念,称此崖称为“舍身崖”,亦称“木匠崖”,并为其凿洞塑像。“洞下有零星桩孔,正中有一泥塑造像,保存完整,似宋代风格”^[11]。

二、北宋庄浪地区佛教的特点

北宋王朝是在平定内忧外患、统一五代十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刘沪收复水洛城^[12],到《皇宋王家城隍庙碑铭》立碑时间嘉祐五年(1060年),水洛城出现了秀林美实、田畴膏壤的繁华景象,直到政和五年(1115年),宋夏边界狼烟再起^[13]。北宋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时间。庄浪出土有纪年铭文的北宋时期佛教文物为:元祐元年(1086年)释迦塔院地宫石棺、绍圣元年(1094年)九面体石经幢、建中靖国(1101年)八面体石经幢、崇宁(1102~1106年)通宝罗汉像陶模。从铭文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庄浪佛教的发展,正好在这段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可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佛教文化的发展。

(一)寺院规模大

1986年4月,庄浪县良种场院内出土了两件北宋时期的石经幢,如前文所述,都是由宝泉寺搬运至此。由石经幢体积和高超的书法艺术可知,宝



照 11 释迦塔院地宫一佛二弟子砖雕

泉寺在北宋时期应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

释迦院塔地宫出土了瘞埋佛骨的石棺，铭文记载了释迦院塔下葬佛骨石棺一座，说明了此寺院有佛塔。并且地宫正中有一佛二弟子砖雕图案，二弟子图案已被盗掘者撬下，现藏于庄浪县博物馆(照 11)。同时，在寺平源遗址中发现了许多佛教遗迹和遗物：磁州窑蓝绿釉黑花方炉、佛像陶模、铁佛坐像、释迦塔院地宫、石棺等，遗物数量较大，工艺精美，研究价值高。

2005年10月9日平凉市文物管理局对释迦院塔地宫进行了清理，“塔基东西残宽约8.5米，南北由于五十年代农田基本建设毁坏不清，深3.5米。顶层为0.3米的灰褐色扰土层，下为夯土层，再回填夯打而上，土层厚度4至10厘米不等”^[14]；“地宫内有菊花纹砖雕1块、牡丹纹砖雕3块、仕女图砖雕二块，以及一些施主的姓名。另外有墨书题记二处：字体为行书。宫门上部第一层平砖中间墨书‘张行口’。北壁第二层平砖偏东墨书‘康’。拱卷门内两壁有对称墨绘，漫漶不清”^[15]。这些遗迹和遗物，反映了释迦院规格高、规模大、文化内涵丰富的特点。

此外，参与宝泉寺佛事活动的施主雷胜，参与释迦院地宫下葬佛骨石棺的刘中下，一个是驻扎在平凉的将军，另一个是进士。二者皆是社会上层

人物，能够在寺院进行礼佛活动，并且雷胜不远百里两次来宝泉寺进行募捐活动，足以说明了宝泉寺、释迦院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规模宏大。

综上所述，从佛教遗物的体积、数量、精美程度以及高超的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考证，宝泉寺和释迦院在北宋时期的规模可见一斑。佛教遗物上的铭文，反映了参与佛事活动的人物既有将军雷胜、进士刘中下等上层人物，也有普通百姓，可以说是全民参与佛事活动，表面当时佛事活动场面壮观。从释迦院塔地宫附近发现的琉璃瓦残片可以推知，当时释迦院金碧辉煌，规模宏大。

(二)信众广泛

“到宋代，佛教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从影响的阶层而言，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士人，乃至普通民众，无不广泛接受佛教；从社会思想而言，佛教及其理论已经具有基础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儒学”^[16]。从北宋时期庄浪佛教的具体情况而言，也是如此，无论从北宋元祐年间的石棺铭文所记参与本次活动者的职务，还是从石经幢施主雷胜而言，他们都是社会中的上层人物，一个是进士，另一个是将军。

“宋代寺院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仅寺院的出家人往往具有给信众指示生活方向的地位，寺院以其幽深宁静，又有相当藏



照 12 “崇宁通宝”钱纹罗汉像陶模



照 13 水月观音陶模



照 14 弥勒佛陶模



照 15 释迦牟尼涅槃像陶模

发现了庄浪县韩店镇马家寺村西北 1000 米处苏家湾沟畔的马家寺遗址、庄浪县朱店镇郭湾村东南 1000 米处的大庙山寺庙遗址。根据遗址出土的陶片和瓷片等相关信息综合分析，这两处寺庙应当是宋代时期的遗址。这两处的遗址规模比较小，没有出土比较珍贵的佛教文物，应当是宋人村落的小寺庙，说明底层的百姓在当时也参与礼佛活动。

从庄浪发现北宋崇宁年间制作的一些佛教陶模，有“崇宁通宝”钱纹罗汉像（照 12）、水月观音（照

书，往往是学人探讨学问之处”^[17]。宝泉寺、释迦院的地理位置正如上述所言，远离尘嚣，处于幽深宁静之地，是文化人探究学问非常向往的地方，并且从瘞埋佛骨的石棺、石经幢可以看出，一些佛教活动，他们也乐于参与其中。由此可见，北宋时期，佛教对上层社会的文化人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当地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资源可以看出，北宋时期佛教与当地广大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寺院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文化中心的地位；寺院经济可能在当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佛教节日也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节日。

2008 年，在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

13)、弥勒佛(照 14)、释迦牟尼涅槃(照 15)、磨喝乐、童子礼佛等。这些陶模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纹饰刻画繁简错落有致，形象逼真，蕴含着丰富的宋代佛教文化内涵。这一现象说明，在北宋时期，佛教文化在当地居民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佛教的教义、修行方式逐渐简易化和平民化，‘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景象自此产生，佛教真正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可以说，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的时期”^[18]。

此外，2005 年 5 月 9 日“皇宋王家城隍庙碑铭”出土于韩店镇西门村古葭城。此碑记载：“水迳三山东来，二水分注。主阜中位，如虎之踞；客冈旁

拱,如风之舞。又其东山有青铜白金,秀林美实;大车之扑,广夏之材,民所取之,其利斯博。故其民弃泾原故土即水邈新居者万有余户,善利诱之然也。然又于三山两川间,可城可戍者有数十所。其川谷气候,田畴膏壤,在秦之下、陇之上。”^[19]通过以上碑文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庄浪境内土地肥沃,气候湿润,物产丰富,生态环境良好,适合人们居住,故而从泾原迁来庄浪居住的民众有一万多户。这些外来民众受到当地佛教文化的影响,既是北宋时期庄浪佛教文化的继承者,又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者。正因为地广民众的社会环境,使庄浪佛教文化在北宋时期不断发展,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

庄浪在北宋时期修建的佛教寺院、开凿的佛教石窟、出土的各类佛教遗物,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各种环境的影响,北宋佛教文化在当地呈现出了相对繁荣的景象。这一现象不但反映在佛教遗物多样化,而且反映在当时当地资源丰富、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上。

三、结语

北宋中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在统治者保护和支持佛教的政策下,以及佛教教义的简化,使佛教盛行于平民大众之中,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信仰的宗教,并对宋代文化习俗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对庄浪北宋时期寺院、石窟、佛教遗物等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对当时的佛教文化及其特点进行论述。在这一时期,佛教文化发展速度较快,比较繁荣,这些都可以通过出土的佛教遗物得到充分佐证。同时,佛教文化广泛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深入人们的生活。种种迹象表明,佛教文化在北宋时期已经确立了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注释:

[1]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第13页,甘肃文化出版社。

[2]王克生、刘继涛:《庄浪金石》,第2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3]丁广学、程晓钟、李晓斌:《文物胜景》,第182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

[4]《宋会要辑稿》第6941页,第一百七十七册,兵十一。

[5]《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档案》,庄浪韩店卷。

[6]《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档案》,庄浪朱店卷。

[7]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第37页。

[8]乾隆《静宁州志》卷七《艺文志》、民国《增修华亭县志》卷四《艺文志》。

[9]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第16页。

[10]董广强:《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

[11]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第37页。

[12][13]柳林:《吴玠吴玠传》,第7~10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

[14]陶荣:《崇信古文化研究》,第1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5]陶荣:《崇信古文化研究》,第159页。

[16][18]http://www.kf.cn/blwb/html/2015-01/30/content_201980.htm.

[17]闫孟祥:《宋代佛教史》,第10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

[19]王克生、刘继涛:《庄浪金石》,第202页、第20页。

曹安德与曹友闻世系关系辨析

□曹鹏雁 宋 雯(徽县博物馆)

内容提要:《天水县志》和《点注天水县志》收录的《大元赠怀远大将军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副万户轻骑都尉追赠谯国郡侯曹公墓碑铭》对曹安德与曹友闻的记述与《宋史》《元史》《徽郡志》《徽县志》等史志有出入。经笔者研究发现,曹友闻非曹友庆家族成员,曹友闻弟兄是与曹友庆家族的祖辈、曾祖辈同时代人。

关键词:天水县志;曹安德;曹友闻;世系

哈锐、任承允、贾纘绪三位天水学者曾于民国十八年三月至二十五年冬(1929年4月~1936年11月)受邀编纂《天水县志》^[1]。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1940年1月),天水县长闽侯人叶忆澍将志稿刊印成书。2007年,该书由潘守正点注出版为《点注天水县志》^[2]。两书在“艺文志艺文二·金石附”中收录有《大元赠怀远大将军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副万户轻骑都尉追赠谯国郡侯曹公墓碑铭》^[3]。关于元代谯国郡侯曹安德之墓,按《天水县志》(卷之一舆地志·陵墓)所记,墓“在县城南十里慧音山南郭寺西”。清乾隆版《直隶秦州新志》记载:“曹国公墓,(州城)南五里处,逸其世代名字。”^[4]成书于1938年的《天水小志》记载:“曹国公墓,在城南南

郭寺西,有墓志铭。”^[5]但是,曹安德墓园与墓志今已无存。

一、民国《天水县志》收录的曹安德墓碑铭

大元赠怀远大将军、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副万户轻骑都尉、追赠谯国郡侯曹公墓碑铭

人有立开国之功,天必锡享爵之应。开国之功,施之于□□,□服蛮貊皆遵其化;享爵之应,荣之于一家,子孙宗族俱昭其名。是以流风善政,虽歿□□有存者也。公讳安德,字燕,其先河间人,天资奇伟,秉性殊特,人以大器目之。至元十二年,袭父职,佩虎符,宣授忠显校尉、炮水

手都元帅；十五年，改授昭信校尉，攻□定远、永安诸城，历□教授；十七年，升武略将军；二十四年，以军功拜宣武将军，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副万户，佩虎符，分镇顺元、莒州，士庶逸安；二十□年，以疾终于莒，朝廷推功，加赠谯国郡侯。惟公勇以制其敌，恩以抚其众，威以镇其边，忠以守其职。凡兴师，御寇以死节，临难□苟免也。於戏！能如公者，几何人哉！

肇我皇元，应天启运，神武当兴。公之始祖讳义，通六礼、七兵，有良将之风，乃奋其烈，慨然有澄清中原之志，遂赴京，以炮艺见称，即奉命行□，取山东，定河北，破回鹘，克宁夏。□虏贪戎，草伏庐处，皆化为家，不威而臣者一十七国。厥功茂焉，赐答刺罕，仍令军中呼为“曹大父”，以别其□。士卒、帅吏皆以“爷爷”称之。佩虎符、金牌各一，宣授炮水手都元帅，克凤翔、临洮等一十余郡。乙未，卫辅皇子阔端，复收阶、会、陇、巩昌、石门山（三）郡遂附之。（龙直）丙申，攻巴蜀，至天安山寨，用飞炮破之，朝天、剑南，望风披靡，抵绵州□□□□□，一夕□□，人以为神，成都诸邑，翕然归款。师旅惊讶，咸伏其速。皇子赐以币帛、良马，不以数为。惜时公忧劳务众，年老病笃，有功未及其录而终。有子曰和尚，袭父职，佩三品篆印，统新□炮手七百余户。洎总帅汪公，缮利扩鱼关，通沔浴，疏嘉陵，克取州属未隶郡邑，至于重庆、钓于山寨，皆和尚公之绩。□公□宽裕，喜于闻善，军政备举，折节下士，众咸感戴，年七十余终于□。子男有三：长曰安仁，混都海叛，立功，宣授炮水手军匠元帅；曾孙曰祥，敕

授进□校尉、炮水手，管军千户。次曰安德，即谯国郡侯也。次曰安信，宣授进义朝尉、巩昌等处炮水手军匠奥鲁官。有男友善，袭父职而早卒。

曰友闻、友庆，安德公二子也。二十九年，西域满子阿厘拒境不庭。友庆奉命领军至□思□□雀□□阿厘，力战建功，天子赐以文绮二端□□□□。大德二年袭父职，拜武德将军，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副万户，佩虎符。□年秋七月，云南土夷蛇截等□横弄兵，选友庆从西省平章野速答儿、参政汪公抵乌撒等处，□□□土□□王诛。九月，忙部□□□□□永蓬屯兵五千余众，遏青狗□，友庆谓平□□□小□多历艰险，当作先锋，金□□□□旧威□敌渠魁□□殄灭族类，焚荡聚落，众□而还，□兵官嘉之□勇，以币帛、良马□□焉。季冬，至簸箕湾，永蓬雪，可复拥兵三千□□设□。友庆叱曰：“蕞尔凶丑，□敢屡犯天□。”乃□□独战至哺，斩首一十五级，兵甲有获。参政公谕于众曰：“若曹友庆者，诚可尚□□当相效之。”乃赏银三十两。七年，□驻兵父□□，土寇阿塔领兵千余迎敌。友庆跃马挥戈，鼓□□进，飞炮注矢，重甲相贯，一战而贼众悉摧。平章公称□果敢□人□□。是时□袭□□等，友庆引兵追至□月儿寨，金鼓一鸣，殄□□□生挟蛇截置于麾下，械送京师，遂使八番等处敛手辑宁。还及木休关，复遇夷魁雄坐刺。永宁路官常章甫蛇杀蒙□千，□木□□兵官，以友庆领兵追擒不获，乃□弓囊甲，抚众曰：“方春之际，军马疲弱，转□□乏，无如息兵养士，听命讨贼，未为晚矣。”平章公允其请。冬十月，雄坐出降，拜友庆宣武将

军，赏赉甚厚。至大二年，施州美容洞□麦色什侵□寨(官)，剽掠居民，川省拟友庆领兵□入贼巢。麦色什□险，不能控制，友庆出己资金币十端，□二十定(通假“錠”)，倾诱归款，从容谕以□□□威德，麦色什感泣，待罪管□□□，上悯其悔罪，授麦色什黄沙□□□成□□□□□□□□□□，仁者之人乎！向无忧□□民之心焉，有宏谋远略之效，至于□已之□□威德，兵不□□，士不□□，致使顽嚣咸悔伏责，非仁人爱人之深，孰能预于此哉！公之委人□效不可□是□来承平，日久万国咸□惜其□□□□廊庙，功足庇于子孙，□里周急□□□□□之誉焉。寿至六旬有一，终于正寝。子男有四：长曰晋臣，掌虎符，领炮翼。不堕先人之风，性沉静，寡交游，不为流俗所迁。□□六年，赴京承袭，请谥命告□□□焉。子男有三，长曰祯，佩虎符，宣授武德将军、巩昌等处炮水手、万户府万户。温恭克己，□□贤称。至正乙未，自河南征讨而还，追念祖宗之□之□□，恐陵迁谷变，湮没无闻，故□□□于南郭寺先考之莹。抑曹氏自高、曾而下，簪纓继世，清白传家，未闻有纤毫□玷者。万户曹祯，而又能绍继先志，增光祖业，可谓□□□□□□亲者矣。敢系其铭，曰：

曹氏之先，种德□□。□忠辅国，天诞英贤。出类拔萃，神武敷宣。运谋制敌，其功茂焉。公之处世，刚正□仞。公之殁矣，遗风宛然。耿耿忠烈，孰与□□。□褒有加。命秩□迁。山钟英石，是磨是镌。惟子惟孙，忠孝乃全。秦山茱萸，夕水涓涓。旣彰厥绩，千载流传。

……渚滩仲夏旣望……武德将军、

巩昌等处炮水手，万户府万户曹祯等立石。董工曹祐、曹神。

承德郎、巩昌等处都总帅府经历李成篆额；同州儒学教授李浩撰文；秦州后进□公嘉□□书丹。

二、曹安德墓碑铭相关信息考证

该墓志铭系时任巩昌等处都总帅府经历、承德郎李成篆额，同州儒学教授李浩撰文，秦州后进□公嘉□□(文字录入时已佚失)书丹。墓志刻成后，由曹祯于至正(丙申)十六年(1356年)立于其曾祖父曹安德墓园。墓志铭介绍了大元赠“怀远大将军，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副万户，轻骑都尉，追赠谯国郡侯”曹安德的世系与功德。按其记述，曹安德祖上为大宋河间(今河北省沧州市辖区河间)人，世系为：曹义—曹和尚—曹安德—曹友庆—曹晋臣—曹祯。曹安德祖父为曹义(别名曹大父)，1235年参与了协助蒙古太子阔端攻打陇右的战争，1236年9月率兵攻入巴、蜀。1258年10月，承袭父职的曹和尚与蒙古汉军统帅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兵经鱼关、嘉陵江直抵重庆大获山、钓鱼城(碑文中写作“钓于山寨”)。元世祖至元年号在1264~1294年之间，前后计31年。由曹和尚70多岁去世，至元十二年(1275年)次子曹安德承袭父职可推算，曹和尚生卒年约在1200~1275年之间。由至元十二年(1275年)曹安德承袭父职，“二十□年，以疾终于莒”推测，曹安德的去世时间不超过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其卒年应当在1287~1292年之间。

碑文第三段“(至元)二十九年……寿至六旬有一，终于正寝。”这段铭文陈述了曹安德次子曹友庆生平事迹，其陈述事迹与《直隶秦州新志》《徽郡志》^[6]、《徽县新志》^[7]、《徽县志》^[8]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陈述语言几近相同。由“至大二年(1309年)年赴施州平叛，延祐六年(1319年)长子曹晋臣赴京承袭”推测，曹友庆的生卒年约在1248~1309年

或 1258~1319 年之间。

碑文中相关的地名：“河涧”即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钓于山寨”即史书记载的钓鱼城，为今重庆市合川区嘉陵江南岸 5 公里处钓鱼山，占地 2.5 平方公里，是一处宋元时代遗留的重要历史文化古迹。“鱼关”即宋代仙人关。按徽县博物馆收藏的元代“渔关蘸提领印”文字，元代为“渔关”，今为虞关，关口在今徽县虞关老街西侧青泥岭上。

碑文中相关的时间：“至元十二年”为公元 1275 年；“乙未”即蒙古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 年）；“丙申”即窝阔台八年（1236 年）；“二十九年”指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大德二年”即 1298 年；“至大二年”即 1309 年；“至正乙未”即至正十五年（1355 年）；“涪滩”为十二干支中“申”的别称，结合上年的“乙未”干支，此处用作纪年可推为丙申年（1356 年）。

碑文中的人物“汪公”，指当时投附蒙古的金巩昌总帅汪世显之子汪德臣。汪德臣曾随皇子阔端征四川，至重庆。

三、史志中有关曹友闻的记载

《宋史》^[9]《元史》^[10]与《徽郡志》《徽县新志》《徽县志》《直隶秦州新志》等相关史志记载：曹友闻，字允叔，宋同谷栗亭（今徽县栗川）人，宋鲁国公武惠王曹彬第十二世孙。宝庆二年（1226 年）中武进士，授绵竹县尉，后改任天水军教授。端平三年（1236 年）九月蒙古国太子阔端偕同巩昌府汪世显部归降蒙古的汉军与宋军交战，曹友闻等战死于青野原、阳平关。宋廷追赠曹友闻为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号“褒忠”，庙在利州朝天岭（今广元市北朝天岭），赐谥号“毅节”。墓在栗亭曹家沟^[11]。曹友万，谥号“忠节”。

由《宋史·曹友闻传》可知，1236 年 9 月，宋、蒙两军在青野原交战时，眉州防御使、选锋军统制、天水人杨大全受曹友闻节制调遣，引本部出东菜园击敌后队。《元史·杨文安传》记载，1242 年蒙古军南征四川时，杨大全战死。另据《元史·杨大渊

传》记载，杨大渊，天水人，与兄杨大全，弟杨大楫皆仕宋，杨大渊总兵镇守阆州（今阆中市）。1258 年 11 月，蒙古军在大汗蒙哥（元宪宗）率领下，以汪世显之子汪德臣（子舜辅，赐名田哥，袭父爵任陕西行省下辖巩昌府等处二十四路便宜都元帅）为先锋，南征四川。宪宗兵至阆州大获山，蒙军派宋降臣王仲招降，被杨大渊所杀。后因众寡悬殊，杨大渊派杨文安献城投诚。元宪宗任命杨大渊为四川侍郎，统领旧部，随军南征。杨大渊卒后，归葬今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故里。今杨家寺镇杨家寺村曹、杨两姓后裔至今在杨家祠堂将杨大全、杨大渊、曹友闻作为合案家神供奉祭祀。

四、综合推论

结合这些相关史实可知，曹友闻系曹彬后裔，同庆府栗川人；仕宋，端平三年九月战死于青野原、阳平关。与天水人杨大全为同时代人，年龄不相上下。曹安德家族，河间人，祖上早年已仕蒙古。按照《宋史》关于阳平关战役的记述，仕宋的曹友闻弟兄与仕蒙古的曹义家族是敌对双方。若按碑文第三段首句“曰友闻、友庆，安德公二子也”的叙述，曹友闻当为曹义曾孙辈人物。曹友闻生年约在 1200~1207 年，其卒年（1236 年）与曹友庆生年（1258 年）相差二十二年，两人的生年相差有四、五十年。故而“曰友闻、友庆，安德公二子也”这一表述不可信。碑文中曹义至曹禎的这段家族世袭，若无曹友闻夹杂其中，则其家族世系无懈可击。一旦衍入曹友闻，其墓志铭文所述的诸人物生平时间、历史事件均与官方所修诸相关史志记载的历史时间、历史事件产生一系列矛盾冲突。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2 年）徽州知州孟鹏年主修，徽州举人郭从道编纂的《徽郡志·人物志》先后记述了曹友闻与曹友庆的相关历史事迹。其中曹友闻的传记文字信息与《宋史》记载一致，但对曹友庆与其弟曹友善、曹友直及其子曹禹臣、曹晋臣、曹汉臣的传记，仅有事迹陈述而无任何一个相



关年份。虽然《徽郡志·人物志》对曹友庆的记述与《天水县志》上的曹安德墓志铭文完全一致,但《宋史》与《秦州直隶州志》上没有关于曹友庆的记载。

五、结语

综合分析可知,曹友闻非曹友庆家族成员,曹友闻弟兄为曹友闻、曹友万、曹友谅三人,是与曹友庆的祖辈、曾祖辈同时代之人。至于在曹友闻卒后约 155 年的公元 1355 年,由曹祜请人撰写安德公铭文时将曹友闻、曹友庆并列为安德公二子,或因从字面上看友闻与友庆皆为“友”字辈,大有因羡慕曹友闻的忠烈之名而将其刻意衍入安德公家族谱以追求名人效应的嫌疑。

注释

[1]哈锐、任承允、贾缙绪总纂:《天水县志》,1939 年兰州国民印刷局初版,天水地方志办公室 1992 年翻印。

[2]潘守正:《点注〈天水县志〉》,甘出准 006 字总 740 号(2007)37 号,天水麦积旅游文化研究会、麦积文化旅游研究特刊。

[3]潘守正:《点注〈天水县志〉》卷十三《艺文志·艺文二·金石附·曹公墓碑铭》,第 267~270 页。

[4](清)费廷珍纂修:《直隶秦州新志》卷二陵墓,第 181 页,乾隆二十九年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藏。

[5]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教材编写组编:《天水小志》,“乡土存刊之二”,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年),天水地方志办公室、徽县地方志办公室藏。

[6]a.(明)孟鹏年修、郭从道纂:《徽郡志》,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万历四十一年徽州知州左之祜增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藏书影印本;b.梁晓明点校:《徽郡志》,“人物志·曹友闻”第 110 页,“人物志·曹友庆、曹祜”第 113 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年。

[7]a.董杏林修、赵忠灵纂:《徽县新志》,民国十二年 7 月抄本,徽县档案馆藏;b.梁晓明、田凌宇点校:《徽县新志》,“人物志·曹友闻”第 185 页,“人物志·曹友庆、曹祜”第 188 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8]梁晓明主编:《徽县志》第二十编人物:曹友闻、曹友庆、曹祜,第 943、944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年 9 月。

[9]《宋史·列传第二百八·忠义四·曹友闻传》,第 13233 页,中华书局,1977 年

[10]a.《元史》卷一百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二·汪世显》,第 3649 页,中华书局,1976 年;b.《元史》卷二《本纪第二·太宗》,第 35 页。

[11]栗亭曹家沟:在今徽县伏家镇索罗村曹家沟社。2019 年 12 月 31 日,徽县博物馆馆长曹鹏雁与原徽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梁晓明等人依据清代地方志记载,在该处发现清嘉庆十四年二月徽县知县张伯魁立“宋统制谥忠节公讳友闻字允叔之墓”碑。

县级博物馆如何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以古浪县博物馆为例

□景泽时(古浪县博物馆)

内容提要: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是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的核心工作,作为县级博物馆如何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如何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古浪县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形式、活动效果的分析,总结县级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经验和不足,探讨县级博物馆如何更好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关键词:古浪县博物馆;县级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

2008年博物馆免费开放以来,县级博物馆充分发挥免费开放功能,使更多人走进博物馆,和历史对话、和文化亲近,提高了公民涵养和个人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县级博物馆还存在硬件设施相对落后、馆内人员素质相对较低、专业人员缺乏、思想相对保守落后等问题。如何更好发挥县级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是每一位博物馆人应当思考的课题。

古浪县博物馆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前身为“古浪县民众教育馆”。博物馆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展厅面积350平方米,文物库房80平方米,值

班室15平方米。现有馆藏文物1208件,其中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59件、三级文物84件、一般文物1060件。藏品数量和品位在武威地区仅次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遗存丰富,品种齐全,以新石器时代彩陶和石器、汉代青铜器、西夏瓷器、明清书画、近代文物等为馆藏特色。

古浪县博物馆于2011年免费开放,内设四个展厅(两个水陆画展厅、两个历史文物展厅),一个临时展厅,陈列了新石器时代至近代的各类文物,内涵丰富,主题鲜明,展陈效果良好。

2007年,国际博协对博物馆的最新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



照1 发放宣传彩页和文创产品

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1]。这是博物馆适应时代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对精神世界追求的改变。新的博物馆定义将社会教育功能放到了首位,对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古浪县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基本情况

古浪县博物馆于2013年成立社会教育部,现有工作人员4名,一名主任,三名工作人员。社会教育活动场地一处(与临时展览合二为一),常年开设各种教育活动。

古浪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为丝绸之路要冲,文化积淀深厚,博物馆馆藏文物众多。但很多人不知道古浪县博物馆在什么地方,甚至还有人不知道古浪有博物馆,具体是做什么的。博物馆宣传力度不大,再加上思想保守和陈展楼层限制,导致陈展面积、陈展信息量不足,没有专业的社会活动场地。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社会教育活动质量较低。社会认知程度低、参观人数较少。针对古浪县博物馆社会教育面临的严峻现状,我们加大宣传力度,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印发宣传材料和文创产品

印发古浪县博物馆参观卷、宣传彩页。让人们了解博物馆的基本概况,材料简单明了、图像美观大方、设计新颖、印制精美。

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四进”活动中向参观群众散发古浪县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包括手提袋、纸杯、保温杯等,手提袋印有古浪县博物馆精品文物图案和宣传标语(照1)。

(二)树立宣传牌

我馆积极与县运管局协商,在古浪县公交车站点树立宣传牌、指引牌供群众观看,加大宣传力度。同时,购置悬挂液晶电视一台,在宣传文化中心大院滚动播放博物馆宣传片,以增加宣传效果。

(三)新闻媒体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发布博物馆相关活动信息,吸引人们注意。古浪县博物馆主要通过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古浪电视台、《武威时报》、古浪广播电台等报道博物馆举办的相关活动,如“文化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宣传日,以及古浪县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等。

(四)网络宣传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人已经不再通过报纸、电视等方式获取信息,因此博物馆宣传工作应拓宽宣传渠道,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通过网络宣传博物馆。古浪县博物馆已开通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通过网络平台把馆藏文物和社教活动推介出去。

综上所述,博物馆是展示城市魅力,传扬悠久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要想实现博物馆的自身价值,宣传工作必不可少,要全方位、多渠道地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宣传,以增加博物馆的知名度,提高博物馆的



照2 四进活动

社会地位,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参观博物馆、了解博物馆^[2]。

二、古浪县博物馆流动展览和第二课堂及其存在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功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范畴,博物馆的形式与空间也突破了固定空间的限制。古浪县博物馆自免费开放以来,开展“四进”活动二百多场次,受众人群10多万人次。通过展板、PPT等方式把展览送到边远山区、乡镇、社区、学校,让群众在自家门口看展览,通过讲解员的讲解让群众了解古浪历史、馆藏文物,同时宣传文物保护法规(照2)。和学校签订馆校合作协议,设计PPT教学课件,通过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边看边答题,回答正确还有精美小礼品相送。另外穿插互动游戏,增加课件的趣味性、生动性。古浪县博物馆渐渐变成了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照3)。

古浪县博物馆开展流动展览和第二课堂活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面临以下问题:

1. 内容单一、形式简单

古浪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但

展板只介绍了馆藏文物、古建筑、古遗址的有关情况,未涉及民俗文化、社会文化、移民搬迁等内容,与古浪庞大驳杂的历史文化相比内容单一,略显单薄。

古浪县博物馆设计制作流动展板50块,相对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展示手法来说,形式相对单一。另外,以中小学生对受众对象的PPT相对质量偏低,趣味性、教育性不强,内容质量有待提高。

2. 讲解词有待进一步提升,讲解员讲解水平有待提高

古浪县博物馆馆藏文物以新石器时代彩陶、汉代青铜器、明代水陆画、清代藏文大藏经为特色。但对馆藏如水陆画等文物研究水平较低,讲解词一知半解,讲解水平偏低,受众对象接受力不高。

3. 专业人员业务水平相对偏低,思想水平有待提高

好多人员只是为了完成绩效考核任务而开展工作,而不是真正为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而开展工作。所以要提升业务人员业务水平,建立科学有效的员工绩效考核机制,充分调动业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以提升流动



照3 “第二课堂”活动



照4 春节文化活动

展览和“第二课堂”的质量和效益;引进专业人才,推动博物馆业务水平的提升^[3]。

三、如何做好青少年教育工作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明确指出,需逐渐将博物馆的社教工作融入至国民教育机制当中。博物馆既是研究陈列机构更是教育机构,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博物馆社教工作应该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有效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文化、宣传爱国主义,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厚滋养。古浪县博物馆不仅是全县中小学生的校外课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肩负着传承古浪历史、文化、助力古浪经济发展的使命。古浪县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活动从无到有、从空到实、摸着石头过河,把博物馆青少年社教工作一点点组建起来。

(一)重视团队力量、抓好队伍建设

古浪县博物馆核定编制8人,人员有限,而且部分人员年龄偏大,为此我馆招聘合同制讲解员4名,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有活力。首先根据社教部主要工作内容建立几个业务小组,明确职责、责任到人。如春节文化活动,首先由策划组拿

出工作方案、形成材料、提交馆务会讨论完善,然后交宣传小组印制张贴海报、发布信息、登记报名,然后交活动执行小组布置会场、引领讲解、主持活动、颁发奖品。每个人员的工作职能有重叠和交叉,鼓励大家身兼多职,逐渐建立了一支团结协作、运行高效的社教团队,工作逐步系统化、制度化、流程化,分工明确、权责到人,社教工作有序开展(照4)。

(二)以人为本、因人施教、联动教育、不断创新

古浪县博物馆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让青少年自己动手、主动参与、互动体验。如“石头的记忆”社教活动就是先让参加活动的学生自己找石头,然后到博物馆指定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创作自己的作品。这些孩子通过参观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及讲解员的讲解,然后在石头上创作自己的作品(照5)。针对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因人施教,比如,针对少年儿童的讲解相对就要有亲和力、语言言意切实、富有活力。如介绍马家窑文化彩陶罐时讲解员就会说“小朋友或者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谁回答一下。你知道它是怎样的制造出来的吗?你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你喜欢上面的花纹吗?”等等,这种问答式、参与式的参观让小学生更加了解古浪县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加深了参观后的印象(照6)。古浪县博物馆还主动和县内中小学校签订馆校合作协议,主动和学校的校本教育相结合以提升第二课堂的教学质量。

博物馆是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感的重要基地。博物馆作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传承的载体,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的使命。博物馆通过举办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民俗文化和文物等专



照5 “石头的记忆”社教活动



照6 学生参观展厅

题展览,组织开展征文、绘画、演讲比赛等主题活动,促使青少年了解祖国的历史和博大的文化,并以此作为激励、树立远大理想。可以说博物馆已经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精髓,激励青少年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媒介。同时,提供智慧型博物馆和教育项目,提升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吸引力,强化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互动体验服务项目。古浪县博物馆主要通过手机 APP 进行语言导览讲解服务,实现展厅无线网络全覆盖;建立手机网站、微信平台等讲解服务平台;开发互动教具、购置电子书、电子阅览器;推出 3D 画廊,条件成熟情况下建成 3D 互动体验馆等。

综上所述,如何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笔者认为要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尤其馆藏文物资源,深入生活、贴近观众,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推出更多高质量的社会教育活动,最大限度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

注释

[1]王钰:《博物馆如何亲近青少年引关注:把博物馆装进书包》,《人民日报》2014年5月15日。

[2]a. 柳彦章:《刍议博物馆宣传》,《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b.刘丽君《博物馆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文物春秋》2004年第2期;c.李俊《关于博物馆宣传工作的几点思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1期。

[3]a.赵璞:《流动博物馆展览的服务内涵和现实意义——以云南省楚雄州博物馆为例》,《学理论》2015年第4期;b.魏敏:《博物馆展览文字浅析——观众研究视野中的案例分析》,《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c.张瑛:《论博物馆流动展览的有序发展》,中国博物馆学会编:《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2005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研讨会文集》,第625~634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试论我国高校博物馆社区化

□田 汉(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针对当前我国高校博物馆存在的开放程度低、影响力小、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以期通过“高校博物馆社区化”这一方式解决高校博物馆存在的以上突出问题。同时提出了与社区接触、贴近社区,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和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三个方面的对策。

关键词:高校博物馆;“高校博物馆社区化”;问题与对策

高校博物馆在我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其主要发展期也就在近几十年里,但其出现的历史却与我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同时。南通博物苑由近代实业家张謇在1905年于南通师范学校内建立,是我国第一座近代博物馆,也是我国第一座高校博物馆。但是,高校博物馆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里,这一时期是高校博物馆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高校博物馆的快速发展,其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对高校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丰富起来。高校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博物馆,与一般博物馆的职能有所不同,相比较于对一般博物馆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高校博

物馆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究其原因,与高校博物馆的特殊性有关,特别是其面临的挑战、存在的问题限制了学者对高校博物馆的深入研究。

目前针对高校博物馆的研究专著较为稀少,期刊论文虽然较多,但大都从某一具体方面讨论,少见系统研究。例如,周尚娟的《论高校博物馆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一文,主要讨论了高校博物馆在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开源节流,明确职责、规范管理和立足校园、面向社会的三个解决对策^①。麻赛萍在《高校博物馆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主要围绕通识教育的内涵和要求、高校博物馆的通识教育功能和教育功

能的实践途径以及高校博物馆社区化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2]。总的来说,这些文章大多都集中讨论了高校博物馆的相关概念、职能、存在问题和解决策略以及在国内、外的高校博物馆对比研究上。可以说研究涉及面较为广泛,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总体来讲仍有研究的空间,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

近几年,许多高校研究生把学位论文选题集中在高校博物馆。主要的文章有:邓微的《西部地区高校博物馆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西部地区高校博物馆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西部地区高校博物馆的概况、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对策^[3];白莹的《我国高校博物馆发展现状研究》,主要探讨了我国几座知名高校博物馆的发展现状及问题,而且选择的案例基本上以东部高校博物馆为主^[4]。我们相信,随着以后越来越多高校研究生的加入,将会极大丰富对高校博物馆的研究。

纵观以上研究文章,对高校博物馆存在问题和发展对策都有回应,但都大而化之,难以做到具体操作。大部分研究者都感觉到当前我国高校博物馆大多还是处在“待字闺中”的状态,开放程度低,特别是对社会的开放力度还很不够,难以发挥高校博物馆的职能和作用,是对资源的浪费。简而言之,就是“物不能尽其用”。那么如何破解上述难题,我认为推动“高校博物馆社区化”不失为解决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何为“高校博物馆社区化”

麻赛萍在文章中对“高校博物馆社区化”给出的概念是:“要实现上述的教育功能(即高校博物馆的通识教育功能),高校博物馆应该采取展览、讲座、沙龙等措施,将高校博物馆普及到非专业的学生群体当中,一般我们把这个过程概括为高校博物馆的社区化。这里所谓的社区,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即聚居在一定地点上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特指某些功能性居住单位的所有个体”^[5]。

麻赛萍虽然在文章中提出“高校博物馆社区化”是为了解决通识教育功能的实现,但是我认为这一方式也可以解决我国高校博物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且,麻赛萍在其文章中也已提出要实现“高校博物馆社区化”的具体举措之一便是让社区学生亲密接触博物馆,还提出博物馆应当积极探索走向社会之路,旨在让更多民众走进高校博物馆,使高校博物馆更好发挥相应的教育功能。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高校博物馆社区化”是为了解决博物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社会缺乏联系的现实问题。如果将高校博物馆与社区结合起来,走社会化之路,让更多人参与到高校博物馆建设和发展中来,这将有利于化解当前高校博物馆所面临的问题,推动其社会教育职能的有效发挥,更好为社会大众服务,促进文化繁荣。那么,重视“高校博物馆社区化”发展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这里,我们须明确高校博物馆是较为特殊的一类博物馆,他既隶属于高校,但同样也具有一般博物馆的职能。正因为其特殊性,所以高校博物馆的封闭、社会服务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其发展的一个普遍问题。因此,“高校博物馆社区化”的理念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之路,把高校博物馆与社区融合,资源共享于社会,真正做到让其面向社会开放、服务于社会。

二、高校博物馆面临的普遍问题——封闭、开放服务不足

多数学者在研究高校博物馆所面临的问题时,都会谈到高校博物馆封闭、开放服务不足这一问题,可见这是大多数高校博物馆所面临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鲍丽娟在文章中针对该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她认为目前部分高校博物馆社会化开放程度一般,育人功能没能得以很好的发挥,高校博物馆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从“校内博物馆”走向“大



众博物馆”,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由单一的服务学校拓展为服务社会公众,使高校里的“宝藏”走进人们的视野,实现它应有的价值^[6]。另外谢祥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很多高校博物馆限于管理和资金的影响,开放时间短,参观手续繁杂,有的甚至只针对教职工和学生开放,不接待社会人员^[7]。这种例子还有很多,还有一些学者就这个问题专门做了讨论。颜维琦在文章中就高校博物馆如何走出“象牙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8]。苗艳丽在其文章中也探究了这一问题,《高校博物馆缘何“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文指向了高校博物馆存在的封闭、开放不够的问题^[9]。

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因此,高校博物馆的封闭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如何化解,其实国家在一些文件中早就有了明确要求。

2011年国家文物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通知中将高校博物馆定义为:为了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由高等学校利用所收藏的文物、标本、资料等文化财产设立并向公众开放,致力于服务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公益性组织。

2011年5月,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又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针对高校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鼓励高校博物馆开展各种进社区活动,并积极探索博物馆数字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增强博物馆文化传播、辐射影响力。鼓励高校博物馆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

2015年3月20日开始实施的《博物馆条例》在对外开放、社会服务、财政扶持政策、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我国高校博物馆建设提出了规范的要求和必要的支持。

以上都是国家在政策方面对高校博物馆发展提出的要求,旨在提高高校博物馆对外开放和服务能力。但现实中,高校博物馆的开放能力还不够,尤其在西部高校博物馆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这

已经影响到高校博物馆职能的发挥。对于高校博物馆要做到开放服务、打破封闭状态还需要各方面齐心协力努力,本文就此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

三、高校博物馆封闭、开放服务不够问题的解决之道:高校博物馆社区化

高校博物馆普遍存在封闭、开放程度低,服务范围 and 群体小,难以与社会形成有效交流等问题,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实现“高校博物馆社区化”。这不仅与国家相关政策吻合,也与诸多学者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的解决对策相符合。所以,实现“高校博物馆社区化”是破解当前高校博物馆存在问题的关键方法,同时也有利于为高校博物馆发展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举措:

(一)与社区接触,贴近社区

高校博物馆与社区紧密相关,这是博物馆走向社会大众的重要举措。麻赛萍在其文章中提出让社区学生亲密接触博物馆,这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高校博物馆可以依据其优秀的资源,与社区民众建立联系,为其举办相关讲座或是开放社区来参观博物馆,这样可以建立二者的有效互动。一方面博物馆文化教育的职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使博物馆资源得到共享,恰好缓解了高校博物馆“待字闺中”的尴尬局面。其实,社区对于博物馆来说潜力巨大,人群层次较为复杂,特别是学生群体是最具潜力的人群,是博物馆的潜在观众。这些都对博物馆社区化发展尤为重要。另外,高校可利用其优质资源和科研人才,将科学研究和实践基地落在社区,让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总之,“高校博物馆社区化”第一步就要走出“闺中”,走向社区,与社区亲密接触,形成良性互动。不论是对于博物馆的发展,还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上,意义都是巨大的。

(二)面向社会大众开放

正如前文所说,高校博物馆的开放程度低,大多数高校博物馆只对本校师生开放,而对社会人



员基本不开放。这种情况在我国高校博物馆当中普遍存在,导致其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失去影响力,大多数人竟然都不知道高校里还存在博物馆。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各高校博物馆扩大开放程度,能够面向社会大众开放。

对于如何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各个高校博物馆可依据具体馆情做出合适安排。高校博物馆有着优秀的科研人员以及高质量的藏品资源,而其开放程度不够,使大部分群众难以享受到优秀文化的滋养。例如高校博物馆可以取消校外人员参观博物馆的限制,改变高校博物馆“大门紧闭”的现象。再或对于缺乏资金问题,可以寻求社会有能力之人的帮助,也可以与文化创意公司合作,一方面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自身发展,实现其职能,发挥影响力,提高知名度。总之,高校博物馆作为特殊的一类博物馆,须加大开放程度,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共享文化资源。

(三)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博物馆承载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是繁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高校博物馆也难舍其身,必须要主动出击,发挥其作用。博物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是保护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基地,因此,必须要走出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是要“引进来”。高校博物馆必须与人民大众发生密切关系,而不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让人民大众走进高校博物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二是要“走出去”。高校博物馆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论是讲座还是其

他各类形式,需深入到学校和社区。如何走近人民大众,这就需要宣传,可以与其他博物馆、陈列馆合作,也可以和当地旅游活动合作,扩大影响力。最终为的是更好的实现高校博物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职能。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博物馆的未来将是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注释

[1]周尚娟:《论高校博物馆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博物馆研究》2010年第4期。

[2]麻赛萍:《高校博物馆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作用》,《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3期。

[3]邓微:《西部地区高校博物馆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4]白莹:《我国高校博物馆发展现状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麻赛萍:《高校博物馆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作用》,《博物馆研究》2007年第3期。

[6]鲍丽娟、胡兴祥:《高校博物馆定位与教育职能探究——以合肥地区高校博物馆为例》,《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5年第7期。

[7]谢祥、章鑫、沙迪:《高校博物馆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探讨》,《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6年第2期。

[8]颜维琦:《高校博物馆如何走出“象牙塔”》,《光明日报》2014年3月8日。

[9]苗艳丽:《高校博物馆缘何“养在深闺人未识”》,《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26日。

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古城与博物馆馆藏文物

□ 尤宝铭(甘肃省博物馆)

塔克西拉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部,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古城和犍陀罗艺术的发祥地,始建于2500年前。作为主要的交通贸易通道,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它连接了中国、印度、中亚和西亚等地(照1)。

塔克西拉原名塔克西哈拉,梵文意为“石雕之城”。公元前7世纪,这里已具繁华城市的规模。公元前5世纪,古城所在地区成为波斯大流士帝国的一部分。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此,古希腊文化从此开始在这一地区兴起发展,古城名字也因之改为希腊文“塔克西拉”。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佛教在此广为流传。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信奉佛教,塔克西拉进一步发展壮大,变为香火鼎盛的佛教圣地和学者云集的佛教、哲学和艺术研究中心。

塔克西拉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厚的渊源。相传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在公元405年到访此地并居住了六年。著名的唐代高僧玄奘,于公元650年来到塔克西拉并在此讲经、说法整整两年。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将塔克西拉译作“坦叉始罗”,他描述当时的塔克西拉是“地称活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崇敬三宝”。如今,玄奘的讲经堂遗址仍然保留在古城内。

塔克西拉古城因出土了大量佛教文物而闻名于世。由于塔克西拉历经安息、古希腊、古印度、大月氏等统治,多元文化在此交融,且一度是佛教文化中心,因此古城遗迹中发掘出来的文物,大多与佛教有关,其中的1400多件石雕佛像、佛塔来自犍陀罗时期,为坐佛且做冥想状,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1~7世纪(照2)。



照1 塔克西拉古城遗址



照2 塔克西拉古城的佛像

塔克西拉古城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大部分收藏在塔克西拉博物馆。塔克西拉博物馆始建于1918年，历时十年完工，1928年4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主楼为一座英式建筑，由英国人修建。博物馆坐落在一个花园中，包括一个大厅、两个L型的展示厅和一个开放式的门廊，中间还有一个庭院。博物馆环境优美，藏品丰富，堪称是一座真正的世界文化特别是犍陀罗艺术的宝库，展示了塔克西拉古城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艺术杰作和生活风貌（照3）。

博物馆中收藏、展出的犍陀罗时期石雕和泥



照3 塔克西拉博物馆外景

塑佛像最为出名，包括表现佛陀生平的各种浮雕，佛陀、菩萨的立像、坐像等，佛像从鼻梁、眼窝、嘴唇到下巴，都具有欧洲人的某些特征，连衣纹都近似希腊雕塑，但在精神内质上又不同于欧洲风格。佛像、菩萨像面部圆润、双目微闭、慈眉善目，具有典型的东方佛像特点。站在博物馆展柜前，仔细端详那些幸存的佛头，他们有的头发虬曲、缕丝分明；有的眉如新月、眼睛似睁似闭，宛若梦中，却栩栩如生，不愧为艺术珍品（照4）。由此可见，犍陀罗艺术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



照4 塔克西拉博物馆展出的石佛像

犍陀罗（Gandhara）原是以塔克西拉一带为中心的地名，公元1世纪作为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首都，曾被称为犍陀罗国，其位于今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贵霜人大约在公元前170年迁徙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之后征服巴赫特爾，进而攻占喀布尔河流域，最后占领了犍陀罗，定都白沙瓦。贵霜人最著名的统治者迦腻色伽当政期间，力推佛教艺术，佛教大振，犍陀罗艺术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早期的佛陀形象以人物为主，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在佛塔基座的壁柱之间展现佛陀的生平事迹。到了中后期，独立式的佛像逐渐出现且数量越来越多。

博物馆展厅另一侧是佛教文物陈列区。上百座佛陀、菩萨塑像整齐排列，庄重而静穆。仔细观

察这些佛像不难发现,其雕刻风格与中国常见的石刻佛像迥异:大耳垂肩、顶着特殊发髻的佛陀,面部却具备高鼻深目的希腊人特征,身上的披袍也是希腊式的。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攻至塔克西拉后被阻。希腊人不仅没有将塔克西拉毁于战火,反而将希腊的雕像艺术与佛教文化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犍陀罗艺术,开创了“佛”最初的形象。

馆藏的100多枚犍陀罗时期佛教图章,由泥土制成,出土时纹路清晰、保存完整。考古学家初步分析,这些图章应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当时正是佛教在该地区大为流行的时期。图章分别刻有徽章、符号、活动场景等图案。专家们考证,图案可能是代表向寺院供奉布施的施主们的身份。出土的图章再次证实了该地区与当地其它邦国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而佛教寺庙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来源也许是靠接受大量施舍供奉。这也是巴基斯坦考古史上第一次在同一地点挖掘出如此之多的古代图章。

除了各种佛教文物外,博物馆还收藏展出了近年来发掘出的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的陶器、雕花石盘,石刻造像、灰泥造像、铜像,寺庙绘画、碑文,各种钱币,用金、银、宝石做成的各种精美首饰。另有用骨、象牙、贝壳、铁、青铜制成的各种工具、日用品,装饰品、玩具、赌具等物品及印度教和耆那教文物,展现了当时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



照5 塔克西拉博物馆展出文物

活(照5)。馆藏最早的文物可上溯至四千年前。

博物馆里反映希腊风格的馆藏也很有特点。那一枚枚印有希腊国王头像的古钱币,表现了39个希腊君王和2个希腊女王的形象。具有古印度风格的金银饰品,再现了孔雀王朝和贵霜王朝鼎盛时期繁荣的经济与工艺制作水平。还有一些伞形宝塔,与中国宝塔的风格与特征十分接近。

最引人注目的是千百尊大大小小的犍陀罗王朝时期的石雕和泥塑佛像,明显带有希腊雕塑风格,却又自成体系,形成了独特的犍陀罗艺术风格。甘肃天梯山石窟的北凉菩萨壁画、天水麦积山石窟的北朝石佛像就带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但早期的印度佛教艺术中不存在佛像,人们往往使用与佛陀相关的符号,如法轮、菩提树、佛足印、台座、窣堵波等作为佛的象征。人类的第一尊佛像,很可能就诞生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的犍陀罗。到了公元1世纪的贵霜时期,佛像在犍陀罗地区大规模兴起。

犍陀罗佛像的风格深受希腊化文化影响。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佛陀被视作为神祇,以人体雕塑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接受众生膜拜。犍陀罗的佛陀雕塑大多带有白种人的特征,佛陀的头光也与希腊和近东宗教传统中的日轮有关。

今天,当您走进塔克西拉古城,展现在眼前的数千年前的古城遗址依稀可辨。高大坚固的城垣、独具特色的寺院庙宇、佛塔和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浮雕,分布得错落有致,显示了古城昔日的辉煌。它见证了佛教在巴基斯坦留下的丰富的艺术品和宏伟的建筑遗产。古城于2006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塔克西拉博物馆展出的不同时期的文物,表明犍陀罗艺术既有本地区的特点,同时又受到来自中国、波斯、罗马和希腊等国的不同影响。大乘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中国、日本等国家,促进了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八步沙精神——平凡的伟人”雕塑 捐赠仪式在甘肃省博物馆举行

□张 东(甘肃省博物馆)

2020年6月16日上午,“八步沙精神——平凡的伟人”雕塑捐赠仪式在甘肃省博物馆举行。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卫中为雕塑揭幕,甘肃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玉萍向捐赠者颁发了收藏证书,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贾建威和捐赠人代表周沛勇先后致辞。甘肃文旅集团董事长石培文,武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国斌等各方代表以及捐赠人江苏艺术家周沛勇先生、浙江著名雕塑家郑玉金先生出席仪式。甘肃省博物馆党委书记肖学智主持捐赠仪式(照1、2)。

贾建威表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以“六老汉”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创造了令人震撼的绿色奇迹。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他们的平凡举动,既是坚守与奋斗的壮举,也是信念与意志的传奇,体现着

崇高的时代精神,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艺术家周沛勇先生、雕塑家郑玉金先生向甘肃省博物馆捐赠的“八步沙精神——平凡的伟人”雕塑作品,生动再现了“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用汗水与心血谱写的治沙奇迹和感人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甘肃省博物馆在当代藏品方面的不足,丰富了展陈内容与形式。甘肃省博物馆将保存好、展示好、宣传好这件雕塑作品,发挥出它更大的价值。

艺术家周沛勇先生表示,“八步沙精神”内涵极其丰富,不仅仅局限在治沙造林行业,也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作为艺术创作者,本着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更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以工匠精神,创作出传统、时代、个性高度统一的“八步沙精神——平凡的伟人”铜质雕塑。作品以中国最古老的象形



照1 “八步沙精神——平凡的伟人”雕塑捐赠仪式



照2 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向捐赠者颁发收藏证书



文字甲骨文的“山”字作为主创元素,通过象形的山水有机地把八步沙六老汉治沙造林的生活与劳作历史瞬间定格下来,给人带来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精神震撼力。同时,也通过水的意象,表达“八步沙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一波三折”最终铸就大漠绿洲之意。整组雕塑似乘风破浪的一艘航母,生动展现了八步沙六老汉治沙造林人的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精神。创作者将“八步沙精神——平凡的伟人”雕塑作品捐赠给甘肃省博物

馆,正是希望将“八步沙精神”继续传承下去。今后,他们还将创作更多的系列作品来弘扬“八步沙精神”。

“八步沙精神——平凡的伟人”雕塑作品总长 393、高 67、厚 58、人物总高 56.8 厘米,长高比 6.33:1。雕塑在造型语言上运用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以及摩崖石刻造像相结合的手法,作品气势磅礴、气韵生动。

征稿启事

《陇右文博》是由甘肃省博物馆主办、面向全国文博考古专业的综合性学术季刊。主要反映甘肃省以至西北地区文博考古事业各个领域的工作,特别突出文物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主要栏目有:考古发掘与文物调查、考古学文化探索、文物研究与鉴赏、史地研究、博物馆管理与研究、文博信息等。此外,还可根据特定的活动和稿件,临时增设其他栏目。内容包括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的考古、调查报告;各类文物、古生物化石标本的研究、鉴赏和鉴定知识;文物保护经验探讨;历史、地理、民族方面研究;博物馆各项工作的经验、信息等。欢迎专家、学者和文博工作者赐稿。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稿件要求:

1.来稿正文字数一般应为 3500-8000 字,文字用现行规范简化字。并附 200 字以内“内容提要”和 3-5 个关键词。稿件内容要求观点鲜明、新颖,论据充分、有力,结论正确,具有原创性,反对抄袭、伪造或一稿多投。

2.注释和参考文献一律用文尾注;引用图书资料应标明作者、书名、出版商、出版年份、页码;引用期刊论文应标明作者、文题、刊名或报纸名、年度刊期或日期、页码或版次。

3.来稿所需图片、照片应单独提供;图表、照片应有编号、说明文字;线图应附有比例尺。

4.属于课题基金项目的论文,请在文尾注明基金项目类别、课题项目名称及编号。

5.来稿以 word 文档形式发送,另附作者姓名、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电子信箱等详细信息,以便联系。

6.依照《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编辑对来稿有进行文字修改、删节的权利。

通讯地址:兰州市西津西路 3 号,甘肃省博物馆

邮政编码:730050

联系人:王科社 茹实 李慧奉

联系电话:09312336801

投稿邮箱:gansulongyouwenbo@163.com

甘肃省博物馆“5·18 国际博物馆日” 系列直播活动

□甘肃省博物馆网络中心

2020年5月18日是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因全球范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也显得和往年有了很大不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包括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众多世界知名博物馆纷纷闭馆。随着我国疫情局面的好转，包括甘肃省博物馆在内的一批国内博物馆渐次恢复开馆。

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甘肃省博物馆连续举办了多场直播活动。

5月14~18日，由甘肃省文物局指导，甘肃省博物馆联合天水市博物馆、临夏州博物馆、敦煌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丝路记忆·甘肃遗珍”文创主题直播在抖音平台首先启动（照1）。

甘肃省博物馆于5月14日、

18日分别进行了两场主题为“天马的秘密知多少”和“彩陶带你淘开心”的直播；15日，天水市博物馆推出直播“襟带关陇 丝路通衢”；16日，临夏州博物馆的直播主题是“古陶神韵”；17日，敦煌博物馆的直播主题是“丝路印记 家国情怀”。通过直播的形式，5家博物馆以不同的丝路主题，多维度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魅力，探寻经典馆藏文物的“前世今生”，对文物相关的文创衍生产品进行解读，设置互动环节，让每一位线上观众都能参与到直播活动



照1 “丝路记忆·甘肃遗珍”文创主题直播



照2 “距离产生美——与野生动物保持适当距离”
博物馆教育公益直播课

中,加深对丝路文明的认识。直播中,讲解员与文创设计师共同出境,打造在线逛博物馆的“云参观”模式,让消费者足不出户了解丝路故事,“剁手”各种文创好物。

5月17日,由甘肃博物馆与假日博物馆联合发起的“距离产生美——与野生动物保持适当距离”

博物馆教育公益直播课开播,同步直播平台还有腾讯、优酷。自然部孙志谦老师现场展示了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刺猬及穿山甲标本,深入浅出的为网友讲解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常见野生动物特征及习性,以及如何与野生动物保持适当的距离(照2)。

5月18日,“这是一匹特立独行的马”在抖音平台开播,讲解员刘婷带领网友走进“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以独特的视角探访丝绸之路甘肃段独具特色的文物珍品(照3)。期间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班睿为直播间的网友讲解了天梯山石窟的悠久历史及国宝“一佛二菩萨”等文物背后的故事(照4)。

5月20日,新华社与国家文物局携手推出的全国博物馆“国云展”直播节目在甘肃省博物馆亮相。甘肃新闻网主持人彭晓姣、兰州历史文化资深专家邓铭、甘肃省博物馆讲解员陈欣媛一同带大家走进了甘肃省博物馆,漫步于兰州城的前世今生,畅谈丝绸之路上的瑰宝菁华。



照3 “这是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直播活动



照4 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班睿讲解
天梯上石窟及文物

此次系列直播活动累计超60万人次点击观看,广受欢迎,好评如潮。“线上直播”模式是甘肃省博物馆积极拥抱互联网、抓住数字时代发展机遇的新举措,也是博物馆与观众建立深度链接,融入观众生活的必然选择。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加强了甘肃省博物馆与省内各文博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打造了一支懂文物、会传播的“线上”工作团队,为博物馆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推介工作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促进了甘肃省博物馆在智慧化进程中的发展。

甘肃省博物馆 2020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 辛欣(甘肃省博物馆)

2020 年 5 月 18 日是第 44 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这一主题反映了当今博物馆对于自身定位和功能的新思考和新认识,体现了世界多元一体,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的文明发展大格局。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要求,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甘肃省博物馆首次采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推出了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

线上活动主要与新华云展、抖音、假日博物馆、今日头条等平台合作,举办丰富多彩的线上展览、直播活动,近 60 万人次在线参与互动,开启了观众与博物馆交流的新模式。线下活动以主题陈

列展览为主,主要有:

一、黄河之滨也很美——兰州的前世今生

展览分“我的前世谜”“我的昔日美”和“我的今生很攒劲”三个单元,以时间为轴线,全面展示金城兰州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遗址、文物、名胜古迹、民俗等方面,还原兰州的“前世今生”,向观众娓娓道来兰州的历史变迁和人文风情(封三-1)。

二、“童心协力 天使同行——纪念“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兰州市少儿图文美术展览

展览甄选 200 余幅作品,以绘画和书法的表现形式,从赞扬医疗工作者、病毒科学、防治宣传、宅



照 1 “童心协力 天使同行”——纪念“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兰州市少儿图文美术展览



照2 甘肃省博物馆讲解员发放宣传材料

家生活记录等方面入手,通过一幅幅精美的作品表达了青少年儿童面对疫情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照1)。

此次展览由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市文明办、兰州市教育局和兰州市校外教育办共同举办,结合全国少年儿童“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组委会的安排,以“童心协力 天使同

行”为创作主题。青少年儿童通过手中的画笔向一线抗“疫”工作者致敬,为祖国送上美好祝愿。

三、“加油——‘甘’苦与共,共克时艰”流动展板

5月18日,在博物馆前广场展出“加油——‘甘’苦与共,共克时艰”流动展板,宣传防疫健康知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科普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原理和预防措施,让广大观众相信科学,结合

科学的疫情防控知识,打赢这场战“疫”(照3)。此外,甘肃省博物馆讲解员在当天还为观众发放了宣传材料和参观指南等(照2)。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甘肃省博物馆从自身定位和功能角度出发,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传播的方式,充分展现了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有效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增进公众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公众的幸福感。



照3 “加油——‘甘’苦与共,共克时艰”流动展板

两场直播共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陈憭閒(甘肃省博物馆)

2020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赋彩全面小康”。围绕这一主题,我馆推出了系列线上线下活动,期待公众能从中感悟丝路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从文物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6月13日,甘肃省博物馆联合肯德基“丝路如意”餐厅,围绕“丝绸之路上的饮食文化”这一主题,邀请兰州财经大学教授高启安,通过“抖音”“央视频”2个平台进行了一场别样的直播活动。“最近因为新冠疫情,饮食界又开始推广‘分餐制’,探索双筷方式,还有我们熟知的‘中餐西吃’等等,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减少相互之间口水的交流,防止疾病因饮食而传播。”直播一开始,高启安教授就以当下热议的话题开讲,网友不断在线讨论并提问。之后,高启安教授主要对两件饮酒器的东传和几种特色食物及制作方式的交流、传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照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2020丝绸之路周”,受中国丝绸博物馆邀请,甘肃省博物馆参加了“遗产

点亮丝路系列直播”。陕西历史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21家博物馆共同开设直播,以直播接力的方式串联丝路地图,一起探索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

6月14日晚,我馆讲解员徐子钦带领“抖音”“新浪”2个直播间的网友们走进“甘肃彩陶展”。用独特的角度讲解甘肃彩陶历史,生动展示了甘肃彩陶文化,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此次直播看到的“甘肃彩陶展”是角度最为独特的一次,了解到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到历史的温度(照2)。

在博物馆暂时不能开门迎接观众的时期,甘肃博物馆线上展览和网络直播逐渐受到网友们的欢迎,甘博讲解员变身“主播”,在“抖音”直播涨粉、“淘宝”直播带货,不仅体现了甘博多渠道让文物“活”起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内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趋势。直播让文物在“互联网+”时代“火”起来,继而“活”起来,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让公众在家就可以领略优秀传统文化。



照1 “丝绸之路上的饮食文化”直播活动



照2 “甘肃彩陶展”直播活动

甘肃省博物馆举办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

□王孟元(甘肃省博物馆)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甘肃文博主会场活动于 6 月 13 日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活动主题围绕“文物赋彩全面小康”展开。活动主要通过展览的形式,宣传以“传播文物价值,展现中华风采,全民参与保护,资源你我共享,文物珍藏记忆,见证抗疫历程,在线云观展,文博新样态”的文博精神。本次活动分为四个部分:“飞天神韵·莫高精神——敦煌石窟文化艺术展”“疫去春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展”、《莫高人与莫高精神讲座》专题讲座以及肯德基“丝路如意”餐厅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饮食文化交流”网络直播课。

一、飞天神韵·莫高精神——敦煌石窟文化艺术展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和省文物局主办,敦煌研究院承办,省博物馆协办的“飞天神韵·莫高精神——敦煌石窟文化艺术展”在甘肃省博物馆首展。该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宣传“时代楷模”,弘扬“莫高精神”。展览分为“飞天神韵”和“莫高精神”两个部分,以展示敦煌石窟艺术文化和“莫高精神”为主要内容,让观众领略到敦煌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和敦煌石窟伟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第一部分为六个单元,共展出莫高窟复制洞窟、彩塑、敦煌古乐器复制品,建筑模型,以及图版共计 70 余件,立体展现敦煌石窟千年营建历史、丝路多元文化交汇的艺术结晶和精美绝伦的敦煌石窟艺术文化。第二部分分五个单元,共展出复制藏经卷,图片、文字版以及影像

宣传片共计 60 余件,以敦煌研究院珍藏的老照片、档案资料为主要展品,细致讲述敦煌石窟艺术背后的故事,全景展现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先进事迹(封三-3)。

二、《莫高窟人与莫高精神》专题讲座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甘肃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莫高窟人与莫高精神》的专题讲座。赵声良院长回顾了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逆行而来、扎根敦煌,精心守护珍贵文化遗产,以实际行动诠释“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的奋斗历程。

三、疫去春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展

由甘肃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文物局主办,甘肃省博物馆承办的“疫去春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展”同期开展。该展旨在讲述 2020 年初全国人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抗疫工作,记录甘肃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辛历程,展现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科普卫生防疫教育,在未来化解可能再次出现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及分享甘肃省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有效措施,传递团结合作,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封三-2)。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间节点,甘肃省博物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文物赋彩全面小康、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激发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浓厚氛围。